

隋以前中國古籍所載有關 南海交通史料研究

SOUTH-EAST ASIA IN CHINESE RECORDS BEFORE THE SUI DYNASTY

A THESIS SUBMITTED BY CHAN KAI WING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HILOSOPHY
SUPERVISED BY PROFESSOR L. Y. CHIU

SEPTEMBER 1995

提 要

本文對隋以前有關南海交通的中國古籍，進行了綜合的分析與研究。

論文首先對每一時期古籍的編撰特點加以勾劃，並且分類予以評述。接著，文章略敘當時的海外交通概況，再對比較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展開深入的研討。

對先秦至兩漢時期的南海交通，除扼要介紹有關的載籍外，主要是討論南海對外遠航路線的開闢。至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則詳介有關中外交通的著作、雜記，然後對吳時康泰、朱應之出使扶南，以及東晉法顯之西遊和行紀，進行了詳細的研究。

ABSTRACT

Abstract of the thesis entitled “South-East Asia in Chinese Records before the Sui Dynasty” submitted by Chan Kai Wing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thesis i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about the South Seas communication prior to the Sui Dynasty.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sis, an outli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riting and compilation of the ancient books and documents of each period would be given. Relevant books and documents are then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category and are carefully reviewed. Important people and events as well as an account of the sea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of each period will also be presented.

For the period of pre-Qin to Han Dynasties, the thesis will focus upon the opening up of long range sea routes through the South Seas. For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relevant literary works about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South Seas will be discussed in detail, followed by a study on Kang Tai and Zhu Ying of the Wu Kingdom — the earliest South Seas Chinese diplomatic envoys to Funan. Finally, the thesis also presents detailed study on Fa Xian’s travels and his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目 錄

引言

第一章 古籍所載隋以前的南海交通史料述評

- 一 先秦至隋南海交通史料特點
- 二 大型綜合著作
- 三 各類雜著地志
- 四 中外交通專著

第二章 隋以前南海對外交通概況

- 一 秦隋間之南海及海洋知識之增廣
- 二 秦漢對南海地區的經略
- 三 漢代南海對外航道之開闢
- 四 三國載籍所記之南海諸國
- 五 兩晉南北朝與南海諸國之交往

第三章 康泰、朱應出使扶南之探究

- 一 吳時中國與扶南的通交
- 二 康泰、朱應出使扶南的時間
- 三 康泰、朱應孰正孰副
- 四 康泰等所寫的記傳及其輯佚

第四章 法顯西行與南海交通

- 一 法顯西行求經的大略經過
- 二 《法顯傳》及其研究
- 三 法顯東航對南海交通之意義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1) 魏晉南北朝南海交通地名載錄一覽表

- (2) 《吳時外國傳》、《南州異物志》所記的南海諸國圖
- (3) 兩晉、南北朝南海對外交通諸國圖
- (4) 古籍所載康泰、朱應出使扶南時間比勘表
- (5) 康泰、朱應有關扶南記傳名稱演變表
- (6) 康泰《扶南傳》(或《外國傳》)輯錄一覽表

引言

波濤洶湧、廣闊無涯之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海上對外交通最主要的區域。先秦載籍中，南海一詞或泛指南方，或兼指今之東海，西漢以後才用來專指中國以南的廣大海域。東漢揚雄的《交州箴》已將當時交、廣一帶的海域稱為南海^①，劉熙之《釋名》更明確指出：“南海在海南也，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②。因此，古代之南海概念並不限於今之南中國海，往往還泛指南洋一帶（今又稱東南亞）的海域及沿海各國。而本文所敘之南海交通，則包括由今南中國海向南、向西的航道所經，其中又以東南亞地區為主要探討對象。

中國古代南海對外交通的歷史源遠流長，內涵至豐。有關史料在古籍中實如恆河沙數，不勝枚舉。自古以來，中國就十分重視中外之交通與關係，中國史學具有記載、研究四裔及外國的悠久傳統。例如，先秦載籍《山海經》已記有東西南北四方的一百多“國”。中國歷代之正史，從《史記》至《清史稿》，都專為四裔、外國列傳。《資治通鑑》與歷代實錄、會典、會要，《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及大型類書、全國一統志，都記載有關於外國的豐富資料。還有各種地志、地圖、宗教、農學、醫藥、兵家等專書，及一些筆記、雜著，也往往載有關於中外交通之若干片斷。至於記述外國以及中外交通的專門性著作，更是這一領域不可多得的史料源泉。

漢文古代史籍之宏富，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而中國古籍所載的南海交通史料，也具有極高的價值。尤其是東南亞以至印度等國，自己缺乏本國古代歷史的記載，更使中國載籍顯得十分寶貴，而為世界各國學者高度評價。外國研究亞洲古代史地之卓有成效者，莫不多方利用中國的史料。法國學者馬伯樂兄弟在研究中南半島時提到，“其中最可寶貴者要為中國載籍”^③，“中國之地志，自紀元前數百年以迄於今，大抵確實可考”^④。英國東南亞史專家霍爾則云，“中國各朝正史有關與東南亞各國關係的記述……是極其寶貴的，如果沒

有它們，我們就根本無從瞭解扶南與占婆這樣重要的國家早期之歷史了”^⑤。印度歷史學家阿里在1978年給中國學者的信中指出，“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⑥。

儘管中國古代南海對外交通史料頗為豐富，但要把它們蒐集起來並加以使用，卻存在許多的困難；因為其中有許多亡佚了，許多僅存片斷於正史、政書、方志或類書中，許多沒有單行本面世而匯刻於叢書內，許多則早已成了世人難覓之善本。過去學者對這方面的研究，大多局限於個別著作的校訂或註釋；少數文章或書籍雖涉及總體，但份量、深度似嫌不夠^⑦。

綜觀有關南海對外交通之史料，大致可見於下列三種古籍：

1. 大型綜合著作：正史，編年史，政書，一統志，類書；
2. 各類別史雜記：地理著作，宗教著作，農醫兵書，筆記雜著；
3. 中外交通專著。

前兩類雖非有關中外交通之專著，但其中不乏有價值的資料。如《漢書·地理志》中有南海遠航的記載，《新唐書·地理志》有賈耽的“廣州通海夷道”，《宋史·注輦傳》有娑里三文航程。另如《水經注》、《南海志》、《經世大典地圖》、《廣輿圖》、《鄭和航海圖》等地理圖集，《高僧傳》、《齊民要術》、《本草綱目》、《武備志》等宗教及農、醫、兵家要籍，《廣志》、《酉陽雜俎》、《萍洲可談》、《夢梁錄》、《前聞記》等雜著筆記，都是不可多得的有關載籍。

至於各種中外交通專著，自然是這一領域的基本文獻。這種書大別可分為六類：

- (1) 交通國外的使節或其隨從之見聞記、回憶錄：如吳康泰《外國傳》，唐王玄策《中天竺國記》，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明馬歡《瀛涯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費信《星槎勝覽》。
- (2) 西行求法高僧之行記：如晉法顯《佛國記》，唐玄奘《大唐西域

記》、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宋繼業三藏《赴天竺記》。

- (3) 旅行家、航海者之遊記、圖經與見聞錄：如唐杜環《經行記》，元汪大淵的《島夷誌略》，明佚名《順風相送》、慎懋賞《海國廣記》，清佚名《指南正法》、大汕廠翁《海外記事》、程遜我《噶喇吧紀略》、王大海《海島逸誌》、黃可垂《呂宋紀略》、謝清高《海錄》、李鍾珪《新加坡風土記》。
- (4) 有關朝貢、市舶的記錄與外事官員之專著：如梁蕭繹的《職貢圖》，唐賈耽《邊州入四夷道里記》，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适《諸蕃志》，明宋濂《渤泥入貢記》、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高岐《福建市舶提舉司志》、王宗載《四夷館考》、張燮《東西洋考》，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梁廷枏《粵海關志》、魏源《海國圖志》。
- (5) 有關同四裔交戰、征伐之實錄：如元佚名《元朝征緬錄》，明佚名《安南棄守本末》、丘濬《平定交南錄》、胡宗憲《籌海圖編》，及清周裕《從征緬甸日記》、王昶《征緬紀聞》、魏源《聖武記》。
- (6) 諸家四裔、外國之專門著作：如唐樊綽《蠻書》，元周致中《異域志》，明黃衷《海語》、鄭曉《皇明四夷考》、嚴從簡《殊域周諮錄》、茅瑞徵《皇明象胥錄》。

這些有關南海交通之專書，其作者生平、寫作背景、綱目內容、版本源流、存佚輯註及史料價值等，都值得我們密切地注意。

鑑於需要研究的資料至為繁多，上述工作絕非個人所能勝任，更非一兩篇短文所可奏效。故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首先探索這一領域的早期史料。

據筆者淺見，古代南海交通大致可分為先秦至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五個時期，每個時期各具特點：

1. 先秦至兩漢時期：由先秦至秦代屬於中外交通之傳疑、萌芽時期，到兩漢則步入開拓時期，彼時以陸路交通為主。
2.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外交通持續發展，陸路仍居主位。
3. 隋唐五代時期：此時為中外交通之勃興時期，海路日趨重要。
4. 宋元時期：宋代海路對外交通已居於主位；元代則海陸並重，而陸路且臻於頂峰。
5. 明清時期：明代中外交通繼續興盛，海路達到極點；清代則屬於新舊交替時期，傳統的中外交通方式告終。

下面就圍繞前兩個時期來介紹南海交通史料。第一章首先勾劃各時期有關史料編撰的特點，然後對各類載籍一一加以介紹。本文題目標明研究範圍為“隋以前中國古籍所載”，唯部分正史、政書或輯佚書雖屬後人所作，然所據材料主要是隋以前的各種圖書資料，為了使當時南海交通概況的敘述更全面、研究更方便，筆者仍然將這類著作置於第一章史料部分，一併予以述評。第二章主要概述當時的海外交通情況，包括航路之開闢及來往的國家與地區。第三、四章則擇取康泰、朱應出使扶南及法顯東航返國等重大事件，展開進一步的剖析，俾有助於從事此類研究的中外學人。

註釋

- ① 《藝文類聚》卷六引。
- ② 見該書卷二·釋州國。
- ③ 馬司帛洛 (G. Maspero) 《宋初越南半島諸國考》，載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137頁。
- ④ 馬思伯樂 (H. Maspero) 《唐代安南都護府疆域考》，載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四編》，商務印書館1941年版59頁。
- ⑤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London, Fourth Edition, 1981, p. 24.
- ⑥ 轉引自季羨林《玄奘與〈大唐西域記〉》一校註《大唐西域記》前言，見《大唐西域記校註》，中華書局1985年版137頁。
- ⑦ 關於古代南海對外交通的史籍與資料，過去有一些文章或著作展開過綜合性的介紹與探討，茲略舉如下：
 〈中國史乘上之南洋〉，管聚仁，《南洋研究》一卷一期，1928年1月。
 〈中國典籍中關於南洋方面記載之敘目〉，陳剛父，《南洋研究》四卷五、六期，1933年。
 〈中國史乘中之南洋史料〉，石涵澤，《南洋研究》六卷三期，1936年6月。

- 〈南洋書目選錄〉，許道齡，《禹貢》六卷八、九期合刊，1937年1月。
- 〈中國南海關係史料述要〉，蘇乾英，《學林》十輯，1941年8月。
- 〈中國人的南洋發展及其記述〉，周匡，《中日文化》二卷三期，1942年3月。
- 〈漢籍南洋名著述要〉，蘇乾英，《南洋研究》十一卷二期，1944年3月。
- 《南海に關する支那史料》，石田幹之助，富山房1945年版。
- 〈南洋文獻敘錄長編〉，許雲樵，《南洋研究》一期，1959年。
- 〈南洋文獻敘錄續編〉，許雲樵，《東南亞研究》一期，1965年。
- 〈中國文獻對南洋歷史的貢獻〉，許雲樵，《南洋文摘》一卷十一期，1960年11月。
- 〈東南亞古史初論〉，陳序經，1963年前。載《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
- 〈我國歷代關於東南亞史地重要著作述評〉，朱傑勤，《學術研究》（廣東）1963年一期。
- 〈中國資料からみた東南アジアの歴史—元明時代の東南アジア華僑のについて〉，藤原利一郎，東南アジア研究2，1963年11月。
- 〈中國載籍中之東南亞歷史地理資料〉（Chinese Sources for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許雲樵，《東南亞研究》一期，1965年。
- 〈中國對東南亞史的研究〉，姚楠，載《星雲椰雨集》，新加坡新聞與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
- 〈東南アジア史に關する中國（漢籍）史料〉，小川博，《社會科學討究》31-1，1985年。
- 《東南亞古史中文文獻提要》，顧海，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 《漢文南亞史科學》，耿引曾，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 〈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輯佚〉，佛馱耶舍，《史學雜誌》一卷一期，1929年3月。
- 〈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向達，《北平圖書館館刊》四卷六號，1930年12月。另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年版。
- 〈晉宋間外國地理佚書輯略〉，岑仲勉，《聖心》二期，1933年。另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
- 〈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書〉，岑仲勉，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
- 〈唐宋時代關於南海之支那史料〉，藤田豐八，《東亞研究》3：2。
- 〈宋明間關於亞洲南方沿海諸國地理之要籍〉，王庸，《史學與地學》一期，1926年12月。
- 〈明代四裔書目〉，朱士嘉，《禹貢》五卷三、四期合刊，1936年4月。
- 〈清代南洋文獻敘錄〉，許雲樵，《蘇島華商糖米雜貨公會十周年紀念特刊》，1941年10月20日。
-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所輯南洋諸篇題要〉，郭敬輝，《禹貢》六卷八、九期合刊，1937年1月。

第一章

古籍所載隋以前的南海交通史料述評

一 先秦至隋南海交通史料特點

中國之歷史自古至夏朝，均屬傳疑時代。商代因有甲骨文及其他文物可資佐證，歷史“信而有徵”，方被目為信史之開端。然就中外之關係而言，先秦載籍所記既少，且難以為據，故秦代以前大抵屬於中外交通之傳疑時期，本章對先秦載籍不作專門介紹，僅於此節略加勾劃。

在先秦載籍中，對中外交通研究價值較大的，首推《山海經》。該書的作者及寫作年代無定論，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作於一時，大致成書於戰國時期，秦、漢略有增補^①。全書共十八卷，包括〈山經〉五卷（南山、西山、北山、東山、中山經），〈海經〉十三卷（海外南、西、北、東，海內南、西、北、東，大荒南、西、北、東，及海內經）。《山海經》雖只有三萬來字，卻包含中國古代地理、歷史、神話、民族、風習、物產諸方面的資料；唯其所載四方的一百多“國”，有許多為先秦時人所記，有許多顯係漢人所增益。這些國家自不免有恢怪不經之處，然恐亦不無海外絕域之實錄，惜距今年代過於久遠，頗難考釋清楚。例如〈海外東經〉與〈大荒東經〉各載有一“黑齒國”，究在東北方或菲律賓，或指東南亞一些地區的居民，就有各種不同說法^②。儘管如此，《山海經》一書仍值得研究海外交通史者重視。

《山海經》還多處記及西方的崑崙山^③，另《逸周書》、《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古籍，以及《尚書》的〈禹貢〉篇也有關於崑崙的記載；它們雖屬於中西陸路交通之史料，然後世出現來自南海之“崑崙”及“崑崙奴”，為追根溯源與展開比較研究，對上述書籍均應留心。此外，《尚書》、《墨子》、《韓非子》等書都記載了堯“南撫交趾”之事，這些有關先秦時與南海國家往來的資料，也值得注意。

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係中國第一個統一中央集權的王朝，但彼時的對外關係，亦僅僅是開始，只能算中外交通之萌芽時期。秦代，中國疆域的基礎奠立，向南征服了南越、駱越，設立了象郡。然因該朝二世而斬，史籍無甚可觀，有關記載須求諸漢朝史書。

西漢(公元前206-公元8年)和東漢(公元25-220年)，中國出現古代最早的盛世，對外關係空前發展，陸、海兩路的中外交通才進一步開拓，相關的記載也逐漸增多。漢代正是中國史籍(包括中外交通史料)出現突破性發展的空前繁榮時期，司馬遷《史記》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先河，且樹立專為四裔設傳的優良傳統，後來《漢書》、《後漢書》均繼承之。同時，漢代有關邊疆民族的雜著逐漸增多，甚至開始出現了中外交通的專著。

到了魏晉南北朝，出現了長期分裂割據的時期。東漢末年的群雄割據，導致了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後雖有西晉的短暫統一，但很快又出現東晉與五胡十六國的割據，接著又是南北朝的對峙。不過彼時於政治上雖然紛爭不已，而在對外交往尤其是南海交通方面，卻較兩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三國時，除蜀國僻處西陲外，魏、吳兩國均東臨大海。魏國不僅交通西域，而且對海外關係也頗為重視^④。東吳為與中原的曹魏勢力相抗衡，尤銳意經營海外之事業，大力發展東海、南海^⑤之交通。入晉以後，中原地區戰亂頻繁，通西域的道路經常受阻；然晉室衣冠南渡，東、南地區的社會經濟漸趨發達，東晉、南朝均致力加強海外交通和貿易。加以魏晉南北朝佛教極盛，中西僧人往來密切，鑑於西域道途時斷時通，許多高僧乃改由海路往返於中國與天竺之間，這也促進了海路交通之發展。

縱觀整個中外交通史的發展趨勢，魏晉南北朝實可謂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其時介乎漢、唐等盛朝之間，對外交通在兩漢的基礎上持續發展，並為後來隋唐之興旺作了準備。當時仍以陸路為主，唯海

路也漸趨重要，日見蓬勃。由於中國與別國外交往來的日益頻繁，佛教等外國宗教的進一步傳播，造船、航海業及海外貿易的不斷發展，航行道路多元化和海洋知識的增長，這一時期有關南海交通的史料大為增多。其編撰的特點有：(1) 除正史外，單獨著作較前大增；(2) 大部分表現為中外地志（異物志等），記載多屬條列式；(3) 出現了旅遊、航海行紀或外交記錄等多種專著。下面試分類述評有關秦隋之間南海交通的著作。

二 大型綜合著作

（一）正史：

1. 《史記》：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西漢司馬遷（約公元前145-約前86）撰，大概成書於太初元年（前104年）至作者逝世前。全書計一百三十篇，以人物傳記為中心，包括本紀十二、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另以八書記制度沿革，立十表通史事脈絡。其記事起自傳說中之黃帝，迄於西漢武帝時期，首尾凡三千年左右^⑥。

《史記》中的四裔列傳有東越、朝鮮、西南夷、匈奴、大宛等，但有關中外交通的史料並不限於此。如卷六秦始皇本紀、卷十五、卷四八及卷一一三南越尉佗傳，都提到秦初設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之事。卷一一六西南夷傳記及身毒，即印度。卷一二三大宛列傳記載張騫通西域時，提到身毒及安息、黎軒（即後來的大秦）等西域國家，它們雖然由陸路而往，但兩漢時通過南海亦可輾轉抵達。

2. 《漢書》：東漢班固（公元32-92）撰。一百篇（分120卷），包括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成於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至建初八年（83年）。該書創始於班彪的《史記後傳》，彪死後其子固整理補充，撰成是書；其中八表和《天文志》未成書，由固妹班昭及馬續二人續成。全書體例大致沿襲《史記》，唯改書為志，廢世家入

列傳，並創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而為後世效法。由於包舉西漢一代（前206-公元24年，包括新莽在內），該書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⁷。

《漢書》的四裔列傳和《史記》大致相同，包括匈奴、朝鮮、兩粵、西南夷、西域等。有關東南亞地區的材料，主要仍然集中於今越南北、中部一帶，即漢武帝所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⁸。另西南夷傳記及身毒，西域傳提到安息、犁靬（即大秦）。值得注意的是，西漢正是中西交通廣泛開展的時期，除陸上西域通道外，也出現由西南或南海前往西方的路線⁹，而這幾方面的記載，都見諸《漢書》。《漢書》卷廿八下〈地理志〉首載了由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道，詳情可見下述。

3. 《後漢書》：此書為劉宋范曄（398-446）所撰，所記係東漢事，所據亦多東漢資料。全書共一百二十卷，為紀傳體東漢史（公元25-220年）。約成書於元嘉九年（432年）至作者逝世時止。原書只有十紀、八十列傳，而缺表、志，梁朝劉昭取司馬彪《續漢書》的八志（三十卷）補其不足，北宋時二者合刻成一書，即今本之《後漢書》¹⁰。

《後漢書》的四裔列傳有東夷、南蠻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等。比起《漢書》，其所載南海交通地名有所增加，反映了東漢一代中外航海交通更為發達的事實。關於越南地區，仍包括象郡、交趾、九真、日南、象林、越裳等¹¹。除此之外，《後漢書》中一些南海地名涉及從今菲律賓到緬甸的廣大東南亞地區，如黑齒、葉調、究不事、敦忍乙、捍國¹²等。

除了東南亞地區外，後漢時期也有許多關於西亞的記載，同南海對外交通不無關係。例如和帝永元九年，甘英奉班超之派出使大秦，經阿蠻、斯賓、于羅等西亞地區，“窮臨西海而還”，事見《後漢書·西域傳》。甘英雖未抵達大秦，但其行程對中西交通

肯定有所貢獻。據同書記載，“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這是漢朝與大秦即羅馬帝國第一次通使的明確記載，而羅馬使者之來華應由海路經今馬六甲海峽，抵達越南的中南部。

(附)《東觀漢記》：該書係東漢官修的國史，從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起，歷一百六十多年，經班固、劉珍等二十多個歷史學者，先後幾次努力合撰而成。因章帝後東觀繼蘭台成為宮廷藏書及修史之所，故名。全書亦採紀傳體的體例，紀、傳、表、志俱全；據《隋書·經籍志》載，有一百四十三卷，《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記為一百二十七卷，今存二十四卷。《東觀漢記》雖殘缺不全，但它曾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後漢書》一些史料多取材於它，故頗具價值。有關東南亞的史料大致同前，包括交趾、九真、日南、葉調、憐國等¹⁹。

4. 《三國志》：西晉陳壽(233-297)撰，屬紀傳體的斷代分國史。全書六十五卷，分敘魏、蜀、吳三國之史實，其中《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有紀、傳而無表、志。除《魏志》外其他二書亦未立外國專傳，有關南海交通的史料多散見於《吳志》各傳中。《三國志》卷三〇《魏志·東夷傳》載有“黑齒”，因該書早於《後漢書》，所以是東方黑齒有地望資料的最早記載。全書尤其《吳志》則出現許多有關交州、交趾、九真、日南等記載，包括交趾太守士燮傳，及呂岱等平定交州之事跡²⁰。應該留意的是，《三國志》對中南半島的記載，有一些新的突破，其範圍擴及今越南南部、柬埔寨乃至老撾，例如卷六〇《吳志·呂岱傳》所載的扶南、林邑、堂明諸國²¹。

論述《三國志》，尚有一事須提及，即南朝宋裴松之曾為該書作註。他博引群書，使註文多出正文三倍。據計，裴註所引古籍約達一百五十多種，而它們今日失傳者什八九，幸虧因此而得以保存一部分或得知書名。故裴註實際上是對《三國志》的增補²²，

其史料價值有過之而無不及。像魚豢《魏略》之部分即賴此留傳，其中就有佛教始傳中國、交通大秦行程等寶貴資料。

(附)《魏略·西戎傳》：《魏略》五十卷，魏魚豢撰。該書早佚，《舊唐書·經籍志》已載為三十八卷，後世繼續流失，賴裴松之註《三國志》而保存一小部分。唯這一小部分，尤其是《西戎傳》，對中外交通已具重大之價值。該傳記錄了漢代以後交通西域的新途徑—北新道，提到了由益州、永昌的西南道至天竺之路線；載明浮屠（即佛陀）誕生於臨兒（Lumbini），西漢末景盧從伊存口授《浮屠經》，是為佛教初傳中國的原始記載。該傳還記載，當時大秦既可由海北陸路通達，“又循海而南與交阯七郡外夷通”，後者應即東漢以來大秦使者、商人來華之通途¹⁷。

5. 《晉書》：唐代房玄齡等撰，一百三十卷，紀傳體晉代史（265-420年，包括西晉、東晉）¹⁸。該書的四夷傳包括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西戎傳提到大秦，南蠻則有林邑、扶南兩個專傳，其中林邑較詳而扶南稍略¹⁹；林邑傳記有范文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事²⁰。由於該書過重詞藻之修飾，又屬後人改編，某些史料之價值不如前人之作。例如，關於扶南的記載，就大大比不上《南齊書》、《梁書》。然以諸家晉書僅此尚存，故仍是研究晉代南海交通之重要著作。
6. 《宋書》：南朝梁沈約（441-513）撰，一百卷，紀傳體之劉宋（420-479）史，包括十紀、八志（三十卷）、六十列傳。由於成書早，接近所記之朝代，故保存不少珍貴的材料。該書卷九七為夷蠻傳，專為許多南海國家或地區立傳，本紀也有不少南海諸國入貢之記錄，反映了當時海外交通發達的實況。例如，林邑、扶南、訶羅陀（陀）、呵（訶）羅單、婆（槃）皇、婆（槃）達、婆利、閭婆達達、斤陀利、蘇摩黎、師子乃至天竺迦毗黎等²¹，包括今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加里曼丹島、爪哇島、蘇門答臘島以及斯里蘭卡、印度的廣大地區²²。

7. 《南齊書》：南朝梁蕭子顯(489-537)撰，為紀傳體之南齊(479-502)史。原書六十卷，今本亡佚序錄一卷，僅餘八紀、八志(十一卷)及四十列傳。是書材料真實，文字簡練工整，保留了南齊一代的珍貴原始材料。該書紀、傳所涉南海諸國朝貢之事較少²⁶，但外夷列傳有“東南夷”一項，其中有林邑、扶南二傳。扶南傳頗詳，由於《宋書·扶南傳》只有一行，故該書成了正史中記載扶南最早最詳的一部。此外，該書的〈荀伯玉傳〉有云，“……又度絲錦與崑崙舶營貨，輒使令防送過南州津”，是為最早記及崑崙舶的載籍²⁷。
8. 《魏書》：北齊魏收(506-572)撰，一百三十卷，紀傳體之魏代(386-550，包括北魏、東魏)史。由魏收一人獨力完成，資料豐富，記載及時，頗有價值。因北魏、東魏轄境在北方，故該書四夷傳中無南海諸國專傳，但本紀及西域傳中有關於交阯、西天竺、南天竺、婆羅門、條支、安息、波斯、斯羅、大秦的一些記載²⁸，另〈釋老志〉敘及佛教輸華之經過，均值得注意。
9. 《梁書》：唐姚思廉(557-637)撰，五十六卷，紀傳體南朝梁代(502-557)史。該書雖成於唐，但所據多梁代史籍，有關南海交通資料頗為可貴，尤其是卷五四諸夷傳中的“海南諸國傳”，記述了一些前所罕見的史事及地區。例如，扶南、中天竺等國傳提到三國吳時康泰、朱應出使扶南之事，是為見於記載中國派往海外的最早南海交通專使。此外，扶南傳出現了徼國、屈都昆、九稚、金鄰、頓遜、毗騫、諸薄、馬五洲、自然火洲及漲海、大漲海諸名(大多出於康泰等所撰專書，詳情見下載)，另有盤盤、丹丹、干陀利、狼牙脩、婆利、師子等專傳，包括今東南亞的廣大地區²⁹。該書的東夷傳記有黑齒、扶桑等。扶桑或被指為日本，或被指為今美洲的墨西哥等地，然無確證，因非南海交通之範疇，故爾從略。
10. 《陳書》：唐姚思廉(557-637)撰，三十六卷，紀傳體南朝陳代

(557-589) 史。全書包括本紀六卷、列傳三十卷，無四夷專傳；但紀、傳含有一些南海地區的資料，如交趾、扶南、干陀利、狼牙脩、丹丹、盤盤²⁹。至於位在今泰國地區的頭和，則屬於首次出現³⁰。

11. 《北齊書》：唐李百藥(565-648)撰，五十卷，紀傳體之北齊(550-577)史。全書無表、志，也無四夷傳，幾無與中外交通相關之資料，更遑論南海交通了，茲從略³¹。
12. 《周書》：唐令狐德棻(583-666)撰，五十卷，紀傳體北周(557-581)史。包括本紀八卷、列傳四十二卷，缺表、志。卷四九、五〇為異域傳上下，後者有安息、波斯專傳³²。
13. 《南史》：唐李延壽撰，八十卷，紀傳體南朝宋、齊、梁、陳四代之歷史。該書與《北史》均始於延壽之父李大師，成書於貞觀十七年(643)至顯慶四年(659)。全書包括本紀十卷(宋三，齊二，梁三，陳二)、列傳七十二，無表、志。該書有夷貊傳，內含海南諸國、西域等目，但其材料大致源自《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³³。
14. 《北史》：唐李延壽撰，一百卷，紀傳體北朝魏、齊、周及隋朝之歷史。其編撰過程、成書年代與《南史》同。全書有本紀十二(魏五，齊三，周二及隋二)、列傳八十二。其夷貊傳含蠻獠、西域諸目，包括林邑、赤土、真臘、婆利等；唯該書所載的赤土、真臘，應來自《隋書》，其名始見於隋，故這裏不歸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南海交通範疇³⁴。

(二) 政書：

1. 《西漢會要》：此書成於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與《東漢會要》均徐天麟所撰。因係據《史記》、《漢書》等資料編寫而成，故置於此一併介紹。該書涉及外夷的材料，主要集中於卷六四至六七方域，卷六八至七十蕃夷，包括有今越南、印度的一些地方³⁵。

2. 《東漢會要》：成於南宋寶慶二年(1226年)，主要取材於范曄《後漢書》，另參考了《東觀漢記》、《漢雜事》及司馬彪的《續漢書》等書。卷三七至三八方域、三九至四十蕃夷有關於南海交通之史料³⁴。
3. 《三國會要》：清楊晨撰，二十二卷。鑑於《三國志》中無“志”，清末湯成烈著《季漢書》僅為蜀撰“志”，錢儀吉《三國會要》取材不廣且書稿殘缺，故楊晨乃仿徐天麟“兩漢會要”體例編撰是書。該書初刊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記載了三國時的典章制度，包括帝系、方域、四夷等十五門、八十四目。是書取材雖廣，然著作時代較晚，僅起搜殘補缺之作用，在南海交通方面並無特別罕見之史料³⁵。
4. 《兩晉南北朝會要》：清朱銘盤撰。據朱氏《桂萼軒遺集》，他曾編撰《兩晉會要》八十卷³⁶、《宋會要》五十卷、《齊會要》四十卷、《梁會要》四十卷、《陳會要》三十卷，另又擬撰北朝魏、齊、周及隋之會要，合稱《兩晉南北朝會要》。其取材、體例，不出兩漢、三國會要之巢臼。

三 各類雜著地志

(一) 文集雜記：

1. 《漢武洞冥記》：該書《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作“《漢武洞冥記》，一卷，郭氏撰”。《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雜傳作“《漢別國洞冥記》，四卷，郭憲撰”。《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三·神仙作“郭憲《漢武別國洞冥記》，四卷”。該書或考為東漢郭憲，或考為梁元帝所撰³⁷。其所述雖多神仙或小說家言，但也雜有大秦等地之記載，原書已散佚，賴《太平御覽》等輯存³⁸。
2. 《神異經》：該書《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地理作“《神異經》，一卷，東方朔撰，張華註”，《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地

理、《新唐書》卷五〈藝文志〉三·神仙大同。書中記有崑崙山等地，唯多神怪之事。此書及下述《十洲記》或疑均非東方朔所撰，而為後人依託³⁹，姑錄於此。

3. 《十洲記》：該書《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地理作“《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地理、《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三·神仙所載同。其中關於南海一帶的地名大致有南海、西海、崑崙、火林山、火洲、長洲、鳳麟洲等。
4. 《博物志》：魏晉南北朝時，社會動亂，各種宗教盛傳，故志怪筆記小說流行，而許多珍貴的史料往往夾雜其中。西晉張華(232-300)的《博物志》就是這類志怪書的代表作之一。該書之通行本共十卷⁴⁰，繼承了《山海經》的傳統，記及山川地理、鳥獸草木、神仙方技乃至佚聞故事。其中有關南海交通的史料雖然不多，但亦不無可供參考之處。如卷一至卷三載有交趾、日南、九真、黑齒、崑崙、大秦及南海、西海等。卷四提到“四海之外皆復有海，南海之外有漲海，北海之外有瀚海”。
5. 《搜神記》：晉干寶撰，原有三十卷，今存二十卷⁴¹。該書為志怪小說的代表作，間中雜有一些海外交通材料，如卷二提到天竺胡人來華之事，及扶南王范尋養虎、鱷治犯人之罪⁴²。
6. 《拾遺記》：晉王嘉撰，梁蕭綺錄，又作《王子年拾遺記》，今本十卷⁴³。該書雖屬志怪小說，但蒐羅不少先秦至魏晉的域外地名，值得參考或訂正，如泥離、旃塗、因祇、燃丘、扶婁、塗脩、扶桑、瀛洲、浮提、沐胥、申毒、盧扶、騫霄、浮忻、日南、祈淪、因霄、含塗、條支、胥徒、因墀、頻斯、浮支、祖梁、申彌等等。《類說》五引有《拾遺記》之佚文：“西國菜名頗稜，因僧攜子入中國，訛為菠稜”，過去或有以菠稜菜生於南海波稜國，今則多認為產自西亞之伊朗。觀上所述，則《拾遺記》所載並非盡為小說家言。

7. 《異苑》：東晉至劉宋時劉敬叔所撰，十卷，亦志怪小說一類。《太平御覽》等類書多有引錄。卷三、卷九載有關於扶南之資料。
8. 《交州牋》：晉俞益期致韓康伯的信，內中敘及交州（包括今越南北部）一帶的風土人情。諸書所引又作《俞益期與韓康伯書》、《俞益期牋》、《俞益期與韓豫章牋》⁴⁴。
9. 《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等註，又稱《昭明文選》。全書共六十卷⁴⁵，收有晉左思的《三都賦》，其中《吳都賦》提及“烏澍、狼臄，夫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晉劉逵（淵林）為該賦作註，引用了一些《異物志》的材料，頗值得留意。
10. 其他雜記：關於這一時期的南海史料，尚有一些其他雜著，有的見於諸家藝文志。如“南海”一名，已見於東漢揚雄的《交州箴》、劉熙的《釋名》等書。另據顧懷三《補後漢書藝文志》，有《撣國樂》、《天竺書》，唯須加辨析。該書卷三·樂類載：“撣國樂：西南夷傳，安帝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遣使朝貢，獻樂及幻人……”，此“撣國樂”應屬樂章。該書卷八佛書類載：“天竺書，四十二章，天竺沙門攝摩騰譯。”此即指漢明帝時遣使以白馬馱來的“四十二章經”，非一般的史籍。此外，晉人《西京雜記》、《玄中記》，晉崔豹《古今注》，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梁劉孝標註），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姚最《續畫品》等，都含有一些古代南海交通之史料。

（二）農學著作：

《齊民要術》：北魏賈思勰撰，十卷，約作於公元五世紀末、六世紀初⁴⁶。該書係中國最早最完整的一部農書，因涉及中外作物的交流，引用了《南州異物志》等前代大量圖籍，對中外交通史之研究頗有價值。其中卷十記載外國較多，包括今越南（交趾、九真、日南）以至斯調⁴⁷、天竺等。另卷五、卷六也間及日南或九真等。

(三) 宗教著作

1. 《太清金液神丹經》：收正統《道藏》“洞神部眾術類”，上、中、下三卷，分別託為張陵、陰長生、葛洪所撰。卷下記產丹砂、香藥之國，涉及域外地理頗多，或以為係晉葛洪所撰，或以為乃宋朝以後之著作⁴⁸。由於卷下曾據《吳時外國傳》、《南州異物志》及其他載籍，記述了下列南海各地，故可作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海諸國地志之參證與補佚：交趾、日南、林邑、象林、西圖（即西屠）、扶南、典（頓）遜、都昆、比嵩、句稚、社薄、無倫、歌營、蒲羅、林楊、加陳、師漢、斯調、炎洲、扈犁、古奴調、察牢、葉波、天竺、安息、優鉢、罽賓、月支以及大秦、隱章、拂林等等。
2. 《高僧傳》：梁釋慧皎撰，十四卷⁴⁹。全書分譯經、神異等十門，記述了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梁武帝天監十八年（519年）間二百五十七位僧人之事跡，附見者亦有二百多人。其中不乏往來於中國、西域間播教或求法者，對研究早期中西交通頗為重要。由西域來華播教、譯經之高僧有攝摩騰、竺法蘭、支婁迦讖、康僧會、佛圖澄、鳩摩羅什、佛陀耶舍、佛馱跋陀羅、曇無讖、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僧伽跋摩等；而佛陀跋陀羅（卷二），求那跋摩、僧伽跋摩（卷三）以及耆域（卷十）等均由海道往來或到過南海地區。該書所記赴西域求經並寫下遊記的中國僧人有法顯、道普、法盛、曇無竭、寶雲、智猛，而法顯、曇無竭、智嚴等均經過南海，可惜除法顯《佛國記》外，其餘行記多失傳或只留下若干片斷。
3. 《洛陽伽藍記》：北魏楊街之撰，五卷⁵⁰，專記洛陽佛寺。其與中外交通歷史之關係，除記述佛寺盛衰可供研究外來宗教在華之傳播外，主要有下列兩點：（1）卷四在敘及永明寺時，提到有沙門菩提拔陀自歌營國⁵¹經勾稚、典孫、扶南、林邑而入梁，並向中國僧人介紹（古）奴調、斯調、大秦、安息、身毒等的情况。

(2) 卷五輯有宋雲、惠生西遊的行記，本來二人之書已佚，賴有《洛陽伽藍記》而識其概略，故向為中外學者所重視。此二書及其校注情況，另見下述。

4. 其他宗教著作：晉佚名《蓮社高賢傳》、葛洪《抱朴子》，也雜有一些南海交通材料。如《蓮社高賢傳》(一卷)敘述佛陀跋陀羅經由交趾來華播教之事跡。《抱朴子》記有扶南國出金剛等物產⁵⁹。

(三) 地理著作：

1. 《異物志》：“異物志”是中國古代地志的一種形式，專記某一地區的物產、民俗、傳說等等，其名式始見於東漢。據《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地理所載：“《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地理、《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地理均載有楊孚《交州異物志》一卷。關於楊孚的生平，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十一·地理有云：“《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明區大任《百越先賢志》：楊孚，字孝元，南海人，章帝朝舉賢良對策上茅拜議郎，南海屬交趾部刺史，競事珍獻，孚乃枚舉物性靈悟，指為異品以諷切之，著為《南裔異物志》。”然則楊孚《異物志》或《交州異物志》又稱《南裔異物志》。該書早已亡佚，賴一些書籍輯存⁶⁰。從現存的條文看，其中記及南海地區的有幾十條，涉及交州、象郡、交趾、九真、日南、象林、西屠、黑齒諸地。

不過，在利用《異物志》的資料時，必須留意分辨真偽。如《初學記》所錄部分條文，並稱楊孚《臨海水土記》，另上引區大任《百越先賢志》曾云楊孚“後為臨海太守，復著《臨海水土記》”，此乃誤將吳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與楊孚《異物志》混為一談。另曾釗曾據黃泰泉的《廣東志》等輯出《楊議郎著書》，收入《嶺南遺書》第五集，略謂“粵人著作見於史志，以議郎為始。爰刺取諸物，以宋為斷，稱楊孚撰者，得若干條，編為一帙；其不著撰名，惟

稱《異物志》者，雖灼知為議郎書，亦別為一帙附於後”。其實，這些所謂《異物志》文，並非全是楊孚撰，有些即上述《臨海水土異物志》，或與其同時代的吳萬震《南州異物志》⁵⁴，或其他異物志的略稱，必須一一認真加以核對。

2. 《南州異物志》：吳萬震撰。為三國時記述南海諸國地理風習的重要載籍，其價值與康泰《吳時外國傳》相伯仲。惜久已亡佚，賴諸書引錄得以保存。據《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地理載，“《南州異物志》一卷，吳丹陽太守萬震撰”。其為丹陽太守約當吳黃武至嘉禾間（約公元222-237年），唯生平始末則無考。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唐宋諸書所引殘文看⁵⁵，《南州異物志》記有扶南、都昆、杜（杜）薄、加陳、歌營、斯調、師漢、扈利等數十個南海交通地名，足可與《吳時外國傳》、《太清金液神丹經》及晉宋間諸地志相校勘，有關詳情容後介紹。
3. 《臨海水土志》：吳沈瑩撰，《隋書·經籍志》作“《臨海水土物志》一卷，沈瑩撰”，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則作《臨海水土異物志》。該書自宋代後已佚，散見於《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有《臨海記》等各種異名⁵⁶。唯該書主要述及東海一帶的風土物產，記載了夷洲諸地，於南海交通關係不大。
4. 《交州雜事》：晉佚名作，有《交州雜記》、《交州雜事記》、《交州雜故事》等異名，已佚。《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著錄：“《交州雜事》九卷（記士燮及陶璜事）”。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均作《交州雜故事》九卷，脫夾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輯錄該書之文，有晉太康四年（283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銀鉢等物事，故是書應作於公元283年以後⁵⁷。
5. 《交廣春秋》：晉王範撰，早佚。《隋書·經籍志》不載，《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地理著有“王範《交廣二州記》一卷”。但《三國志·吳志·孫策傳》裴註曰：“臣松之按，太康八年，廣州

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後漢書·郡國志》註引及《水經注》溫水、泚水注並稱為《交廣春秋》⁵⁸。

6. 《南方記》：晉徐衷撰，早佚。該書不見《隋書》、兩唐書著錄，唯唐、宋類書多有輯引。《藝文類聚》有徐衷《南方記》，另有《南方草木狀》、《南方草物狀》而不標著者。北魏《齊民要術》卷十所引《南方草木狀》、《南方草物狀》亦未錄著者名。但《初學記》則有徐衷《南方草物狀》，《太平御覽》也有徐衷《南方記》、徐衷《南方草物狀》、徐衷《南方草木狀》⁵⁹，故該書應不止一名。據諸書所引，其書載有交趾、扶南一帶之草物，部分條文為今本《南方草木狀》所襲。
7. 《南方草木狀》：今本《南方草木狀》共三卷，舊題晉嵇含撰，記錄交趾、九真、日南、扶南及南海各地的植物，凡八十條。唯唐、宋書引《南方草木狀》、《南方草物狀》，或不標著者名，或作徐衷撰；至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方作“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宋史·藝文志》等因之。晉人左圭的《百川學海》收錄該書，題為“永興元年十一月丙子振威將軍襄陽太守嵇含撰”。經一些學者考訂，認為該書非嵇含所作，乃宋人抄襲宋代及其前各種書籍拼湊而成⁶⁰。
8. 《南中志》：晉魏完撰，早佚，不見隋、唐經籍、藝文志著錄。晉劉逵註左思《蜀都賦》引有魏《南中志》，《唐會要》卷一百云“魏、晉間有著《西南異方志》及《南中八郡志》者”，清章宗源、姚振宗二家《隋書經籍志考證》認為《南中志》與《南中八郡志》應即一書。該書記有交趾、剌國之風土物產，是較早涉及今緬甸地區之古籍⁶¹。
9. 《廣志》：晉郭義恭撰，原佚，賴晉、宋間諸書引錄及後人輯存，是為研究魏晉間南海諸地風土物產重要載籍。早在南北朝之際，戴凱《竹譜》、酈道元《水經注》、賈思勰《齊民要術》已引用此書。《新唐書·藝文志》載：“郭義恭《廣志》，二卷”。原不知作者為何

時人，但《太平御覽》卷九三八輯該書鯢魚一條，稱引徐廣《史記》註，故知其為徐廣以後。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輯為上、下二卷，凡二百六十餘條⁶³。其所述之南海交通地名包括交趾、九真、日南、扶南、諸薄、火洲、巨延洲、剌國、黃支、天竺、斯調、安息、大秦等等。可與《吳時外國傳》、《南州異物志》、《太清金液神丹經》等參校。

10. 《交州記》：晉劉欣期撰，早佚。《隋書·經籍志》及兩唐書經籍、藝文志不錄，但屢見《水經注》、《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引錄⁶⁴，是為研究魏晉間嶺南及交趾一帶的重要地志。曾釗輯有二卷，刻入《嶺南遺書》，唯有些並未標明為劉欣期之書；而歷史上以《交州記》為名者實不止一家，如《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七引有姚文感《交州記》，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卷三·地志類著錄有“鄧中岳《交州記》三卷（《豫章古今記》云豫章人）”。此外，魏晉時與交州有關的載籍尚有：士燮《交州人物志》（見《三國藝文志》卷二·傳記）；《交州名士傳》（見《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晉范瑗《交州先賢傳》三卷（《隋書·經籍志》載）。
11. 《交廣記》：諸書所引晉人之《交廣記》有二家：一為王隱《交廣記》，見《三國志·吳志·呂岱傳》註引，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卷三·地志類疑王隱為《交廣春秋》作者王範之誤；一為黃恭《交廣記》，見《北堂書鈔》卷七二及《太平御覽》卷一五七、四一四、二五五所錄，該二書尚引用黃義仲《交廣記》或黃義仲《交廣二州記》，另《藝文類聚》有黃恭《交廣記》，疑均為同一作者所著。
12. 《華陽國志》：東晉常璩撰，十二卷。成書於永和十一年（355年）之前。該書記述了西南（主要是巴蜀、漢中、南中）地區的歷史、地理及仕女，是保存迄今最早較完整的地志。有關南海交通地理，集中於卷四“南中志”，提及今越南、老撾、緬甸的地理風習，出現交趾、九真、徼諸名。另卷十、十一也兼及交州、交趾、日南等⁶⁴。

13. 《南越志》：南朝宋沈懷遠撰，早佚。《隋書·經籍志》載，“《南越志》八卷，沈氏撰”。兩唐書經籍、藝文志作“沈懷遠《南越志》五卷”。《水經注》、《齊民要術》、《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太平廣記》諸書多所引用⁶⁵，其異名有《南越記》、《南越書》、《南越傳》等。該書記古南越王史事、嶺南地理，兼及南海諸地，頗類《華陽國志》。所錄南海交通地名包括交趾、九真、日南、龍編、比景、扶南、杜（社）薄、波羅基、斯調、波斯、大秦等。
14. 《廣州記》：晉、宋間以此為名之書亦有數家，據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地理，包括裴淵《廣州記》、顧微《廣州記》及劉澄之《廣州記》。裴淵《廣州記》，據《水經注》、《齊民要術》、《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所錄，或作裴氏《廣州記》、《裴淵記》、裴淵《南海記》、裴淵《海東記》等⁶⁶。顧微《廣州記》，或又作顧微《南海記》、《南海經》等⁶⁷。此二人之生平時代不詳，有晉人或宋人諸說，阮修《廣東通志》謂顧微為晉人、裴淵為宋人。另尚有許多載籍僅錄《廣州記》，而未著撰者之名⁶⁸。顧名思義，《廣州記》主要係記南越、嶺南之事，包括交趾、九真、日南等，另間及巨延洲等南海諸國。
15. 《水經注》：北魏酈道元（466或472？-527）撰，四十卷。《水經》原為古代第一部記述河道水系之專著，漢桑欽撰，後酈道元作了二十倍於原書的補充、註釋，使其發揚光大，古今馳名。歷來對該書校釋之名家輩出，不勝枚舉⁶⁹。而該書之關乎南海交通也頗密切，主要表現在卷一河水、卷三六溫水、卷三七葉榆水、浪水及卷四十斤江水諸篇，引用了大量早已亡佚的有關古籍，如楊氏《南裔異物志》、康泰《扶南傳》、郭義恭《廣志》、《南越志》、裴淵《廣州記》、《林邑記》、劉欣期《交州記》、王氏《交廣春秋》、竺芝《扶南記》、釋氏《西域記》、《交州外域記》、《俞益期與韓康伯牋》等，乃至《法顯傳》等名著。諸書所涉史料，遍及南海諸國以至西

域一帶，除今越南的大量地名外，尚有屈都、扶南、林楊、金陳、拘利、潭楊、擔袂、加那調、私訶條等。

四 中外交通專著

(一) 出使紀傳：

1. “張騫出關志”：嚴格說來，在兩漢時期，尚未出現南海交通乃至中外交通的專著，但有所謂“張騫出關志”與“班勇西域記”值得一提，並加辨析。《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地理載有“張騫出關志，一卷”。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地理指出，“張騫出關志，一卷：崔豹《古今注》曰：‘酒杯藤出西域，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洪遵《泉志》外國品亦引張騫出關志”¹⁰。由於該書早佚，後世所傳幾段引文亦難窺全豹，故學者或疑其非張騫自作，係後人附會冒作¹¹。竊以《隋書經籍志》等書“張騫出關志”之標點，既可作張騫《出關志》，亦可作《張騫出關志》；唯《史記·大宛列傳》有云“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顯見該傳乃據張騫之報告而作，故未可完全否定存在張騫《出關志》的可能。
2. “班勇西域記”：顧懷三《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五·輿地類云，“班勇《西域記》：勇，超次子。《後漢書西域傳》：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前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也”。姚振宗《後漢藝文志》卷二地理類作班勇《西域風土記》，另又載班超《西域風土記》。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曰“班勇有《西域諸國記》若干卷，今全卷在范書”。班勇《西域記》今亦不存，賴范曄《後漢書·西域傳》以傳；不過，該傳亦非全屬班勇《西域記》文，須仔細辨別¹²。
3. 《扶南傳》：三國吳時康泰撰，早佚。中國最早記載南海諸國的專

書，也是最早訪問南海的專使之記錄。康泰與朱應均為孫權派往扶南的使者，回國撰有出使記錄。隋、唐經籍及藝文志只載朱應而未著康泰之書，但魏晉至唐宋諸書所錄卻全標康泰的著作，而未輯引朱書。而且諸書所載之康泰書名也大相歧異，有《扶南傳》、《外國傳》、《扶南土俗傳》、《吳時外國傳》等等。因此，關於康泰等人之出使扶南，其著作真實情況判斷及輯存，一直成為後世學者研究的課題⁷⁶。本文稍後亦將以專章探討之。

4. 《扶南異物志》：《隋書·經籍志》載，“《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兩唐書經籍、藝文志同。由《梁書》等知朱應曾與康泰一起出使扶南，但其著作完全亡佚。儘管後人極力想覓其蹤跡，都仍然勞而無功。詳情亦參見後述。

(二) 高僧行紀：

1. 《法顯傳》：東晉法顯（約342-約423）乃中西交通史上首次訪問印度、斯里蘭卡並留下完整行紀的中國人。他年近六十而矢志西行求法，遍歷北、西、中、東天竺之地，後由師子國附舶返回中土，歸著《佛國記》，對弘揚佛法及中西交通的貢獻至偉。該書作於東晉義熙十年（公元414年），又名《歷遊天竺記傳》，或稱《法顯傳》或《法顯行傳》等⁷⁷，是現存最早又比較完整的中外交通名著。全書約萬字，以洗煉之語言敘述了作者往返印度的艱苦經歷，尤其是記錄了由印度經斯里蘭卡返國的航程，是為古代南海航行者最早的實錄⁷⁸，對南海交通之研究貢獻頗大，詳可參見下面專章論述。
2. 《遊行外國傳》：晉釋智猛撰，已佚。《隋書·經籍志》載，“《遊行外國傳》，一卷，釋智猛撰”，《新唐書·藝文志》載“僧智猛《遊行外國傳》一卷”。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卷二云，“案《隋志》釋家類云，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西到華氏城。考元熙，漢劉涓子號也，書當作於西晉時”。但據《高僧傳》卷三的釋智猛傳，猛以姚

秦弘始六年發跡長安，時為東晉安帝元興三年，故西晉之說有誤。該書主要應涉及西域之交通，關乎南海無多¹⁶。

3. 《外國傳》：南朝宋曇無竭撰，已佚。《隋書·經籍志》載有“《外國傳》，五卷，釋曇景撰”。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十一云：“《開元釋教錄》：沙門釋曇景，不知何許人，於蕭齊代譯摩耶經等二部，群錄直云齊世譯出，既不顯年，未詳何帝。案：《法苑珠林》敬佛篇云，昔法盛、曇無竭再往西方，有傳五卷。《釋教錄》云沙門釋法勇，梵名曇無竭，宋永初元年與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遠適西方，元嘉末年達於揚都，所歷事跡別有紀傳云云。曇景，唐智昇撰《釋教錄》時已不詳其終始，或即與曇無竭同行二十五人之內者。”《通典》卷一九一〈西戎傳總序注〉有曇勇《外國傳》，向達認為曇勇與法勇、曇無竭，均屬一人，《隋志》訛勇為景¹⁷。另唐代日本飛鳥寺僧信行作《翻梵語》十卷，常引《外國傳》之文，唯只有四卷。據《高僧傳》卷三釋曇無竭傳，其“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遺跡，別有記傳”，惜該傳已佚矣。
4. 《歷國傳》：南朝宋釋法盛撰，已佚。《隋書·經籍志》及兩唐書經籍、藝文志均著錄釋法盛“《歷國傳》二卷”。《通典》卷一九一作“法盛《歷諸國傳》”。《高僧傳》曇無懺傳後云“時高昌後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其卷數正與信行《翻梵語》所引同，唯其內容主要關乎西域交通。
5. 《佛國記》：南朝宋竺法維撰，已佚。《水經注》卷一、卷二提及天竺國事時，屢引“竺法維云，……”。《高僧傳》卷二道普傳末謂“有竺法維、釋僧表，並經往佛國”。唯隋、唐經籍、藝文志不載其所作何書。《通典》、《太平御覽》等引作“竺法維《佛國記》”，主要涉及印度佛教之事。向達以為法維是晉人，而岑仲勉則考在宋、齊間¹⁸。
6. “宋雲惠生行傳”：《北史·西域傳》載，“（北魏）熙平中，明帝遣

賸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又作惠生，他與宋雲二人均著有行紀：《隋書·經籍志》載“《慧生行傳》一卷”；《舊唐書·經籍志》有“《魏國已西十一國事》，一卷，宋雲撰”，《新唐書·藝文志》作“宋雲《魏國以西十一國事》，一卷”。但此二人之行傳均佚，幸賴北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輯錄，得以識其概略。該書卷五·城北云，“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雲與慧生俱使西域也，……”，在敘及二人之行程後又言“衒之按，惠生《行紀》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紀》，故並載之，以備缺文”。由此可見，宋雲、惠生及與他們同行或先後西行的道榮，均撰過西遊行記，也均賴《洛陽伽藍記》而保存一部分。由楊衒之所錄看，他們應由陸路往返，其行傳極受中外名家所重視⁶⁹。

(三) 外交記錄：

《職貢圖》：梁元帝蕭繹(508-554)作。南京博物院藏有《職貢圖》之殘本，舊多傳為唐閻立德之《王會圖》或閻立本之《職貢圖》，然據史籍考之，實為蕭繹原作而由後人所摹。新舊唐書之經籍、藝文志均載有“梁元帝《職貢圖》一卷”。《藝文類聚》雜文部引《梁元帝職貢圖序》，巧藝部引《職貢圖贊》，《玉海》卷一五二也有該書之簡介。此書當係蕭繹為湘東王任荊州刺史時所作，金維諾主張繪於大同六年(540)，岑仲勉則認為作於第二年⁷⁰。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說“梁元帝畫外國酋渠、諸蕃土俗本末，仍各圖其來貢者之狀”，可見《職貢圖》乃梁代接待四裔的外交實錄。據梁元帝《金樓子》自序云原纂百國一卷，也有的說是三十餘國，不過到宋時大概只存有二十多國，故《遂初堂書目》地理類作“《梁二十八國職貢圖》”。

據諸書所載加以綜合，梁元帝《職貢圖》所繪來貢之外國、蠻夷使者至少有下列三十一國：(魏)虜國，芮芮，河南，中天竺，師子，北天竺，渴盤陀，武興蕃，滑國，波斯，百濟，龜茲，倭國，高句麗，于闐，新羅，林邑，婆利，宕昌，狼牙修，鄧至，周古柯，呵跋檀，

胡密丹，白題，末國，高昌，天門蠻，臨江蠻，建平，蜚。唯目前殘存之摹本大概只能見到十二國之貢使：滑國使，波斯國使，百濟國使，龜茲國使，倭國使，狼牙修國使，鄧至國使，周古柯國使，呵跋檀國使，胡密丹國使，白題國使，末國使。這些作品真實地記錄了公元五、六世紀不同國度使者之外貌、服飾，是當時中國與各國交通往來的歷史見證。

(四) 外國史志：

1. 《交州外域記》：佚名作。該書不見隋、唐經籍、藝文志著錄，也罕為唐、宋諸類書輯引，唯《水經注》卷三六溫水注有兩處、卷三七葉榆水有四處載錄。前者作《交州外域記》，後者多作《交州外域記》，應以後者為是。該書敘及交趾、九真等未設郡前史事，與西漢路博德、東漢馬援等之平定交趾，似為晉人所作，是研究越南古史的重要著作。
2. 《外國事》：晉支僧載撰，已佚。該書不見隋、唐經籍、藝文志著錄，唯《水經注》河水注及《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屢引之^①。據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雜傳云，“《外國事》，僧支載：謹按見《水經》河水篇注。家大人曰：道元引此書有云‘據’者，晉言十里也；‘半邊’，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是支載為晉時人無疑”。支僧載或被考為東晉時人，應早於法顯而漫遊天竺^②。但該書雖涉及今印度地方頗廣，作者的生平卻無考，難以斷定其為親遊佛地或據他人所云而記，故本文暫置之於“外國史志”而未入“高僧行紀”。除天竺諸地外，該書也記及私訶調，即今斯里蘭卡^③。
3. 《西域志》：東晉釋道安撰，已佚。該書不見隋、唐經籍、藝文志著錄，但《水經注》卷一、二屢引釋氏《西域志》或釋氏《西域記》，其內容涉及西域史地，包括中亞山川及天竺諸地事。《齊民要術》卷十引有《西域諸國志》，《職貢圖》“波斯國使”提及“釋道安《西域

諸國志”’，與《水經注》所錄應為一書⁶⁴。《高僧傳》卷五有釋道安(314-385)，所記乃佛圖澄之著名弟子，然不聞其有往西域之事，或為二人。唯該傳末云，“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母姓竺，後改為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為兩人，謬矣”，姑錄於此以備考。

4. 《扶南記》：南朝宋竺枝撰，已佚。該書不見《隋書》及兩唐書著錄，《水經注》卷一、二引有竺枝《扶南記》，卷三六作竺竺《扶南記》。其文提及南朝宋檀和之伐林邑事，故應作於元嘉二十三年(446年)該役之後。另記及林陽國佛事時，有“竺枝目見之”語，故一般認為《扶南記》作者竺枝曾親至扶南等地。除《水經注》外，《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也引錄該書，但有時只記書名而不及作者，容易與康泰《扶南記》相混淆，須認真辨別⁶⁵。該書記有林邑、扶南、金陳、林楊、頓遜、毗騫、林郎、私訶條、天竺、安息諸地，是晉宋間重要的南海交通載籍，值得與康泰《扶南傳》等記載扶南的專書一併輯佚，並且展開比較性之研究。
5. 《林邑記》：佚名撰。《水經注》卷三六、三七屢引《林邑記》之文，其中提及義熙九年(413年)交趾太守杜慧度與林邑王范胡達交戰之事，則當作於其後。《隋書·經籍志》及兩唐書經籍、藝文志均有“《林邑國記》一卷”，或即同一書⁶⁶。該書記有林邑、西屠、屈都、扶南諸地，是研究古代越南中南部地區及占婆國史不可多得之資料。《水經注》卷三十六在引及“《林邑記》曰：屈都，夷也”後，緊接著提及宋元嘉元年(424年)交州刺史阮彌之征林邑、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檀和之征林邑諸事。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二·地理在介紹《林邑國記》一卷時作了推測：“案《宋書·文帝本紀》：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國，克之，二十四年秋七月乙卯，以林邑所獲金錢寶物班賚各有差。此次宋武北征記之後，或其時檀和之等所上者歟？！”另今

本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下引有“東方朔《林邑記》”云云，按林邑之名出於西漢以後，故此實後人所託，不足為據^①。

6. 其他外國史志：除了以上所述外，尚有一些《隋書·經籍志》記載而早已亡佚，或個別載籍輯錄的著作，茲略引如下：

- (1) 《日南傳》：《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地理載，一卷，佚名。《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地理、《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地理同^②。
- (2) 《交州以南外國傳》：《隋書·經籍志》載，一卷。《舊唐書·經籍志》作“《交州已來外國傳》一卷”，《新唐書·藝文志》作“《交州以來外國傳》一卷”。《太平御覽》卷七九〇西屠國條引用了《交州以南外國傳》^③。
- (3) 《扶南胡書》：《隋書》卷三二云：“《婆羅門書》一卷：梁有《扶南胡書》一卷”，內容不詳。
- (4) 《外國書》：四卷，《隋書》卷三二載。
- (5) 《世界記》：《隋書》卷三三載“《世界記》，五卷，釋僧祐撰”，但《法苑珠林》傳記篇則作：“《世界記》一十卷，梁朝揚州建安寺沙門釋僧祐撰”。
- (6) 《四海百川水源記》：《隋書》卷三三載“《四海百川水源記》，一卷，釋道安撰”。
- (7) 《外國圖》：《水經注》卷一引錄，有“大晉國”之語，應為晉人所撰。但《史記·秦本記》“亶州”〈正義〉有“吳人《外國圖》，或為二書，待考。陳運溶《古海國遺書鈔》則輯作“《外國圖》一卷，（吳）□□撰”。

註釋：

① 古來校註《山海經》者，較著名的有漢劉歆，晉郭璞，明楊慎、王崇慶，清吳任臣、汪紱、畢沅、郝懿行、吳承志諸家。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袁珂的《山海經校注》，係以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

瑯環仙館所刻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為底本，保存了郭璞註全部、郝疏大半及別家之精註。1985年，同書又以《山海經校釋》之名再版。

- ② 希勒格 (G. Schlegel) 認為《山海經》的「黑齒國」在朝鮮以北 (見馮承鈞譯《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卷十《黑齒國考證》，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晉郭璞註《山海經》曾引《三國志·魏志·東夷傳》及《異物志》有關黑齒的記載。前者所記黑齒，梁嘉彬考在菲律賓，參見《明代以前中菲關係小考》(載《公理報》1952年元旦特刊)，《魏志·倭國(今琉球)裸國(今台灣)黑齒國(今菲律賓)考》(載《大陸雜誌特刊》2號，1962年5月)，二文均收入《琉球及東南亞島嶼與中國》(東海大學1965年版)。治非史的一些學者對此則存疑，見吳景宏《中菲關係論叢》，新加坡青年書局1960年版，18-19、72、138頁；另見劉芝田《中菲關係史》，正中書局1969年第三版，215-221頁。至於《異物志》的「西屠梁齒」(除郭璞註引外，《文選·吳都賦》劉逵註亦引用)，此別號黑齒的西屠夷，一般則認為在中南半島(參見筆者與謝方、陸峻嶺編《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版，333-334、773頁)。有關黑齒的分析，尚可參見伯希和 (Paul Pelliot) : Notes on Marco Polo, I, p. 604, Paris, 1959, Imp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
- ③ 《山海經》涉及崑崙凡十數處，其名目包括崑崙、崑崙山、崑崙虛、崑崙之虛、崑崙之丘、崑崙南淵等等。
- ④ 據《三國志》卷三〇《魏志東夷傳》載，倭國女王卑彌呼曾於公元239年(景初三年)。按原文作景初二年六月，然《三國志集解》註引沈家本云應作三年，《梁書》、《日本書紀》引《魏志》文亦作三年，此從之)遣使至帶方郡，郡守劉夏派人送其至京師洛陽。其年十二月，魏帝詔封女王為「親魏倭王」，賜金印紫綬及錦絹、珠寶等物。次年(正始元年，240年)，魏使乃奉詔書、印綬詣倭回訪。正始四年、六年、八年，魏與倭國均有往來之記錄。該文為中國正史中首載日本列島的專傳，所記倭地數十國的詳情，彌足珍貴。惟本文主要論南海交通之史事，故僅附註於此。
- ⑤ 孫吳注意東海交通史之要者，莫過於通夷洲，見《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夷洲之今地，一般多據吳沈瑩《臨海水土記》所載「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太平御覽》卷七八〇引)，考為今台灣島，然亦未必是定論。至於南海交通，則有康泰、朱應出使扶南等盛事，後文將結合史料介紹而述之。
- ⑥ 《史記》原書有缺，後元帝、成帝間褚先生補撰了《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日者列傳》等。後人之註釋有南朝宋裴驥的《集解》，唐司馬貞的《索隱》，張守節的《正義》。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校註本，共十冊。
- ⑦ 該書通行註本有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之《漢書補注》所蒐資料亦頗齊全。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的校註本，共十二冊。
- ⑧ 該書所記越南的部分地區包括：象郡：卷一下、七、廿八下、卅一、九五；交趾：卷六、廿四下、廿八上下、九五；九真：卷六、八、廿四下、廿八下、九五；日南：卷六、廿八下、九五；象林：卷廿八下；越裳：卷十二、六四下、九六下、九九上。
- ⑨ 後代史家常以「絲綢之路」(the Silk Road)來比喻古代中西交通道路，如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的《中國》(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Bd.I, Berlin, 1877)，首先把張騫開鑿的中西陸上通路稱之為「絲路」(Die Seidenstrasse)。後來由雲南經緬、印往西的通路，被稱為「西南絲綢之路」，由海路而西的航路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或「絲瓷之路」。
- ⑩ 該書匯集一代史事，係研究東漢歷史之重要資料。其體例同《史記》、《漢書》，但創立黨閥、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七種類傳，人物專傳亦多以類相從而不論年代之先後。通行之註釋，紀傳部分有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各志有梁代劉昭注。清王先謙有《後漢書集解》。196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校註本，共十二冊。
- ⑪ 如象郡：卷八六，志廿三；交趾：卷六至八、廿四、卅三、卅八、四四、四五、六四、七一、七六、八六，志廿三；九真：卷七六、八六；日南：卷一下、三至八、十上下、廿四、卅二、八十上下、八六、八八，志十六、廿三；象林：卷四、六、八六，志廿三；越裳：卷八六。
- ⑫ 《後漢書》的黑齒見於卷八五東夷傳，梁嘉彬考在菲律賓，參見註(2)。其餘則見下述。
- ⑬ 例如：卷三記有交趾、九真、日南、葉調、揮國，卷五有九真，卷十二有交趾，卷三、十七有日南。
- ⑭ 例如交州：卷三八、四七、五二、五三、五七、六〇、六一、六四、六五；交趾：卷四、三〇、三八、三九、四八、四九、五二、五三、六〇、六一、六五；九真：卷四、四八、五三、六〇；日南：卷四、四八、四九、五三、六五。卷四九為士燮傳，卷六〇為呂岱傳。
- ⑮ 林邑在今越南中南部，扶南包括今柬埔寨及老撾南部、越南南部以至泰國東南部一帶，堂明在今老撾的中、南部。
- ⑯ 後世尚有清趙一清、陶元珍等的《三國志補》，近人盧弼《三國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的校註本共五冊。

- 17 有關該傳所記中外交通道路之研究，可參見：沙畹《魏略西戎傳箋註》，載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中華書局1957年版；伯希和《魏略西戎傳中之賢督同汜復》，載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1962年重版；拙著《中外交通史》，學津書店1987年版，62-67頁。
- 18 近人吳士鑑採集眾說而成《晉書斟注》。中華書局1974年出版的校註本共十冊。丁謙《晉書四夷傳地理考證》一卷，刊於《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
- 19 除卷九七南蠻傳外，記載林邑的尚有卷三、七、十、五七、六七，記扶南的有卷三、八、五七。此外，交州：卷三、七、十、四九、五七、六六、六七、七五、七八、八九、九七、一〇〇；交趾：卷三、九、十、十四、十五、二八、五七、六七、八九、一〇〇；九真：卷八九、九二、九七；日南：卷三、八、十、十四、十五、二一、九七；象郡：卷十四、卷十五；象林：卷十五、九七。
- 20 上述諸地要皆在今越南中、南部，有的則被認為在馬來半島。至於斷句，或作屈都乾、魯扶單。有關資料可參見《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402、553-554、653、694頁。
- 21 中華書局1974年出版了該書的校註本，共八冊。有關南海交通部分地名的卷數可列舉如下：交州：卷二八、二九、三八、四九、七六、八三、九七、一〇〇；交趾：卷二八、二九、三五、三八、九二；九真：卷九二、九七；日南：卷三八、九二、九七；象郡：卷三八；象林：卷三八；林邑：卷五、八、六三、七六、九二、九七；扶南：卷五、二〇、五七、九七；訶羅陁：卷五、九七；訶羅單：卷五；呵羅單：卷九七；婆皇：卷五七；槃皇：卷二九、九七；婆達：卷五、九七；婆達：卷九七；婆利：卷九；閩婆州：卷五；閩婆洲：卷九七；閩婆婆達：卷五；閩婆婆達：卷九七；斤陀利：卷六；蘇摩黎：卷五；蘇摩黎：卷九七；婆黎：卷九七；師子：卷五、九七；天竺迦毗黎：卷九七。
- 22 關於上述訶羅陁至師子的資料，可參見《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201、341、416、450-451、502、724-725、730、808頁。
- 23 中華書局1972年出版了該書的校註本，共三冊。有關南海交通部分地名的卷數可以列舉如下：交州：卷三、五、十四、二八、三八、四〇、四一、五八；交趾：卷二、十四、四一、五八；九真：卷三四；日南：卷十四、五八；象林：卷十四；林邑：卷五八；扶南：卷五八。
- 24 參見饒宗頤《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附論《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船》，載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台灣，1974年6月。
- 25 中華書局1974年出版了該書的校註本，共八冊。有關交趾的記載可見該書卷三、四下、七上、三〇、一〇二、一〇五。丁謙有《魏書外國傳地理考證》一卷，刊於《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另可參見陳連慶下列二文：《魏書本紀中地望不詳西域諸國考實》（《西北史地》1983-3），《魏書本紀中所見印巴次大陸諸國考實》（《敦煌學輯刊》1983-2），均集入作者《中國古代史研究》下冊，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
- 26 中華書局1973年出版了該書的校註本，共三冊。有關南海交通部分地名的卷數可列舉如下：交州：卷二、三、七、五四；交趾：卷三、七、五四；九真：卷五四；日南：卷五四；林邑：卷二、五、五四；屈都昆：卷五四；扶南：卷二、三、五〇；徼國：卷五四；九種：卷五四；金鄰：卷五四；頓遜：卷五四；典孫：卷五四；毗騫：卷五四；諸薄：卷五四；馬五洲：卷五四；自然大（火）洲：卷五四；婆利：卷二、三、五四；干陁利：卷二、五四；婆律：卷五四；狼牙脣：卷二、三、五四；丹丹：卷三、五四；盤盤：卷三、五、五四；盤越：卷五四；師子：卷三、五四。有關各地之資料及考證，可以參見《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113、122、167、195、211、220、341、375、402、493、503、554、594、625、644、661、669、703、704、730、862頁。
- 27 中華書局1972年出版了該書的校註本，共二冊。有關南海交通部分地名的卷數可列舉如下：交州：卷一、六、九；交趾：卷一、七、八、十二；扶南：卷二、五、六；干陀利：卷三；狼牙脣：卷四；丹丹：卷五、六；盤盤：卷五、六。
- 28 頭和應在今泰國湄南河下游地區。參見《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300、752-753頁。
- 29 中華書局1972年出版了該書的校註本，共二冊。
- 30 中華書局1971年出版了該書的校註本，共三冊。丁謙有《周書異域傳地理考證》一卷，刊於《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 31 中華書局1975年出版了該書的校註本，共六冊。有關南海交通部分地名的卷數，可列舉如下：交州：卷一、四、六、七、九、十七、三七、五三、七八；交趾：卷七、九、二九、六六、七〇、七八；九真：卷七〇、七八；日南：卷七〇、七八；林邑：卷一、二、四、六、七、九、十、三七、七〇、七八；扶南：卷二、六、七、九、十、四九、七八；頓遜：卷七八；毗騫：卷四九、七八；諸薄：卷七八；閩婆洲：卷七八；閩婆達：卷七八；馬五洲：卷七八；自然大（火）洲：卷七八；訶羅陁：卷七八；訶羅單：卷二、七八；婆皇：卷二、七八；婆達：卷二、七八；婆利：卷六、七、七八；婆黎：卷七八；斤陀利：卷七八；干陀利：卷二、六、九、七八；狼牙脣：卷六、七、九、七八；丹丹：卷七、十、七八；盤盤：卷七、八、十、七八；頭和：卷七八；蘇摩黎：卷七八；盤越：卷七八；師子：卷二、七、七八。

- ³² 中華書局1974年出版了該書的校註本，共十冊。有關南海交通部分地名的卷數，可列舉如下：交州：卷六七、七三；交趾：卷九五、九七；九真：卷九五；日南：卷九五；林邑：卷十一、十二、七三、九五；扶南：卷九一、九五；訶羅旦：卷九五；婆利：卷九五；丹丹：卷九五；盤盤：卷九五；赤土：卷九五；真臘：卷十二、九五。
- ³³ 該書有1935年商務印書館的《國學基本叢書》本，1955年中華書局據此重印，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另出了校點本。卷二九提及九真、越裳、黃支，卷六四、六九記有交趾、象郡、日南，卷六五提到身毒。
- ³⁴ 1955年，中華書局重印了1935年商務印書館的《國學基本叢書》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另出了校點本。該書卷八提到揮國，卷三八、三九記及交趾、九真、日南、象林，卷三九提及葉調。
- ³⁵ 中華書局1956年據江蘇書局本訂正脫誤，出版了該書的標點排印本。
- ³⁶ 《清史稿·文苑傳》載朱銘盤《晉會要》一百卷。
- ³⁷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小說家類載：《洞冥記》四卷，《拾遺》一卷，東漢光祿大夫郭憲子撰，題《漢武別國洞冥記》。《四庫提要辨證》卷十八子部九，小說家類三記，《漢武洞冥記》四卷，舊題後漢郭憲，今考定為梁元帝撰。
- ³⁸ 該書見於諸家所引的如：《洞冥記》；《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北戶錄》，《香譜》，《事類賦》，《永樂大典》，《本草綱目》；郭子橫《洞冥記》；《初學記》，《太平御覽》，《北戶錄》，《永樂大典》；郭子橫《漢武別國洞冥記》；《初學記》；《漢武帝洞冥記》；《太平御覽》，《證類本草》；《別國洞冥記》；《永樂大典》；郭憲《洞冥記》；《本草綱目》。
- ³⁹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二諸子略云：“又有東方朔《神異經》、《十洲記》……並後人依託。”《百川書志》卷五地理云：“《神異經》，一卷，漢東方朔曼倩撰，晉張茂先註，紀海外荒服異常之事。或曰《十洲記》及此，皆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博士當自鏡也。”
- ⁴⁰ 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有范寧之《博物志校證》，以《秘書二十一種》本為底本，參照其餘十多種版本予以校勘、註釋，且廣泛搜集諸書所引之佚文、歷代書目提要及前人刻本序跋。
- ⁴¹ 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的《搜神記》，由江紹楹校註，以《學津討原》本為底本，廣徵博引，兼及諸書所輯佚文。
- ⁴² 有關扶南王范尋一條，《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四引作《搜神記》，其本事為康泰的《吳時外國傳》或《扶南傳》，見《太平御覽》卷六四三、七一八、七六四、九三八等。另《太平御覽》卷八九二引作《異苑》之文。
- ⁴³ 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了齊治平的校註本，以明世德堂翻宋本作為底本加以整理。
- ⁴⁴ 據《隋書·經籍志》集部所記，俞益期又作喻（俞）希，豫章人。輯錄《俞益期箋》的，有《水經注》卷三六，《齊民要術》卷五、十，《北堂書鈔》卷一一九，《藝文類聚》卷七八，《法苑珠林》卷三六，《太平御覽》卷一八七、七七二、八三九、九二八、九七一、九七二、九八一、九八二，《北戶錄》卷三，《證類本草》卷一二，《本草綱目》卷一四、三一。
- ⁴⁵ 有明嘉靖刻本，以及同治八年（1869年）萬本儀重刻本（據嘉慶十四年胡克家重雕宋淳熙本）。
- ⁴⁶ 《新唐書·藝文志》三·農家（卷九五）著錄：“賈思勰《齊民要術》，十卷”。該書有漸西村舍叢刊本，《叢書集成初編》即據以排印。近年國內出版的版本有：《齊民要術》，中華書局1956年版；石聲漢《齊民要術今釋》，四冊，科學出版社1957-1958年版；石聲漢選釋《齊民要術選讀本》，農業出版社1961年版；《齊民要術選釋》，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繆啟愉《齊民要術校釋》，農業出版社1982年版。
- ⁴⁷ 斯謂之今地有爪哇、斯里蘭卡諸說，有關古籍輯錄之資料，可參考《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758頁。
- ⁴⁸ 除《道藏》外，該書尚有一天閣鈔本等。關於其作者、著作時代及有關南海地理之考證，可參考：陳國符《三洞四輔經之淵源及傳授》，載《道藏源流考》上冊，中華書局1963年版；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同書下冊；饒宗頤1961年作、1969年改定《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載《選堂集林·史林》中，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2年出版；許雲樵《太清金液神丹經中的南海資料》，載《星洲日報》1963年元旦特刊；陳序經《東南亞古史初論》，載《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上卷，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9月版，第153-154頁。
- ⁴⁹ 《高僧傳》十四卷，《隋書·經籍志》二（卷三三）原作釋僧祐撰，但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十·雜傳類辨其誤，指為梁僧慧皎所撰，並獲後人所贊同。參見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中華書局1962年版22-28頁。該書除舊鈔本外，有大正大藏經本、金陵刻經處單刻本等，陳寅恪、湯用彤、蘇晉仁等均對之作過註釋或點校。近年有些出版社則將《高僧傳》及後來各種續作合編出版，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91年，把續藏本之《高僧傳》列入《高僧傳合集》中。日本牧野諦亮等編了《梁高僧傳索引》（京都平樂寺書店1972年版），對學人之研究允稱方便。
- ⁵⁰ 《洛陽伽藍記》自來版本極多。近來的校註本有：張宗祥校《洛陽伽藍記合校本》，商務印書館1955年版，據如隱堂綠君亭、照曠閣、吳若津《集證》、吳瑄本以及《漢魏叢書》諸本參證互校重印；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科學出版社1958年初版，中華書局1963年再版，以如隱堂本為底本，參照諸本及元

- 《河南志》、明《永樂大典》中原書文字加以校勘、註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修訂再版，以如隱堂本為底本，用吳琯本、《漢魏叢書》本參校，註釋頗詳。入矢義高、森鹿三等曾譯成日文，由平凡社於1974年出版。
- ⑤7 歌營或謂又作加營，其今地有馬來半島、尼科巴群島、印度諸說。
- ⑤8 據《太平御覽》卷七八六、八一三所引。
- ⑤9 該書見於諸家所引的如：《異物志》：《文選·吳都賦》劉逵註、李善註，《續漢志》劉昭註，《齊民要術》，《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後漢書》李賢註，《初學記》，《白孔六帖》，《一切經音義》，《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太平寰宇記》，《北戶錄》，《證類本草》，《香譜》，《事類賦》，《輿地紀勝》，《永樂大典》，《本草綱目》，及曾釗輯本（見《嶺南遺書》）；楊孚《異物志》：《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後漢書》李賢註，《初學記》；楊孚或楊氏《南裔異物志》（或《南裔志》）：《文選·蜀都賦》劉逵註，《水經注》，《北戶錄》，《本草綱目》，《天下郡國利病書》；楊孚《交州異物志》：《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楊孝元《交州異物志》或《交趾異物志》：《藝文類聚》。
- ⑥0 曾釗在輯錄《異物志》時，謂自楊孚之後，“沿襲其名往往有之，……顧群書引用必著撰人之名，惟引議郎書……直稱《異物志》而已。然則群書所引《異物志》，疑皆為議郎書，蓋《異物志》創自議郎，惟議郎得以專其名，斯亦引述者之義例歟”。但是否凡未標地名而單作《異物志》者皆為東漢楊孚之作，不僅曾釗自己無法肯定，學人於此亦每多存疑。考《隋書·經籍志》載“《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但其下又詳列有《南州異物志》，一卷，吳丹陽太守葛震撰，“《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臨海水土志》，一卷，沈瑩撰”，“《涼州異物志》，一卷”。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無“《異物志》，一卷”，僅將“《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與其他諸家《異物志》並列。故後世載籍著錄的《異物志》殘文，未必為楊孚所專有，焉知其非別家之作。例如“漲海崎嶇，水淺而多磁石”一條，曾釗據黃泰泉《廣東志》卷二四所引作《異物志》，然《太平御覽》卷七九〇、九八八則作《南州異物志》；《證類本草》卷四據掌禹錫《嘉祐本草》、蘇頌《圖經本草》所引，《本草綱目》卷一〇據《圖經本草》所引，亦均作《南州異物志》。
- ⑥1 據筆者所見，輯引《南州異物志》的有下列著作：《世說新語》劉孝標註，《齊民要術》，《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後漢書》李賢註，《文選》李善註，《初學記》，《法苑珠林》，《一切經音義》，《白孔六帖》，《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冊府元龜》，《北戶錄》，《證類本草》，《事類賦》，《翻譯名義集》，《香譜》，《竹譜》，《通志》，《永樂大典》，《本草綱目》，《閩書》，《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天下郡國利病書》，《山海經》畢沅注，《古海國遺書鈔》，《和名類聚抄》。諸書引錄之名不盡相同，包括《南州志》，《南州志》，《南州異物志》，《南州日南傳》，《南中異物志》等。近人溫庭敬有《輯《南州異物志》》（載《國立中山大學史學研究月刊》三卷三期）。香港陳直夫刊有《衡震南州異物志輯稿》（陳直夫教授九秩榮慶門人祝賀委員會1987年1月出版），並加註釋。
- ⑥2 日本福本雅一曾撰《臨海水土志譯註稿》，載《帝塚山學院短期大學研究年報》22期（1974年12月）。農業出版社1981年出版有張崇根《臨海水土異物志輯校》，1988年修訂再版。
- ⑥3 諸書所引錄的該書名目如下：《交州雜事》：《北堂書鈔》卷一三五，《藝文類聚》卷七三，《太平御覽》卷七五八、七五九；《交州雜記》：《初學記》卷二十，《太平御覽》卷七五八、七六〇；《交州雜事記》：《一切經音義》卷六六；《交州雜記事》：《太平御覽》卷七〇三。
- ⑥4 或以為該書與《太平御覽》屢引之黃義仲《交廣二州記》、黃恭《交州記》、苗恭《交廣記》等關係密切，諸書輾轉相抄而致誤，詳見下列著作：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地理；丁辰《補晉書藝文志刊誤》乙部；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三·地志類；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卷二·地理類；《補晉書經籍志》卷二·地理類；黃達元《補晉書藝文志》卷二·地理。
- ⑥5 見《太平御覽》卷八〇三、八〇七、九一三、九三七、九四一、九六〇、九六一、九五〇、九八二。另可參見和田久德《徐袁南方草木狀鉤沉》，載《東南亞研究》二（1966年）。
- ⑥6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八云，“吾疑此書在南宋時已斷爛失次，好事者得其殘本，嫌其不完，乃取嶺南草木鈔撮他書以足一”。另見丁國鈞、文廷式、秦榮光諸家《補晉書藝文志》；陳連慶《今本南方草木狀研究》，原載中華書局《文史》第十八輯，收入作者《中國古代史研究》下冊，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胡道靜《如何看待今本南方草木狀》，載《香港大學中文系集刊》一卷二期（中國科技史專號），1987年出版；馬泰來《南方草木狀辨偽》，載同上集刊。
- ⑥7 王叔武輯著《雲南古佚書》中，輯有晉魏完《南中八郡志》一書，凡三十餘條，由雲南人民出版社於1981年出版。另可參見杉本直治郎《西南異方志と南中八郡志—魏晉時代の驛國史料として》，載《東洋學報》47卷3期（1965年1月）。
- ⑥8 杉本直治郎有《郭義恭の廣志——南北朝時代の驛國史料として》，載《東洋史研究》23卷3期（1964年5月），可參考。另可見陳連慶《新輯本《廣志》序》，原載《古籍整理研究通訊》1984年5期，後收入作者上引書《中國古代史研究》下冊。

- ⁶³ 引錄劉欣期《交州記》或未標作者姓名的《交州記》者有：《水經注》、《齊民要術》、《廣韻》、《左傳》正義：《續漢志》劉昭註、《後漢書》李賢註、《文選》李善註、《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孔六帖》、《北戶錄》、《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證類本草》、《香譜》、《事類賦》、《輿地廣記》、《方輿勝覽》、《嶺外代答》、《通考》、《嶺南志略》、《安南志》、《永樂大典》、《越嶠書》、《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本草綱目》、《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大清一統志》、《嘉慶重修一統志》等等。
- ⁶⁴ 《四部叢刊》、《四部備要》、《漢魏叢書》等均收有該書。另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華陽國志（附佚文）》（四冊），清顧觀光輯《華陽國志校勘記》（二冊），均為木版線裝，用成都志古堂原版印行。195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顧廣圻校《華陽國志（附校勘記）》，用《國學基本叢書》本紙型重印。
- ⁶⁵ 清人王仁俊輯有一卷，見《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葉昌熾輯一卷，見《嚴澂遺叢書》；另近人陳連慶亦有輯本，見其文《輯本〈南越志〉序》，載《中國古代史研究》下冊，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
- ⁶⁶ 該書引錄情況如下：裴淵《廣州記》：《水經注》、《齊民要術》、《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事類賦》、《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北戶錄》；裴氏《廣州記》：《北堂書鈔》、《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事類賦》；“裴淵記”：《齊民要術》、《水經注》；裴淵《南海記》：《北堂書鈔》；裴淵《東海記》：《北堂書鈔》。日本渡邊宏有《〈北堂書鈔〉所引裴淵〈南海記〉》，載《史學》40卷二、三期，1966年11月。
- ⁶⁷ 諸書引錄情況如下：顧微《廣州記》：《齊民要術》、《藝文類聚》、《初學記》、《法苑珠林》、《西陽雜俎》、《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北戶錄》、《證類本草》、《輿地紀勝》；顧微《南海記》、《南海經》：均見《北堂書鈔》。
- ⁶⁸ 引錄《廣州記》或《廣州志》、《廣州異物志》之書有《齊民要術》、《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孔六帖》、《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北戶錄》、《證類本草》、《事類賦》、《輿地紀勝》、《能改齋漫錄》等等。
- ⁶⁹ 明朱謀瑋的《水經注箋》已為該書作註釋，清人之成就尤大，全祖望、趙一清、戴震均有不易之校釋，王先謙有《合校水經注》。近人楊守敬及其弟子熊會貞有《水經注圖》及《水經注疏》（中國科學院1955年出版），王國維有《水經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岑仲勉曾作《〈水經注〉卷一箋校》（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對所涉東南亞、南亞之地理考證用力甚深。另一些有關的工具書也可供利用，如燕京大學引得編纂處1934年編印洪業等的《水經注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重刊），中華書局1989年出版馬念祖編《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匯編》，復旦大學1985年出版趙永復的《水經注通檢今釋》。
- ⁷⁰ 晉崔豹《古今注》卷下之引文較詳，見商務印書館1956年版。另《太平廣記》亦引有張騫出關志，見中華書局1961年排印本，第九冊，第3296頁。宋洪遵《泉志》卷十二謂，“張騫出關志曰：凡諸國貨幣，多用焦越犀象作，金幣率象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女人交易，則用王后之面。王死則更鑄”（見《學津討原》）。
- ⁷¹ 參見桑原鷗藏《張騫西征考》，楊鍊譯，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47及51頁。
- ⁷² 據惠棟《後漢書補注》：“《西域傳》云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云云，此以下范氏續述所聞，非班固之文也。”
- ⁷³ 康泰的《扶南傳》或《外國傳》，自晉代以降屢見《水經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錄。近人之輯佚情況詳見下述。
- ⁷⁴ 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已對《扶南傳》多所引用。後來歷代有關該書之傳本頗多，迄今尚存的包括北宋、南宋、金代乃至日本的各種印本、鈔本。
- ⁷⁵ 在歷史上，晉、唐間有四個著名的高僧，他們皆赴印度取經，且均留下重要之記傳，唯其所取陸、海路恰又各各不同，大相異趣：（1）晉釋法顯赴印，陸去海回，歸撰《佛國記》；（2）唐釋玄奘赴印，陸去陸回，歸撰《大唐西域記》；（3）唐釋義淨赴印，海去海回，撰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4）唐釋慧超赴印，海去陸回，撰有《往五天竺國傳》。
- ⁷⁶ 關於智猛等人的書，可參見：諏訪義讓：《智猛並びに法勇の求法行記について》（附：法盛歷國傳），《大谷學報》38-1、3，1958年；長澤和俊：《釋智猛の入竺求法行記について》，《東洋學術研究》14-3，1975年5月；內田吟風：《宋釋智猛撰〈遊行外國傳〉集錄解注》，《神田大學文學會研究》39。
- ⁷⁷ 見前引《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
- ⁷⁸ 見上註，及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第241頁。另可參見陳連慶《輯本竺法維〈佛國記〉序》，載《中國古代史研究》上冊第1075-1076頁。
- ⁷⁹ 有關宋雲等行傳之校註，可參見：丁謙：《魏宋雲釋惠生西域求經記地理考證》，載《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法國沙畹（E. Chavannes）：《宋雲行紀箋注》（Voyage de Song Yun dans l'Udyana et le Gandhara, 518-522），馮承鈞譯，載《禹貢》半月刊四卷一、六期，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

編》；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六冊，第九十八節附註。另可參見前引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等書。

⑩ 關於《職貢圖》，可參見下列文章：

〈梁元帝著作考〉，趙圖南，《福建文化》2卷4期，1946年6月；〈職貢圖的時代與作者〉，金維諾，《文物》1960年7期；〈現存職貢圖是梁元帝原本嗎？〉，岑仲勉，《中山大學學報》1961年3期；〈閩立本職貢圖〉，李霖燦，《大陸雜誌》12卷2期，31卷5期；〈梁職貢圖について〉，榎一雄，《東方學》26，1963年7月；〈梁職貢圖について補記〉，〈滑國に關する梁職貢圖の記事について〉，榎一雄，《東方學》27，1964年2月；〈梁職貢圖の流傳について〉，榎一雄，《鎌田博士還曆史學論叢》，1969年9月刊；〈梁職貢圖に關する 玫瑰集の記事について〉，榎一雄，《オリ工エト》11-12，1970年1月；〈輯本梁元帝《職貢圖》序〉，陳連慶，《中國古代史研究》下冊，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⑪ 引錄《外國事》之書包括：《水經注》卷一；《北堂書鈔》卷一三二、一三三；《藝文類聚》卷七三、七六、九九；《太平廣記》，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九冊，3442頁；《太平御覽》卷三六九、七〇一、七九七、八一二、九三二、九九九。

⑫ 有關支僧載《外國事》之考訂，可參考：向達前引《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岑仲勉前引《水經注》卷一箋校；《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書》；陳連慶《新輯本支僧載《外國事》序》，載《中國古代史研究》下冊。

⑬ 參見藤田豐八《葉調斯調私詞條考》，載《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何健民譯，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⑭ 諸書引錄釋道安著作的情況如下：釋氏《西域志》、《西域記》：《水經注》卷一、二；釋道安《西域諸國志》：《職貢圖》；《西域諸國志》：《齊民要術》卷十，《北堂書鈔》卷一三五，《太平御覽》卷二八、三三、五〇、七一二、七五九、八〇八、八三八、八七一、九一一；釋道安《西域志》：《藝文類聚》卷七六；道安《西域志》：《太平御覽》卷五〇、七六五、七九七；《西域諸國記》：《太平御覽》卷九二六；《西域志》：《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一。另可參見松田壽男《釋氏西域記集注》，載《岩井博士古稀紀念典籍論集》，1963年6月版。

⑮ 引錄《扶南記》的諸書包括：竺芝《扶南記》：《水經注》卷一、二、三六；竺芝《扶南記》：《水經注》卷三六，《太平御覽》卷七八八、七九〇，《越嶠書》卷一，《嶠南瑣記》卷上，《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二；《扶南記》：《藝文類聚》卷七六，《太平廣記》卷四〇六，《證類本草》卷二三，《安南志略》卷一，《閩書》卷一五〇。陳運溶前引《古海國遺書鈔》，岑仲勉前引《晉宋間外國地理書輯略》，許雲樵前引《康泰吳時外國傳輯註》附錄，均輯有竺芝《扶南記》佚文，但該書部分條文則被與康泰書相混。

⑯ 諸書引錄情況如下：《林邑記》：《水經注》卷三六、三七，《北堂書鈔》卷一二三、一三三、一三六，《藝文類聚》卷三五、八四、八七，《初學記》卷八、十九、二七，《太平廣記》卷二七六，《太平御覽》卷一七二、三四五、三九八、七一八、七六〇、八〇三、八一—、八一三、八二五、九六〇、九六三、九七一、九八一，《太平寰宇記》卷一七〇、一七六，《編珠》卷三，《寰宇通志》卷一—八，《大明一統志》卷九〇，《本草綱目》卷四四、五一；《林邑國記》：《齊民要術》卷十（《林邑圖記》），《通典》卷一八八，《太平御覽》卷三七三、八九〇、八九二、九二六、九三六、九三七、九三九，另卷五四九（《臨邑國記》），《通志》卷一九八，《文獻通考》卷三三一；《林邑志》：《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六。

⑰ 《本草綱目》卷一、三〇均引有東方朔《林邑記》。另可參考《大陸雜誌》三十八卷一期所刊登的馬泰來《陸賈南越行記與東方朔林邑記》一文。

⑱ 引錄該書的有：《北堂書鈔》卷一二五，《太平御覽》卷三四八，《事類賦》卷七（作《日南志》）。

⑲ 陳運溶據《太平御覽》卷七九〇的材料七條，輯成《交州以南外國傳》一卷（見《蓬山精舍叢書第二集·古海國遺書鈔》），包括西屠、金陳、波遼、屈都乾、波延洲、究原、奴後等。但除西屠外，其餘原書僅引用作《外國傳》，故未經仔細辨別，不可把二者等同。

第二章

隋以前南海對外交通概況

一 秦隋間之南海及海洋知識之增廣

在中國古代，隨著造船、航海事業的發展，人們對海洋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入。上古時期，對今日遼闊的大海洋最初僅稱之為“海”，《尚書》云“江漢朝宗於海”，後來《說文》解釋曰：“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到了戰國時期，中國沿邊之海均有了具體的名稱，今東海、渤海、南海之名均已出現，《山海經》還以海內、海外來比較中國及外國。當時騶衍（約前305-前240）曾提出了大九州之說，認為“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①。他認為世界上像中國這樣的大州一共有九個，每個大州有小海（即裊海）環繞，而九個大州則被大（瀛）海環繞，再外就到天地邊際了。騶衍之語向被認為“閎大不經”，“迂怪虛妄”，故多稱之為“談天衍”。實際上其言雖不無揣測誇張之處，然其關於大海遼闊、海外有洲的看法，則因中外交通的發展而漸被證實。

先秦時期，人們即以“九州”為中國，同時又常以“四海”泛指中國四方疆域乃至域外世界。最初古人以為中國四境皆為大海環繞，九州之外即為四海，但後來則多半為了行文對舉而採用“四海”之名。在中國載籍中，“四海”一詞之含義不盡相同，例如《尚書·大禹謨》說“文命敷於四海”，指的是天下或全國各處。《尚書·禹貢》的“四海會同”，則泛指中國四周的海疆。《禮記·祭義》具體提到東海、西海、南海和北海，但僅是對舉而言，沒有確指海域^②。其實中國除了東部、南部外，其他方向並不臨海。而在“四海”之中，與中西交通有關

的主要是南海、西海二名。

南海之稱最初或泛指南方及其海域，或兼指今之東海南部，含義不很明確。《尚書·禹貢》提到“入於南海”，《詩經·江漢》說“於疆於理，至於南海”，其所指似和今南海之概念不盡相合。秦漢時，東海之位既有定域，南海之名才用來專指中國以南的廣大海域，如劉熙《釋名》指出：“南海在海南也，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所以古代南海除包括今南中國海外，還泛指今東南亞一帶的海域及沿海各國，它也是中國古代對海上交通最重要的區域。

中國古時也常將西方極遠處的海泛稱為西海，不過其含義往往隨載籍不同而異。秦漢以後的西海或指真正的海域，如波斯灣、阿拉伯海、紅海、地中海、印度洋等。但有的也指較大的湖泊，如青海、鹹海、裏海等。

西漢以降，中國不僅對南海等逐漸熟悉，而且對遠離中國的浩瀚之海洋也有進一步認識。如《史記·大宛列傳》曾載，“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此西海即包括今印度洋、波斯灣、阿拉伯海在內，尤指波斯灣。三國時的《魏略·西戎傳》已將今地中海稱為“大秦海”。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東漢、三國之際，中國古籍已用“漲海”一詞泛指中國南方以外的廣闊海域，兼包南海、西海，用以形容世上海洋之遼闊浩瀚。

過去人們對“漲海”一詞所包含的範圍，有不同的看法，其歧見大略有四：(1) 指暹羅灣南之海，如馮承鈞主張“今日南海以西之地，今名曰印度洋或南洋者，其概稱曰南海或西南海，惟於暹羅灣南之海特名曰漲海而已”^③；(2) 指今南海西部，如伯希和認為“漲海即海南島迄滿刺加海峽間中國海之稱”，費瑯認為“此漲海即東起瓊州島，西迄滿刺加海峽之中國西海也”^④；(3) 南海之別稱^⑤；(4) 除今南中國海，尚包括東南亞地區的海域，約當於後來的“南洋”概念^⑥。這些說法不論狹義、廣義，均不出“南海”的範圍。把漲海限於暹羅灣一帶或中國

南海西部的看法，顯然根據不足。《隋書·地理志》有“海豐（有黑龍山，有漲海）”的記載，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一文云“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州南近界，漲海連天”^①。則南海的東部也被稱為漲海。《舊唐書·地理志》所記尤為明確：“南海在海豐縣南五十里，即漲海，渺漫無際。”許多字書把漲海當作南海的別稱，其源之一當本於此。

就古代南海的角度而言，漲海所包範圍應泛指東南亞地區的廣大海域。《梁書·扶南傳》曰，“范蔓……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逕過也”，“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屈都昆、九稚、典孫（即頓遜）、金鄰等故地所在，中外學者雖聚訟不已，但其考訂均不出馬來半島至蘇門答臘島一帶。而諸薄、馬五洲、自然火洲等，則應在爪哇島及其以東地區。這樣《梁書》所載的漲海，西界已抵馬六甲海峽和馬來半島西岸，其東界則幾近太平洋了。

然而，綜觀古籍所載，尚不能把漲海簡單地等同於南海（無論指今中國南海，抑或是廣義的南海）。說南海一帶曾被稱為漲海尚可，而謂漲海就是南海卻未免失之片面。換言之，南海別稱漲海，僅僅是漲海的狹義解釋，漲海一詞在古籍中還有其更廣泛的含義。這樣斷言絕非節外生枝，無中生有。

在中國古代載籍中，不僅南海一帶，而且馬六甲海峽以西的廣闊海域也曾被稱為漲海。

晉劉逵《吳都賦》曾引《扶南傳》云，“漲海中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太平御覽》卷六九引《扶南傳》云，“漲海中倒（到）珊瑚洲，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也”。類似條文也見於他書所引，如《事類賦》卷

六引《外國傳》曰：“大秦西南漲海中可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鐵網取之”，《翻譯名義集》卷八、《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九所引書名及文字同此。這兩種提及漲海珊瑚洲的文字，一種未標具體地點，一種明指在大秦西南。但其文雖大同小異，惜引錄均不完全，一時未便遽予以定奪。

今查在大秦一帶漲海珊瑚洲附近以鐵網撈取珊瑚之事，古籍所載比比皆是，其中以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世說新語》所記較早且詳。該書卷下汰侈篇劉孝標註云，“《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蠱。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⑥諸書所引萬震著作中，有關漲海的不止一處，如《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引《南州異物志》曰，“句稚去典遊（遜）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東北行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淺而多磁石”。同一部《南州異物志》，既把馬來半島一帶也把大秦附近的海域稱為漲海，這便提供一個極為有力的證據，足以廓清漲海廣義說的疑雲。

這裏也必須提出一個不利於上述論斷的例證。《太平寰宇記》卷一七〇交州條云，“（土產）珊瑚：《吳錄》云，交州漲海中有珊瑚，以鐵網取之”，筆者所見把漲海中以鐵網取珊瑚事說成在交州附近的，僅此一條。誠然，真理的發現不能靠誇張，也不能依多數和少數進行決斷，但上引之條文極不完全，實非原文照錄，焉知“交州”二字非引者所加。且《吳錄》係晉張勃所作，今亦亡佚，其成書年代又較前面所引的《南州異物志》（或《異物志》）、《外國傳》（即《扶南傳》或《吳時外國傳》）為晚。故僅憑此尚待稽考之孤證，恐不足以推翻大秦西海曾被稱作為漲海的事實。

更有進者，《康熙字典》及新《辭海》等把漲海作為南海別稱時^⑨，往往引三國時吳謝承的《後漢書》為證。但謝承之書早佚，其出處係引自《初學記》。今觀《初學記》卷六“地部·海第二”有這樣一段話：“《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云……。按南海大海之別有漲海（謝承《後漢書》曰：交趾七郡貢獻，皆從漲海出入。又《外國雜傳》云：大秦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大盤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鐵網取之）。”考諸家藝文志、經籍志，《外國雜傳》一書未見著錄，查唐宋幾大類書及《永樂大典》等，亦僅此一見，且此文與前引之《扶南傳》、《外國傳》何其相似乃爾，故依筆者淺見，此《外國雜傳》當係《外國傳》亦即康泰之《扶南傳》。因此，漲海一詞自見諸三國載籍（如《扶南傳》、《南州異物志》、謝承《後漢書》），其含義所包即兼指南海、西海，而非南海所得而專也。

總之，早在三國時期，古籍對“漲海無崖岸”已有充分之認識。誠然，“漲海”一詞究作何解尚待研究，如《康熙字典》以“漲”字為“水大貌”，清屈大均之《廣東新語》云“炎海善溢，故曰漲海”。不過，三國時期之“漲海”，同戰國時期之“大瀛海”、唐宋以後之“大洋海”乃一脈相承，殆無疑義。

二 秦漢對南海地區的經略

中國最早同南海地區的交往，見於載籍比較可信的，當推與越南 (Viet Nam) 的關係。越南古稱交趾。《尚書》之《堯典》及《墨子》、《韓非子》等書都提到唐堯南撫交趾之事。《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趾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在漢武帝設交趾郡之前，交趾一名泛指五嶺以南地區，也包括今越南北部，越裳則應在今越南中部一帶。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等史事雖有待考證，然越南早在先秦時代與中國已有密切之關係，殆無疑義。

今越南之主體民族本係古代“百越”之一部。原來在中國南方遍佈著越人，即“百越”或“百粵”。居於廣西及越南北部一帶者稱為“駱越”（或“西甌”）。秦統一六國後，始皇（前221-前210）即著手開闢嶺南，“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分別向南越、駱越進兵。是役進行得相當艱苦，西甌君譯吁宋及秦軍主將屠睢都相繼戰死。據《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載，“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也就是說，到了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嶺南地區終於被設郡治理。

關於秦代嶺南三郡之今地，南海郡在廣東，桂林郡包括廣西及廣東一帶，象郡之範圍則諸說大相歧異，但都包括有越南一部分¹¹。也就是說，自秦代起，今越南的北部、中部即歸入中國之版圖，直到五代時獨立為止。

兩漢時期，中國同今中南半島一些國家，首先是越南，有了進一步之關係。秦末漢初，天下大亂，趙佗（？-前137）自立為南越武王，據有兩廣之地，且派兵經略駱越，在今越南境內置交趾、九真二郡。至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漢武帝乃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分兵數路攻打南越。“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漢書》卷九五〈南粵傳〉）。

西漢所置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越南境內。交趾郡轄境約當今越南北部，初治羸隍（今河內Hanoi西北），後徙龍編（在河內之東北面）。九真郡在越南中部，治胥浦（今清化Thanh Hoa西北）。日南郡在越南中南部，治西捲（今廣治西北），而最南一縣象林的南界大約止於華列拉角（Cap Varella）。東漢之初，平定交趾女子徵側（Trung Tac）、徵貳（Trung Nhi）之亂後，相傳“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以表漢界。

越南北、中部雖自秦、西漢即入中國版圖，但大規模接受華夏

之文化應始於東漢。有關西漢時與交趾等郡往來之記載既少且又簡單，諸如元康四年（前102年）“九真獻奇獸”、元始元年（公元1年）“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之類。光武帝重建漢家天下後，交趾牧鄧讓即率交趾太守錫光等七郡太守於建武五年（29年）遣使奉貢，錫光在交趾曾“教導民夷，漸以禮義”，而九真太守任延也授民以稼穡婚娶。及至馬援重定交趾三郡後，漢室對其地之治理和來往益形密切，據《後漢書》所載，當時九真、日南徼外蠻夷內屬或奉貢之事件不下十數起。

漢代之經略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對加強中外交通亦有重大作用。西漢時由南海航行至東南亞、南亞之通道，即由日南障塞出發。天竺、大秦等使者則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此外，東南亞的其他一些國家也多從日南徼外來華。如《後漢書》卷一一六〈南蠻西南夷列傳〉載，“肅宗元和元年（84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獻生犀、白雉”，或謂古音“究”讀若“甘”，究不事即指今之柬埔寨^①。另同書卷六順帝紀載，“（永建六年）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憐國貢獻”；卷九六云“順帝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關於此事，東漢官撰之《東觀記》更為詳細：“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為漢歸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及憐國王雍由（調）亦賜金印紫綬”。葉調之今地，學者多主張為印度尼西亞之爪哇（Java）^②。若然，則為南洋島國中最早與華通使者。

究不事、葉調等當為東南亞之國家或地區，如果它們今地之考訂尚不能稱為定論，那麼憐（Shan）國之在今緬甸之東北境則可無疑^③。憐國同東漢之通交共有三次，“永元六年（94年），郡徼外敦忍乙王慕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97年），徼外蠻及憐國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永寧元年（120年），憐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憐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

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還有就是順帝永建六年與葉調國同來的那一次。至於敦忍乙，一般也認為在緬甸¹⁴。這些記載都是中緬兩國最早交通的珍貴實錄。

三 漢代南海對外航道之開闢

對於中外交通而言，漢代實可謂開拓時期、創業時期。中國對西方之遠程交通，陸道固有張騫之“鑿空”，而海路方面，由南海西航至印度一帶的遠洋航線也開闢於西漢，且與張騫通西域大致同時。

關於西漢由南海遠航至印度洋的通路，最早見於《漢書·地理志》：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這一條航線所涉地名不多，但其今地長期以來迭經中外學者之考訂，迄無定讞，甚至同一地名的不同結論相差竟不可以道里計¹⁵。目前，航線之終點黃支一般都認為在印度東南岸，回程之爭論也不太大。眾說紛紜之處在於由徐聞、合浦至黃支中間的幾個地名，大別又可分為兩大類意見，一類認為來回都經過馬六甲海峽，一類認為僅回

程經過海峽。主張由馬六甲海峽來回者，或將都元定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 (Sumatra) 島之東北部，把邑盧沒置於今緬甸的勃固 (Pegu) 附近，以諱離當今緬甸的卑謬 (Prome)，以夫甘都盧當今緬甸蒲甘 (Pagan) 以西之沿海地區。今按漢使西航的去程有一點堪當注意者，即離開中國後並非一路均使用原來的船隻，往往中途換船，並步行了十餘日，若經過馬六甲海峽向西航行實不需步行，而且鑑於古代的航海技術與知識，去程多半不敢離海岸遠行，所經肯定均當時的貿易港口，故不可能第一站就駛抵蘇門答臘的北端。

依筆者之見，《漢書》卷廿八下〈地理志〉所載南海遠洋航線經過的地方大致如下：日南 (郡名，治今越南廣治 Quang Tri 附近) ——都元 (今越南南部的迪石 Rach Gia 一帶，古代扶南國的著名海港 Go-Oc-Eo 即在此) ——邑盧沒 (今泰國湄南河口的佛統 Nakon Pathom 一帶) ——諱離 (在馬來半島東岸，今泰國的巴蜀 Prachup) ——夫甘都盧 (在馬來半島西岸，今緬甸的丹那沙林 Tenasserim) ——黃支 (印度東南岸的康契普臘姆 Kanchipuram) ——已程不 (今斯里蘭卡 Sri Lanka) ——皮宗 (新加坡附近，或即 Pulau Pisang) ——象林 (治今越南維川 Duy Xuyen 縣南的茶蕎 Tra Kieu)。¹⁶

不論航道所經地名之考訂如何，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代，中國的佚名譯使及應募的商民、船工們已開闢了從中國至印度、從太平洋進入印度洋的海上通道，此乃舉世不爭的事實，它比托勒密關於東南亞、東亞的記載要早二百年。到了東漢桓帝時，不僅印度“頻從日南徼外來獻”，大秦也“遣使自日南徼外”來華，說明羅馬帝國已可通過波斯灣或紅海同中國進行海上之交通，這是中國與亞洲各國人同歐洲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四 三國載籍所記之南海諸國

關於三國時期的南海交通，西晉陳壽之《三國志》，南朝裴松之註引的魏魚豢《魏略·西戎傳》，均有大略的記載。而三國時人的佚書，

如謝承的《後漢書》、康泰的《扶南傳》、萬震的《南州異物志》等，賴唐、宋後各大類書之輯存，亦可對此作重要之補證。

茲將康泰《扶南傳》、萬震《南州異物志》等載籍提到的南海諸國略敘於下，以見三國海外交通之規模：

- (一) 林邑：康泰《扶南記》提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口，常從此口出也”（《水經注》卷三六引）¹⁷。林邑在今越南的中南部，東漢末期立國於原日南郡的象林縣。《水經注》卷三六引《林邑記》云，“建國起自漢末初平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連，攻其縣，殺令，自號為王。值世亂離，林邑遂立”。是則林邑之建國約在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年），也有的據《後漢書》卷一一六所載“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主張應為永和二年（137年）。一般認為林邑即後來中國史籍所說的環王國、占城國或占婆國（Champa），為占人所建的國家。其早期都城典沖即原象林縣治，位在今維川（Duy Xuyen）縣南的茶蕎（Tra Kieu），占城碑銘中作Indrapura。
- (二) 扶南：中國古籍所獨載公元一至七世紀之大國，領土包括今柬埔寨及老撾南部、越南南部以至泰國東南部一帶。《扶南傳》、《南州異物志》、《三國志》等均有記載¹⁸。康泰《吳時外國傳》曰：“扶南之先，女人為主，名柳葉。有摸跖國人，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夢人賜神弓一張，教載賈人舶入海。混慎晨入廟，於神樹下得弓，便載大船入海，神迴風令至扶南。柳葉欲刳取之，混慎舉神弓而射焉，貫舩通度，柳葉懼伏，混慎因到扶南。”（《太平御覽》卷三四七引）；“扶南王盤況，少而雄桀，聞山林有大象，輒生捕取之，教習乘騎，諸國聞而伏之”（《藝文類聚》卷九五引）；“扶南王范尋，以鐵為鬥雞假距，與諸將賭戲”（《藝文類聚》卷九一

引)；“鱷魚大者長二三丈，有四足，似守宮，常吞食人。扶南王范尋勅捕，取置溝塹中。尋有所忿者，縛以食鱷。若罪當死，鱷便食之，如其不食，便解放，以為無罪”(《太平御覽》卷九三八引)；“扶南諸王殺死國人，以刀斫刺，往往有不入者，以汗露塗刀刃，斫之乃入。國人名之曰蟬也”(《太平御覽》卷三四五引)；“扶南有訟者，燒鐵令赤，以鉗舉鐵著手行七步，無罪者手不燒，有罪者手即焦”(《太平御覽》卷七六四引)；“扶南東有漲海，海中有洲，出五色鸚鵡，其白者如母雞”(《藝文類聚》卷九一引)；“扶南國伐木為舡，長者十二尋，廣時六尺，頭尾似魚，皆以鐵鑄露裝，大者載百人，人有長短橈及篙各一。從頭至尾面，有五十人作，或四十二人，隨舡大小，立則用長橈，坐則用短橈，水淺乃用篙，皆當上應聲如一”(《太平御覽》卷七六九引)。另《搜神記》卷二引《扶南傳》云，“扶南王范尋養虎於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蟲，亦名大靈；又養鱷魚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鱷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故有鱷魚池；又嘗煮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萬震《南州異物志》曰，“扶南國在林邑西三千里，自立為主，諧屬皆有官長及王之左右大臣，號為崑崙”(《太平御覽》卷七八六引)。對中國與扶南交往之考證，詳見下一章所述。

- (三) 堂明：《三國志》卷六〇《呂岱傳》提到，“(岱)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或謂該地又作道明，在今老撾的中、南部¹⁹。
- (四) 林陽：康泰《扶南土俗》曰：“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數千沙門，持戒六齋(齋)日，魚肉不得入國。一日再市，朝市諸雜米、甘菓、石密(蜜)，幕(暮)中但貨香花”(《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南州異物志》曰，“林陽國

在扶南西七千餘里，地皆平博，民十餘萬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同上引）。在今泰國西南部或緬甸東南部²⁰。

- (五) 潭陽：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潭陽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賣到扶南，為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山川饒沃，恣所欲。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云，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回。梨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為天地之中也”（《水經注》卷一引）。或謂潭陽即林陽之同名異譯²¹。
- (六) 金鄰：《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引《異物志》曰，“金鄰一名金陳，去扶南可二千餘里。地出銀。人民多好獵，大象生則乘騎，死則取其牙齒”。當在今泰國，位佛統 (Nakhon Pathom) 或叻丕 (Ratburi) 一帶²²。
- (七) 無論：《南州異物志》云，“無論國有大道，左右種桃、枇杷及諸花果，白 (日) 行其下，陰涼蔽熱。十餘里一亭，皆有井水。食麥飯，飲蒲桃酒，如膠，若欲飲，以水和之，其味甘美”（《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引）。其地似應於泰、緬一帶求之²³。
- (八) 典遜：又作頓遜。《南州異物志》曰：“典遜，在扶南 (南) 三千餘里。本為別國，扶南先王范蔓有勇略，討服之，今屬扶南”（《太平御覽》卷七八八引）。一般認為在今緬甸東南部，位馬來半島西北岸或跨東西兩岸²⁴。
- (九) 拘利：又作句稚。康泰《扶南傳》曰，“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恆水江口”（《水經注》卷一引）。《南州異物志》曰，“句稚去典遜 (遜) 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東北行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淺而多磁石”（《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引）。該地應在馬來半島克拉 (Kra) 地峽一帶，但具體應位於何處，則有不同的意見²⁵。
- (十) 都昆：《吳時外國傳》曰，“都昆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出藿香”

(《藝文類聚》卷八一引)，“流黃香出都昆國，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太平御覽》卷九八二引)。或謂又作屈都昆，在馬來半島，故地有吉打(Kedah)、瓜拉龍運(Kuala Dungun)等說²⁶。

(十一) 薄歎洲：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西北有薄歎洲，土地出金，常以採金為業，轉賣與諸賈人易糧米雜物”(《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或謂指印度尼西亞廖內(Riau)群島之賓坦(Bintang)島，也有的認為在蘇門答臘島西北部或馬來半島²⁷。

(十二) 耽蘭洲：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西北有耽蘭之洲，出鐵”(《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在今馬來半島東南岸一帶或南面島嶼²⁸。

(十三) 巨延洲：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東北有巨延洲，人民無田，種芋，浮舩海中，截大蚶螺杯往扶南”(《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應在今加里曼丹(Kalimantan)島²⁹。

(十四) 北攔洲：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東南有北攔洲，出錫，轉賣與外徼”(《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應在印度尼西亞的勿里洞(Billiton)島或邦加(Bangka)島³⁰。

(十五) 五馬洲：康泰《扶南土俗》曰，“諸薄之東有五洲，出雞舌香，樹木多花少實”(《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標題作馬五洲)；《吳時外國傳》曰，“五馬洲出雞舌香”(《法苑珠林》卷三六、《太平御覽》卷九八一引)。其地應在馬魯古(Maluku)群島求之³¹。

(十六) 火洲：《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復潔。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燃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為火浣布”(《通典》卷一八八引)。《南州異物志》曰，“斯調國又有中(火)洲焉，為春夏生火

秋冬死。有木生於火中，秋冬枯死，以皮為布”（《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按南海之火山，在在有之。五馬洲以東之火山應於今印度尼西亞的小巽他群島 (Lesser Sunda) 求之，諸薄國之火山則應在蘇門答臘島。

(十七) 斯調洲：康泰《扶南土俗》：“斯調洲灣中有自然監（鹽），累如細石子，國人取之，一車輸王，餘自入”（《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吳時外國傳》曰，“斯調王作白珠交給帳、金床，上天竺佛精舍。天竺王見珠圓好，意欲留焉，臣下諫乃止”（《太平御覽》卷六九九引，另八一）。《南州異物志》曰，“斯調，海中洲名也，在歌營東南可三千里，上有王國、城市、街巷，土地俊美”（《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或謂斯調與斯訶調、私訶條等，均為巴利文Sihadipa的音譯，意為獅子國，即今斯里蘭卡。唯以康泰書所載各地方位等情，此斯調應在爪哇島⁴²。

(十八) 諸薄：《吳時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引）。諸薄應即後來社薄、閩婆之異名，均梵文Yava的譯音，舊指印度尼西亞的爪哇 (Java) 島或蘇門答臘島，或兼指此二島。康泰書中對諸薄本身之地望未作綜述，然由上引諸地看，其西北為薄歎洲、耽蘭洲，東北有巨延洲，東南有北攏洲，東有五馬洲，則其他應在今蘇門答臘島東南部⁴³。

(十九) 加營：又作歌營。康泰《吳時外國傳》：“加營國王好馬，月支賈人常以舶載馬到加營國，國王悉為售之。若於路失鞍其，但將頭皮示王，王亦售其半價”（《太平御覽》卷九〇、三五九引）。另前引《扶南土俗傳》曰，“又有加營國北（在？）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南州異物志》曰，“歌營在句稚南，可一月行到，其南大灣中有洲，名蒲類，上有居人，皆黑如漆，齒正白，眼赤，男女皆裸形”。論者或謂在南印度，然以康書所述地望度之，該地應在蘇門答臘島之北部⁴⁴。

(二十) 蒲羅(中)：《通典》卷一八七載：“又《扶南土俗傳》云：拘利東有蒲羅中人，人皆有尾，長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並西南，蒲羅蓋尾濮之地名”(《太平御覽》卷七九一、《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九所引大同)。《太平御覽》卷七八七載：“吳時，康泰為中郎，表上《扶南土俗》(曰)：拘利正東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羅中國，其俗食人”，另卷七九〇載：“《南州異物志》曰：歌營在句稚南，可一月行到，其南大灣中有洲，名蒲類，上有居人，皆黑如漆，齒正白，眼赤，男女皆裸形。康泰《扶南土俗》：大載而去，常望海，過則遮舡，將雞、豬、山菓易鐵器”。蒲羅中國，許雲樵考為新加坡古名。而饒宗頤等非之⁵⁵。饒氏以蒲羅、蒲類均為同名異譯，並引申岑仲勉等說，主張其地應在尼科巴群島(Nicobar Is.)⁵⁶。

(廿一) 加陳：《南州異物志》：“加陳在歌營西南”(《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引)。故地有蘇門答臘以西或印度西南岸之說，待考⁵⁷。

(廿二) 加那調洲：康泰《扶南傳》：“安息、月支、天竺至伽那調洲，皆仰此鹽”，“從加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渡江逕西行極大秦也”(《水經注》卷一引)；《吳時外國傳》云，“從加那調洲乘大舡，張七帆，時風一月餘日乃入大秦國”(《北堂書鈔》卷一三八引，《太平御覽》卷七七一大同)。另《南州異物志》有云，“姑奴去歌營可八千里。民人萬餘戶，皆乘四轅車，駕二馬或四馬，四會所集也。舶船常有百餘艘，市會萬餘人，晝夜作市。船皆鳴鼓角。人民衣被中國”(《太平御覽》卷七九四引)，“扈利國在奴調洲西南邊海”(同上卷七九〇引)。或謂迦那調洲係梵文Kurnadvipa之譯音，應在緬甸沿岸或馬來半島西北岸求之；另奴調洲、姑奴國等與迦那調洲，均指同一地⁵⁸。

(廿三) 扈利：《南州異物志》：「扈利國在奴調洲西南邊海」(《太平御

覽》卷七九〇引)。或謂枝扈黎應作扈枝黎，與扈利為同名異譯，指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胡格里 (Hugli) 河口一帶³⁹。

(廿四) 擔袂：康泰《扶南傳》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恆水江口，有國號擔袂，屬天竺，遣黃門字興為擔袂王”（《水經注》卷一引）。或謂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南部之塔姆盧克 (Tamluk)⁴⁰。

(廿五) 烏文：康泰《扶南土俗》：“烏文國，昔混滇初載賈人大舶所成此國”（《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在謂在印度東岸的奧里薩 (Orissa) 邦一帶⁴¹。

(廿六) 優鉞：康泰《扶南土俗》曰，“優鉞國者，在天竺之東南可五千里，國土熾盛，城郭、珍玩、謠俗與天竺同”（《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其地似應於印度東南岸求之⁴²。

(廿七) 橫趺：或又作模趺。前引《吳時外國傳》云，“扶南之先，女人為主，名柳葉。有摸趺國人，字混慎……載大舡入海，神迴風令至扶南。柳葉初欲劫取之，混慎舉神弓而射焉，貫舡通度，柳葉懼伏，混慎因至扶南”。另《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引康泰《扶南土俗》：“橫趺國在優鉞之東南，城郭饒樂不及優鉞也。”故地或謂在今印度東南一帶，另尚有緬甸沿岸、馬來半島東岸等說⁴³。

(廿八) 師漢：《南州異物志》：“師漢國在句稚西，從句稚去行十四五日乃到其國，亦稱王，上有神人及明月珠。但仁善，不忍殺生。土地平博，民有萬餘家”（《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引）。在馬來半島以西，似為今斯里蘭卡⁴⁴。

此外，《扶南土俗》尚有濱那專，《南州異物志》有察牢，似應於西域求之。至於天竺、安息、大秦等國，早在漢代已經出現，茲不贅言。

五 兩晉南北朝與南海諸國之交往

兩晉南北朝的三百餘年間，乃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分裂的時期。不過這一時期政治雖然混亂，中國對外交通並未完全停滯，海路交通甚至有逐漸加強之趨勢。兩晉南北朝時期，海上對外交通之所以得到繼續發展，其原因大致可由下列幾方面觀之。首先，魏晉以來西域天山以北的遊牧地區屢受鮮卑、柔然、高車、嚙唃、突厥等族所控制，天山以南的小國亦常受北方強族之侵犯，使通西域的道路經常阻塞，加上中國北方中原地區為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五胡諸國所割據，故西域交通一時大衰。三國時，西域各國已“不能盡至”，西晉後西域關係一度斷絕，北魏時復通，但“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不聞有事西域”（《北史·西域傳序》）。在此種狀況下，發展海路交通並以海道同西方往來勢在必行。其次，自永嘉之亂後，晉室衣冠南渡，中國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逐漸南移。東晉及其後的宋、齊、梁、陳均偏安江南，它們不僅均定都於建康（即原來吳都建業），而且繼承了原來東吳的航海和對外交通事業。為了加強自己的經濟地位，以與北方強敵相抗衡，東晉及南朝必然要極力爭取同盟力量，大力發展和海外諸國的經濟貿易關係。加上這一時期佛教至為盛行，中西僧人往來密切，許多高僧由海路往返中國與印度間，也促進了南海交通之發展。

茲將兩晉南北朝時期部分南海國家與中國之來往關係，略敘如下：

（一）林邑：林邑自立國後即不斷向北進侵。東晉成帝至穆帝間（325-361年），林邑國王范文、范佛屢屢率兵寇犯交州之南邊，晉師數討無功。升平三年十二月（360年），交州刺史溫放之率兵征林邑，曾進抵彭羅灣（當即今越南順化Hue東的球二Cau Hai灣）一帶。然此後林邑仍每歲入寇，並逐步佔據漢日南全郡之地，將北界推至橫山（Hoahn Son）。宋永初二年（421年），林邑國王范陽遣使入貢，武帝乃封其為“林邑王”。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文帝忿其違傲，使交

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遣振武將軍宗慤受和之節度，府司馬蕭景憲為前鋒，大軍破區粟城（在原日南郡西卷縣治所，位今越南廣治西北面），陽邁落荒而逃。兩晉南北朝時期，林邑雖叛服無常，然亦經常遣使入華。僅據正史本紀所載，這一時期其入貢前後三十多次：西晉二次，東晉五次，宋十二次，南齊一次，梁十次，陳三次。

（二）扶南：自三國以後，扶南同中國一直保持密切之關係，史書所載這一時期扶南來貢之事約廿餘次：西晉四次，東晉一次，宋三次，齊二次，梁十次，陳三次。對扶南國內要事，中國載籍亦有記及，如《梁書·海南傳》提到大約公元四世紀末期，天竺婆羅門僑陳如（Kaundinya）入主扶南，這表明印度及其宗教對扶南頗具影響。天監二年（503年）七月，扶南遣使來貢，次年五月梁武帝封扶南王僑陳如闍耶跋摩（Kaundinya Jayavarman）為安南將軍扶南王⁴⁵。當時扶南僧人僧伽婆羅與曼陀羅曾在梁都建康譯經，在十三年中共翻經十部，梁朝還專門在台城設了譯經道場——扶南館。

（三）婆皇：自宋元嘉十九年（442年）至泰始五年（469年），婆皇凡八次來貢。宋文帝曾於元嘉二十六年封其王舍利婆羅跋摩為婆皇國王。一般認為婆皇在馬來西亞的彭亨（Pahang）一帶⁴⁶。

（四）婆達：其國亦於元嘉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兩次入貢，並受宋文帝之封賜。該國或為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北部的巴達人（Batak）所建⁴⁷。

（五）婆利：或又作婆黎。史載婆黎國於宋元徽元年（473年），婆利國於梁天監十六年（517）年、普通三年（522年），先後來貢。故地或以為即印度尼西亞的巴厘（Bali）島，另尚有加里曼丹島、蘇門答臘島等說⁴⁸。

（六）訶羅單：又作呵羅單、訶羅旦、訶羅陀、呵羅他。《宋元嘉起居注》云，“訶羅單國奉孔雀蓋一具”。《宋書》載元嘉七、十、十一、十四、廿九年，闍婆洲訶羅單國遣使獻方物，另又載訶羅陀於元

嘉七年來獻。或謂訶羅單即《爪哇史頌》(Nagarakertagama) 中Karitan一名的譯音，在爪哇島或蘇門答臘島，一說兼指此二島。另尚有馬來半島的吉蘭丹(Kelantan)等主張⁴⁹。

(七) 閩婆婆達：又作閩婆達、閩婆娑達、閩婆娑州。《宋書》卷九七載，“閩婆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陀阿羅跋摩遣使奉表”。一說與訶羅單所在的閩婆洲、後世的閩婆均為梵文名Yava 或Yavadvipa之對音，在爪哇島或蘇門答臘島。也有的認為係閩婆洲婆達國之謂，或誤合閩婆、婆達為一國。此外，尚有中南半島、馬來半島諸說⁵⁰。

(八) 蘇摩黎：《宋書》卷九七載，“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或謂在蘇門答臘島北岸的三馬朗加(Samarlangka)一帶⁵¹。

(九) 頓遜：此即《南州異物志》之典遜，當在緬甸東南岸的丹那沙林(Tenasserim)一帶。《梁書·海南傳》有詳細記載：“(扶南國)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雖未提及與中國互派使者，然該國商人常與中國交州及天竺、安息諸國“往還交市”。

(十) 干陀利：又作干陁利、斤陀利、乾陀利。該國在宋孝建二年(455年)，梁天監元年(502年)、十七年，陳天嘉四年(563年)，均來華朝貢。《梁書》云“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故地或謂在蘇門答臘的巨港(Palembang)一帶，為該地梵文名Kandari之譯音。另尚有馬來半島的吉打(Kedah)等說⁵²。

(十一) 狼牙修：該國於梁天監十四年(515年)、普通四年(523年)、中大通三年(531年)，陳光大二年(568年)，凡四次入貢中國。唯其故地之考訂則眾說紛紜，言人人殊。多數認為位馬來半島之北部，其中心在北大年(Patani)一帶，即《爪哇史頌》中的Lengkasuka。另有宋卡(Songkhla)、吉打(Kedah)、丹那沙林(Tenasserim)乃至暹

羅灣的Langkaciu島等等主張⁵³。

(十二) 盤盤：又作槃槃。《南史》云槃槃國在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然具體年代不詳，唯《宋起居注》曰：“孝建二年七月二十日，槃槃國王遣長史竺伽藍婆奉獻金銀琉璃諸香藥等物。”梁以後盤盤國又屢遣使來華：梁中大通元年(529年)、四年、五年、八年，大同六年(540年)，大寶二年(551年)；陳太建二年(570年)，至德二年(584年)。故地應在馬來半島之北部，或萬倫(Ban Don)灣附近一帶。另尚有佛統(Nakhon Pathom)、攀武里(Pranburi)、克拉(Kra)地峽乃至洛坤(Nakhon Srithamarat)等說⁵⁴。

(十三) 丹丹：該國於梁中大通三年(531年)、大同元年(535年)，陳太建三年(571年)五和十月、十三年及至德三年(585年)多次遣使來華。其故地當在今馬來半島，一般認為位吉蘭丹(Kelantan)一帶⁵⁵。

(十四) 頭和：陳至德元年(583年)遣使獻方物，該國應在今泰國湄南(Me Nam)河下游地區，為墮羅和鉢底(Davaravati)一名之省譯⁵⁶。

(十五) 師子：即獅子(古“獅”作“師”)，其名最早見於東晉法顯的《佛國記》，指今斯里蘭卡(Sri Lanka)。師子、獅子係該國古代梵文名simhala的意譯，或作執師子。三國時萬震《南州異物志》之師漢，晉代支僧載《外國事》、南朝竺芝《扶南記》之斯訶調或私訶條，則為該國巴利文名Sihadipa之音譯。《梁書》及《南史》記師子國於晉安帝義熙(405-418年)初始遣使獻玉佛像。後來該國又於宋元嘉五年(428年)、七年、十二年，梁大通元年(527年)多次來貢⁵⁷。

註釋

① 見《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

② 參見王庸《四海通考》，原載《史學與地學》第二期，1927年7月。

③ 見《中國南海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91頁。

④ 二人主張分別見《交廣印度兩道考》，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第90頁；《蘇門答刺古國考》，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95頁。另福克司所見略同，見Walter Fuchs,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u-t'u*, p. 8, Fu Jen University, Peiping, 1946. (福克司《廣輿圖版本考》)。他們所指均限於今南海的西部。陳序經先生基本上同意這種說法，他把焉說作為狹義的漲海，把伯希和等說作為廣義的漲海，見《猛族諸國初考》，1959年印行，第83頁。

- ⑤ 各種字典、辭典及部分地圖冊均把漲海當作南海的別稱。如《康熙字典》曰，“(漲海)又南海名”。其他如《中華大字典》、《辭源》，近年來出版的《辭海》、《中國歷史地圖集》，以及日本的《大漢和辭典》等等，看法都差不多。
- ⑥ 見許雲樵：《馬來亞史》上冊，新加坡青年書局1961年版，第83頁。另可參見拙文《漲海考》，載《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⑦ 《昌黎文集》卷三九。
- ⑧ 還有許多古籍所載不僅和《世說新語》注文一樣詳細，而且也標明珊瑚洲在大秦西南漲海中，如《通典》卷一九三，《永樂大典》引《異物志》，《古今圖書集成》引《南州異物志》，《大清一統志》和《嘉慶重修一統志》引《魏書》等等。
- ⑨ 如同中國載籍一樣，在一些外國人的著作中，對於漲海的理解也頗有不同。《馬來群島和馬六甲中文史料輯注》(W.P. Groeneveldt,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p.119, Batavia, 1876.)將漲海意譯為vast ocean(大海洋)，前引福克司《廣輿圖版本考》及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地學)譯為South Sea(南海)。九世紀中葉阿拉伯人蘇萊曼在關於中國和印度的行記中，曾提到從 sanf (據考即占婆，今越南中南部一帶)至中國諸門須經一海，此海之名據雷諾(M.Reinaud)對阿拉伯文的轉寫作 sanji，但法國人索瓦熱(J.Sauvaget)的翻譯校註本則轉寫為 šankhay，並據費瑯等人的意見把它訂正為Tchang-khai(=čang-khai)，同時注明這是中國的叫法，意為遼闊的大海。在索瓦熱書首的地圖中，今南海的位置上選擇Tchang-khai，此當即漲海的音譯。參見Jean Sauvaget, Relation de la Chine et de L'Inde rédigée en 851. p.9, 46, Paris, 1948. (讓·索瓦熱《公元八五一年刊定的中國印度記》)。十世紀阿拉伯人麻素提的《黃金草原》述及從波斯到中國，自西而東須逾七海，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也據法譯本把最東的一個 čankhay 指為漲海譯名。不過許雲樵《馬來亞史》上冊(新加坡世界書局1961年版，第10頁)、《南洋史》上卷(吉隆坡世界書局1961年版，第71頁)，以及吳宏宏《南朝隋唐時代中菲關係之探討(上)》一文(《大陸雜誌》三十一卷三期，1965年)，把漲海看成阿拉伯文獻中七海之一Cankhay的轉訛，卻值得商榷。如前所述，“漲海”一詞在我國古籍中所記極早，且不說被諸書轉引的公元三世紀時的著作(《扶南傳》、《南州異物志》、謝承《後漢書》)，即以《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梁書》而論，皆隋末或唐初之作，成書在七世紀初期，彼時方為阿拉伯伊斯蘭教曆紀元之始，而《蘇萊曼遊記》這部現今所知阿拉伯人最早記載中國的著作，則比《北堂書鈔》等足足遲了二百來年。若謂 šankhay 或 čankhay 是我國漲海一名的音譯，尚在情理之中；如反以漲海為阿拉伯人 čankhay 的對音，此說自難苟同。
- ⑩ 象郡之今地，或認為包括越南的北部和中部，治所今越南廣治(Quang Tri)之西北面；或據《漢書》卷一高帝紀註引《茂陵書》所說的“象郡治臨壘”，主張在中國境內。不過，即使如後說，象郡應亦包括今越南一部分。可參見馬思伯樂《秦漢象郡考》(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四編》，商務印書館1941年版)；鄧虛侯《秦代初平南越考》第二章“象郡考訂諸說”(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編》，中華書局1958年版)；蒙文通《秦象郡為漢日南郡辨》(《越史叢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⑪ 蘇繼慎認為究不事即Kambuja的對音，見《後漢書南蠻傳究不事人即柬埔寨人說》(載《學藝》17-5，《南洋學報》6-1)，另見其《島夷誌略校釋》73-74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南海鉤沉錄》102-104頁(究不事)(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然亦非定論，參見夏薰《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21-22頁。
- ⑫ 葉調，伯希和認為是梵語 Yava-dvipa 或爪哇島語Yawa-dwipa的對音，指爪哇島，見《交廣印度兩道考》(1904年刊於河內遠東法國學校校刊第四冊；商務印書館1933年出版馮承鈞譯本，中華書局1955年重印)。另見上引 Notes on Marco Polo, II, p.756, Paris-1963；III, p.297, Paris-1973。費瑯贊同其說，見《葉調斯調與爪哇》，載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另見《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馮承鈞譯，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但有的學者主張在錫蘭(Ceylon)，即今之斯里蘭卡，參見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何健民譯，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 ⑬ 揮國載於《後漢書》卷四六、五一、八六，故地一般均認為在緬甸東北部，包括今緬(Shan)邦一帶，參見前引《古代南海地名匯釋》690-691頁。
- ⑭ 敦忍乙一地，或認為是緬甸得勝族名Talaing的異譯(夏光南《中印緬道交通史》中華書局1948年版，23頁)；一說是Dhara的譯音，見方國瑜《中代中國與緬甸的友好關係》，載《雲南省歷史研究所集刊》第一集，1964年9月。
- ⑮ 關於《漢書·地理志》中西航路記載的考訂，可參見下列著作或論文：
 〈前漢時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記錄〉，藤田豐八，載《東西交涉史的研究(南海篇)》，星文館1927年；鄭師許譯，《新亞細亞》7-5，1934年5月；另見《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何健民譯，商務印書館1936年。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費瑯，馮承鈞譯，商務印書館1933年。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六冊，張星烺，1930年；參見中華書局1979年校訂本，19-21頁。

- 〈前漢時代海上交通考〉，鄭師許，《交大季刊》14期，1934年。
 〈讀前漢時代海上交通考〉，嚴挺，《人文》6-1，1935年2月。
 〈漢書地理志通黃支國考〉，藤田元春，《史林》24-4。
 《中國南洋交通史》，馮承鈞，商務印書館1937年。
 〈見於漢書中前漢海上交通的蠡測〉，鄭師許，《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專刊》4期，1943年3月。
 〈論漢代之陸運與水運〉，勞幹，《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1947年。
 〈紀元前中國南洋交通考（漢書地理志附錄考）〉，王新民、韓振華，《海疆學報》1期，1947年1月。
 〈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峽與地極〉，許雲樵，《南洋學報》5-2，1948年12月。
 〈漢書地理志已程不國即錫蘭說〉，蘇繼虞，《南洋學報》5-2，1948年12月。
 〈舊柔佛之研究〉，韓槐準，《南洋學報》5-2，1948年12月。
 〈漢代與南海黃支國的交通〉，譚彼岸，《社會經濟學報》1951年2期。
 〈黃支國在南海何處？〉，蘇繼虞，《南洋學報》7-2，1951年12月。
 《中西交通史》第一冊，方豪，華崗出版有限公司1953年1月。
 〈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一世紀間中國與印度東南亞的海外交通——漢書地理志粵地條末段考釋〉，韓振華，《廈門大學學報》1957年2期。
 《南海貿易》第二章〈通往黃支的航路〉，王廣武，原載《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第三十一卷第二輯（1958年）。參見姚楠等編譯《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年版，第24-38頁。
 〈西漢對南洋的海道交通〉，岑仲勉，《中山大學學報》1959年4期。
 〈秦漢時代中非關係之探討〉，吳景宏，《中非關係論叢》，新加坡青年書局1960年版，91-111頁。
 〈漢使航程問題——評岑韓二氏的論文〉，周連寬，《中山大學學報》1964年3期。
 〈前漢書地理志載中印航海行程考〉，徐玉虎，《人文學報（輔仁大學）》2期，1972年1月。
 〈中國與東南亞航路的第一紀程〉，邱新民，《南洋文摘》13-3，1972年。
 〈漢書地理志載中印航海行程之再檢討〉，李東華，《史原》8期，1978年9月。
 〈公元前後的中西古航線試探〉，李成林，《學術月刊》1980年3期。
 《〈公元前後的中西古航線試探〉質疑》，汶江，《學術月刊》1981年6期。
 〈漢代中國與東南亞和南亞海上交通路線試探〉，朱傑勤，《海交史研究》3期，1981年7月。
 〈都元國考〉，謝光，《世界歷史》1988年6期。
 〈海上絲綢之路的新加坡〉，邱新民，勝友書局1991年，23-79頁。
 16 參見拙著《中外交通史》，學津書店1987年版，52-55頁。
 17 有關林邑的資料，可參見前引《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93-496頁。
 18 參見上引《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402-404頁。
 19 參見上引書第696頁，及黃盛璋《道明國考》，《中外關係史論叢》第二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出版。
 20 駒井義明認為林陽應在暹羅（孫權遣使南方考），載《歷史と地理》25卷6號）。陳序經《扶南史初探》、《猛族諸國初考》謂林陽即猛族所立之Rammannadesa 或 Rammanyadesa，位於今泰國西部與緬甸東南部。D.G.E.Hall《東南亞史》推測林陽即緬甸境內的古驛國（見前引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36）。太田常藏《屈都昆考》引G.H.Luce及D.G.E.Hall諸說，謂林陽在緬甸境內，參見前引饒宗頤《大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另見蘇繼虞《南海鉤沉錄》，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88-189頁。
 21 參見岑仲勉《南海崑崙與崑崙山之最初譯名及其附近諸國》，載前引《中外史地考證》上冊第128-129頁，147頁。
 22 金鄰，伯希和《扶南考》馮註引日本僧迦某之見，謂為Palembang，或又置於Martaban沿岸（見上引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第88、104頁）。姚楠譯註H.G.Q. Wales《僑陳如王扶南考》一文，謂在緬甸或馬來半島；另引J.L. Moens之考，謂金鄰灣即暹羅灣（見《古代南洋史地叢考》，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142頁）。許雲樵前引《南洋史》上卷以為在佛統（見該書93頁）。D.G.E. Hall上引書認為在下緬甸或馬來半島（見該書p.27）。另參見上引《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524-525頁。
 23 許雲樵疑在暹羅或西域，未肯定，見上引《南洋史》上卷，第108-109頁。荻原弘明《朱江國考》一文引山本達郎之見，認為即驛國。
 24 Gastav Schlegel提出頓遜即緬甸南部的 Tenasserim，頗獲中外學界之贊同。但蘇繼虞《南海鉤沉錄》云，“友人張禮干先生當語筆者，‘頓遜’應為六坤（Ligor）內陸之董頌（Tung Sawng）”（見該書第26頁）；又見作者《島夷誌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07-108頁。另可參考《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503、625-626頁。

- 25 S. Levi 原將《梁書·中天竺傳》之文讀為“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到竺江口”，以“投拘利”為二世紀希臘地理學家Ptolemy地理書中之Takola (B.E.F.E.O., IV, 291, N.3)。C.G.E. Gerini則將投拘利(Takola)置於馬來半島西北岸的Pakchan河口(Researches on Ptolemy's 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 Vol. I, p.96, p.155)。楊守敬《水經注疏》以“投”為衍文。藤田豐八認為應讀為“從扶南發，投拘利口”(見《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89頁)。許雲樵也主張“投”為動詞，應以“拘利”為是，其地即Ptolemy書中之Coli，位於Kemaman River口之Chu Kai(見《南洋史》上卷，第97頁)。Paul Wheatley 接受Roland Braddell的意見，以拘利位於Trang(見The Golden Khersonese, Kuala Lumpur, 1961, chap. XVII, pp.268-272)。
- 26 伯希和《扶南考》主張在馬來半島(《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第87頁)。岑仲勉認為在Lancon(前引《中外史地考證》上冊，第117-118頁)。許雲樵考為Dungun(前引《南洋史》上卷，第97頁)。藤田豐八以為在蘇門答臘島(見前引《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第86、96頁)。另太田常藏《屈都昆考》引有山本達郎、桑田六郎、杉本直治諸異說。
- 27 駒井義明前引《孫權遣使南方考》認為在Bintang島。然由其地望及產金等情況，亦得在馬來半島南部。蘇繼虞以為在馬六甲，見前引《南海鉤沉錄》第345頁。
- 28 駒井義明前引文考為馬來半島東岸之Tantalam，許雲樵以之當丹丹(今古蘭丹)，見《康泰吳時外國傳輯註》，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77年出版，第32頁。然亦可能在馬來半島南部產鐵區，今Tringanu或Johore。參見上引《南海鉤沉錄》，第345頁。
- 29 參見駒井義明前引文；陳序經《扶南史初探》；許雲樵《南洋史》上卷，103頁；蘇繼虞《島夷誌略校釋》第174頁，《南海鉤沉錄》第257頁。
- 30 參見駒井義明前引文；許雲樵《南洋史》上卷，103頁。
- 31 五馬洲，《通典》卷一八八引《扶南土俗傳》作“馬五洲”。伯希和認為“馬五”為“馬立”或“馬里”之訛，當即今印尼西亞之Bali島，見前引《交廣印度兩道考》第90頁。藤田豐八主張以“五馬”為正，係印尼語gaumed(丁香)的對音，該洲位於Maluku群島，見前引《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第568頁。
- 32 斯調，伯希和、藤田豐八等主張在Ceylon，即今斯里蘭卡，見前引《交廣印度兩道考》、《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諸書。但勞費爾(Berthold Laufer)在《通報》1915年刊《火浣布與火鼠裘》一文，費瑯在《亞洲報》1916年刊《葉調斯調與爪哇考》一文，均主張該地在爪哇島。參見前引《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及《譯叢續編》，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
- 33 可參見前引《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154頁；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第90頁，另Notes on Marco Polo I, p.448；費瑯《蘇門答剌古國考》，第95頁；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第453頁；許雲樵《南洋史》上卷，第79、103頁；蘇繼虞《島夷誌略校釋》第161、207頁，另《南海鉤沉錄》第343頁。
- 34 伯希和主張在馬來半島南面。許雲樵、饒宗頤均認為在蘇門答臘。藤田豐八、蘇繼虞主張在南印度，但一說為Kulam，一說在Koyampadi。岑仲勉則主張在尼科巴群島。參見伯希和《關於越南半島的幾條中國史文》，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177-180頁；藤田豐八前引《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第557頁；許雲樵前引《南洋史》上卷，99頁；饒宗頤前引《還堂集林(史林)》中冊，第537頁；蘇繼虞《加營國考》，載《南洋學報》七卷一輯，另《南海鉤沉錄》第198-203頁；岑仲勉前引《中外史地考證》上冊，第124-125頁。
- 35 許雲樵以“蒲羅中”為巫語Pulau Ujong之對音，“極嶺頭洲”，指馬來半島南端，乃新加坡最古之地名，參見《馬來亞史》上冊，新加坡青年書局1961年版，及上引《南洋史》上卷(第97頁)。此說被饒宗頤、陳育崧所反對，為此在《南洋商報》引發一場長達九個月的學術爭論：1970年元旦，饒氏發表《新加坡古代名稱的檢討——蒲羅中問題商榷》；1月25日，許氏發表《蒲羅中問題的再商榷》；2月8日，饒氏再發《蒲羅中問題續論》；3月1日，許氏又發《蒲羅中問題贅言》；6月7日，陳氏發《建國至上——學術至上——我對蒲羅中問題的看法》；9月13日，許雲樵再發《詹詹小言談學術——答陳育崧先生建國至上，學術至上》。許氏主編的《東南亞研究》第六卷(1976年)全文收錄了上述文電。
- 36 岑仲勉認為歌營南有蒲類，其地即唐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的裸人國，今之Nicobar群島(明代載籍稱藍嶼)，見前引《中外史地考證》上冊第124-125頁。蘇繼虞《加營國考》指蒲類為唐玄奘《大唐西域記》的那羅種羅洲，其地在Nicobar群島一帶。饒宗頤除上述發表於《南洋商報》文章外，在《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一文也詳論蒲羅中問題，謂“蒲羅中”應以《神丹經》的“蒲羅”為是，其名與《南州異物志》的蒲類，後來《通典》的蒲利均為一地，即裸人國無疑。其說頗有見地，唯“蒲羅中”之“中”字是否衍文，其地在拘利東或南等，尚須對有關載籍加以辨證。
- 37 蘇繼虞《加營國考》置加營於南印度，故以加陳在沒來海岸。唯加營若在蘇門答臘島北部，則加陳自當別求。
- 38 《洛陽伽藍記》卷四之文“古有奴調國”，蘇繼虞謂應作“有古奴調國”，在見前引《南海鉤沉錄》，第6-7頁。饒宗頤以迦那調洲與《南州志》之姑奴國、奴調洲，《伽藍記》之古奴調國，《神丹經》之古奴(斯)調

- 國均同名異譯(或省譯,或衍文),見《選堂集林(史林)》中冊第551-553頁。
- 39 見前引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第217、223頁。
- 40 杉木直次郎考為Tamalipti,即今之Tamluk(〈印度支那古代社會的史的性格〉,載《東洋的社會》),參見許雲樵前引《康泰吳時外國傳輯注》,第50頁。
- 41 烏文地或考為馬來半島,或考為印度東海岸。前者參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152頁;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第16頁;陳序經《扶南史初探》。後者見陳荆和《林邑建國之始祖人物》,載《學術季刊》五卷二期;許雲樵《南洋史》上卷,第105頁。
- 42 參見許雲樵《康泰吳時外國傳輯注》第52頁。饒宗頤以為優欽應為優錢(見《神丹經》)之誤,即烏菴、烏茶,在Orissa,見《選堂集林(史林)》中冊,第558-559頁。
- 43 伯希和以橫跌與摸跌為同名異寫,在馬來半島,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173-176頁。駒井義明認為在緬甸沿岸。蘇繼庠則認為在印度東南,為黃支的別寫,參見《黃支國在南海何處?》,載《南洋學報》7-2(1951年12月)。
- 44 饒宗頤認為“師漢”與“Siha”音近,該地即古錫蘭之異譯Sihadipa,見《選堂集林(史林)》中冊第542頁。
- 45 有關波時中國與扶南的交往,詳見趙令揚《中國與扶南關係研究》,載《香港大學歷史學會慶祝金禧年刊》(1961年第二期)。另當時與南海諸國的往來,亦可參見前引王廣武《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第四章〈聖物朝貢〉。
- 46 《宋書》卷二九、九七作“婆皇”,卷五至七作“婆皇”(《南史》卷二、七八同),應為同名異譯。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引Gastav Schlegel之考訂指為Pahang,見該書譯本第9頁。另見前引費瑯《蘇門答剌古國考》,第125頁;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冊,第216頁。
- 47 《宋書》卷九七作“婆達”,卷五、九七作“婆達”(《南史》卷二、七八同)。李長傳《中國殖民史》,指為“Battak即室利佛逝”,見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49頁。Gastav Schlegel主張在馬來半島。韓振華《越南半島古史鉤沉》(載《福建文化》三卷三、四期,1948年6月)認為在越南中圻。
- 48 婆利見《宋書》卷九、《梁書》卷二、三、五四,《南史》卷六、七、七八,《北史》卷九五,《高僧傳》卷七。另《職貢圖》有載。婆黎見《宋書》卷九七、《南史》卷七八。張星烺前引《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以為婆黎即婆利,在蘇門答臘北部之Parlak(見第六冊第31頁)。此係F.Hirth & W.W.Rockhill 1912,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an-chi 舊說之一。伯希和主張婆利在Bali島,見前引《交廣印度兩道考》第90頁;但後來認為有些載籍之婆利應等於婆律(Baros),在蘇門答臘北岸,見前引Notes on the Marco Polo II, pp.666-667。W.W.Groeneveldt也主張在蘇門答臘北岸,見Notes on the Malay and Malacca, p.80。Bretschneider氏則以婆利應在婆羅洲(Borneo),即今加里曼丹島(The Knowledge Possessed by Ancient Chinese of Arabs etc. p.19),此說現漸獲中外史家之贊同。
- 49 《宋書》卷五、《南史》卷二作“訶羅單”,《宋書》卷九七、《南史》卷二及七八作“訶羅單”,《北史》卷九五有“訶羅旦”,《宋書》卷五及九七、《南史》卷七八有“訶羅陀”,《南史》卷二作“訶羅他”。該地Gastav Schlegel考在馬來半島之Kelantan,伯希和主張在爪哇島(見前引《交廣印度兩道考》第91-92頁;另見Notes on Marco Polo, I, p.439)。費瑯亦主張在爪哇(見前引《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者》,第16、85頁),馮承鈞注《蘇門答剌古國考》謂在蘇門答臘島(見該書第123頁)。韓振華前引《越南半島古史鉤沉》則主張在越南中圻。
- 50 《宋書》卷五有閩婆洲、閩婆婆達,卷九七作閩婆洲、閩婆婆達;《南史》卷二作閩婆婆達、閩婆婆洲,卷七八作閩婆洲、閩婆婆達。另《高僧傳》卷三亦已出現閩婆國名。韓振華前引《越南半島古史鉤沉》一文以馮承鈞認為閩婆婆達的“婆達”為衍字,伯希和認為兩國被誤合為一國,實則無衍無誤,因“閩婆婆達”即閩婆洲婆達國之謂,但其將該地置於越南之中圻。
- 51 《宋書》卷九七、《南史》卷七八作“蘇摩黎”,但《宋書》卷五則作“蘇摩黎”。其地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六冊31頁)、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冊212頁)均置於蘇門答臘北部之Samarlangka。
- 52 該地《宋書》卷六作“斤陀利”,《梁書》卷二、五四作“干陀利”,《陳書》卷三作“干陀利”(《南史》卷二、六、九、七八同),《隋書·經籍志》則載為乾陀利。艾莫涅前引《扶南考》不同意Gastav Schlegel把干陀利等同於Kandari,主張應為林邑、扶南二國之一,尤以屬扶南為近理。費瑯《蘇門答剌古國考》認為“迦荼羅(Kadāra)……近類大食文之干陀利(Kandari),亦即《梁書》之干陀利,《宋書》之斤陀利,大食人昔以稱蘇門答剌之名也”(第35頁)。x
- 53 有關狼牙修的今地考證,一直聚訟不休。可參考前引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第13、14、19-21、28頁;費瑯《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者》第34-41頁;伯希和Notes on Marco Polo, II p.767, III p.166;姚楠、許鈺《古代南洋史地叢考》第8-10、23-24頁;許雲樵《馬來亞史》上冊第89頁,《南洋史》上卷第160頁;D.G.E.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30, pp.37-38。邱新民《東南亞古代史地論叢》詳列中外史家諸種不同學說,頗值參考,見南洋學會1969年版,第198、223頁。

- 54 《梁書》卷三、五、五四，《陳書》卷五、六，《南史》卷七、八、十、七八，《北史》卷九五等作“盤盤”。《宋書》卷六，《南史》卷二及七八作“槃槃”，唯西域另有一槃槃，不可與此相混。關於盤盤今地考察，可參見前引藤田豐八《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第12、21頁；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第73頁；費瑯《蘇門答剌古國考》第125頁；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129-132頁，下冊437頁；張星娘《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六冊449、462頁；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第241頁；陳序經《扶南史初探》、《猛族諸國初考》；W.P. Groeneveldt, *Notes on the Malay and Malacca*, p. 121；D.G.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 38, p. 117；姚柟、許鈺《古代南洋史地叢考》第10、12、21、25-26、131、143-144頁；邱新民《東南亞古代史地論叢》第180頁。
- 55 丹丹一名載於《梁書》卷三、五四，《陳書》卷五、六，《南史》卷七、十、七八，《北史》卷九五。有關考訂可參見W.P. Groeneveldt, *Notes on the Malay and Malacca*, p. 82；D.G.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 41；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第97-98頁；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第220頁；張禮千《唐代之南海大國》；陳序經《猛族諸國初考》；另許雲樵《丹丹考》，載《古代南洋史地叢考》。
- 56 頭和見於《陳書》卷六、《南史》卷十。費瑯《蘇門答剌古國考》以為即墮和羅、杜和鉢底(Davaravati)之同名省譯，在暹羅湄南河流域(見該書第125頁)。另可參見H.G.Q. Wales之《從緬甸古都室利差呾羅談到墮羅鉢底國》，載前引《古代南洋史地叢考》。
- 57 晉代載籍始現的“師子”一名，已被公認為今斯里蘭卡的古稱。唯海外地名以師子相稱者殆不止一處，馬來半島北岸的宋卡原名Singora，即梵語師子座之義，新加坡原名Singapura，意為師子城，隋使常駿使赤土途經師子石。參見前引《古代南洋史地叢考》，第26頁。

魏晉南北朝南海交通地名載錄一覽表

書名 地名	康泰書	異物志	南州異物志	扶南傳	扶南記	竺芝 扶南記
南 海			✓		南海郡	
漲 海	《外國(雜)傳》、 《吳時外國傳》	✓	✓	✓		
日 南	《扶南記》	✓	✓	✓		
林 邑	《扶南記》		✓			✓
西 屠		✓				
扶 南	《扶南傳》、《扶南土俗》	✓	✓	✓	✓	✓
都 昆	《吳時外國傳》		✓			
屈都乾						
拘 利	《扶南傳》、《扶南土俗》					
句 稚			✓			
蒲羅中	《扶南土俗》					
蒲 類	《扶南土俗》		✓			
諸 薄	《吳時外國傳》、《扶南土俗》					
社 薄			杜薄			
巨延洲	《扶南土俗》					
五馬洲	《吳時外國傳》、《扶南土俗》					
火 洲	《扶南土俗傳》		✓			
北攏洲	《扶南土俗》					
薄歎洲	《扶南土俗》					
耽蘭洲	《扶南土俗》《南方草木狀》					
金 陳		金鄰		金陣		✓
加 陳			✓			

書名 地名	外國傳	太清金液 神丹經	林邑記	廣志	洛陽 伽藍記	其 他
南 海						蘇頌引朱應《扶南記》？
漲 海	✓			✓		《吳都賦》、《南方記》、 《南越志》、《廣州記》
日 南	✓	✓		✓		《南方草木狀》、《交州記》
林 邑		✓	✓		✓	《交州雜事》、《職貢圖》
西 屠	西圖	西圖	✓			《交州以南外國傳》、《吳都賦》
扶 南	✓	✓	✓	✓	✓	《南方草木狀》、《南越志》
都 昆		✓				《南方草木狀》
屈都乾	✓		屈都			《梁書》(屈都昆)
拘 利						
句 稚		✓			✓	《梁書》(九稚)
蒲羅中		蒲羅(中)				
蒲 類						《通典》(蒲刺？)
諸 薄				✓		《南方記》、《梁書》
社 薄		杜薄				《南越志》
巨延洲						《廣州記》
五馬洲						《梁書》(馬五洲)
火 洲	大火洲	炎洲		✓		《梁書》(自然大洲)
北攊洲						
薄歎洲						
耽蘭洲						《南方草木狀》
金 陳	✓					《吳都賦》(金鄰)、《扶南日南傳》
加 陳		✓				

書名 地名	康泰書	異物志	南州異物志	扶南傳	扶南記	竺芝 扶南記
林 陽	《扶南土俗》		✓			林楊
頓 遜			典遜	頓孫	✓	✓
毗 騫				✓		✓
林 鄒						✓
無 論			✓			
波 遼						
波延洲						
奴 後						
究 原						
加 營	《吳時外國傳》					
歌 營			✓			
斯調洲	《吳時外國傳》、《扶南土俗》	✓	✓	✓		
私訶條	《外國事》					✓
察 牢			✓			
加那調洲	《扶南傳》、《吳時外國傳》					
姑 奴			✓			
奴 調			奴調洲			
扈 利			✓			
師 漢			✓			
剽 國						
嚙 楊	《扶南傳》					
模 趺	《吳時外國傳》、《扶南土俗》					
烏 文	《扶南土俗》					
葉 波						
大 秦	《扶南傳》、《吳時外國傳》	✓	✓			

書名 地名	外國傳	太清金液 神丹經	林邑記	廣志	洛陽 伽藍記	其 他
林 陽	✓	林楊				
頓 遜		典遜		典孫		《博物志》、《梁書》
毗 騫						朱建安《扶南以南記》
林 邠						
無 論		無倫				
波 遼	✓					
波延洲	✓					
奴 後	✓					
究 原	✓					
加 營						《玄中記》
歌 營		✓			✓	
斯調洲		✓		✓	✓	《應志》？《交州記》、《齊民要術》
私訶條						《外國事》
察 牢		✓				
加那調洲						
姑 奴		古奴			古奴調	
奴 調					奴調國	
扈 利		扈黎				
師 漢		✓				
剽 國				✓		
潭 楊						
模 趺						
烏 文						
葉 波		✓			業波羅	
大 秦		✓			✓	宋膺《異物志》、《魏略》

書名 地名	康泰書	扶南傳	南州異物志	魏 略	法顯傳	竺 扶南記
擔 扶	《扶南傳》					
恆 水	《扶南傳》		✓			
新陶水	《吳時外國傳》		✓			
崑崙山	《扶南傳》	✓				
天 竺	《扶南傳》、《外國傳》、 《扶南土俗》	✓	✓	✓		✓
舍 衛		✓				
伽 尸		✓			迦尸	
波羅奈		✓			✓	
大 宛						
罽 賓						
渠 搜						
濱那專	《扶南土俗》					
月 支	《扶南傳》、《吳時外國傳》					
大月氏			✓			
隱 章						
優 鉞	《扶南土俗》					
安 息	《扶南傳》	✓	✓	✓		✓
波 斯						
安谷城				✓		
烏 丹				✓		
遲 散				✓		
烏遲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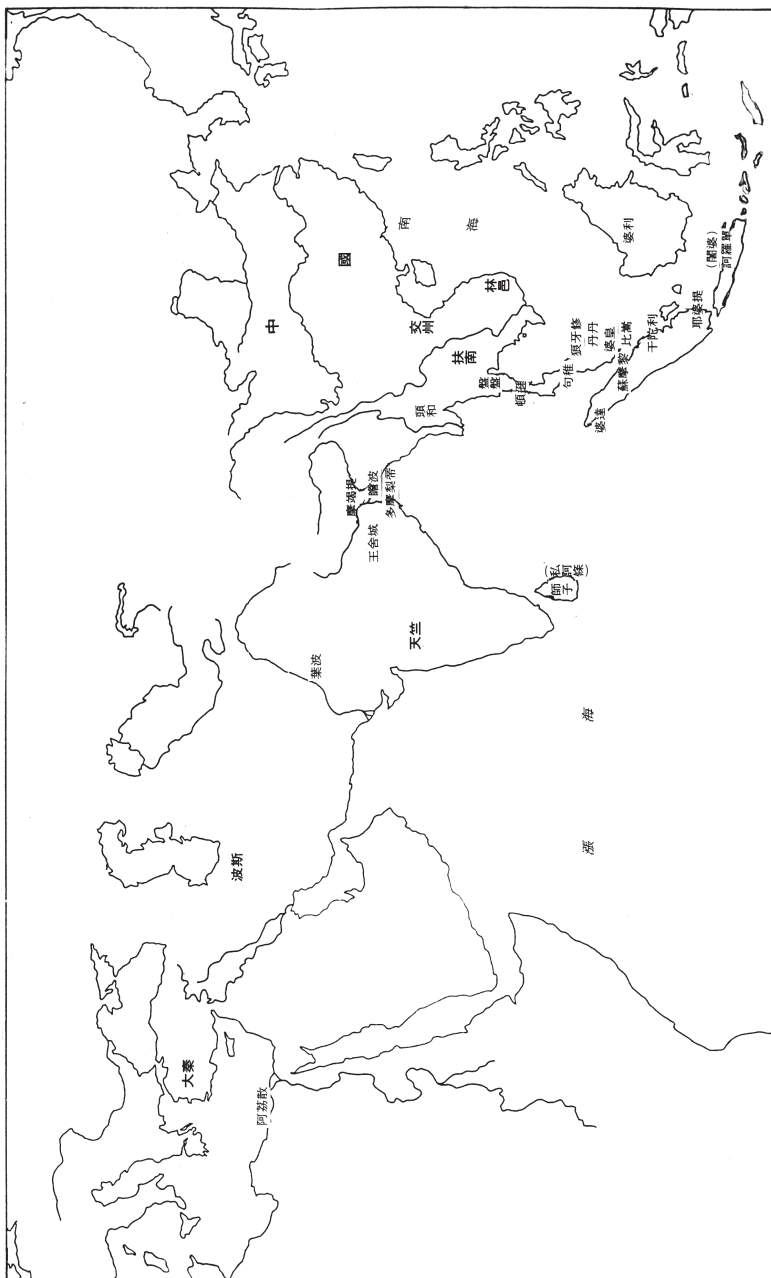
書名 地名	高僧傳	太清金液 神丹經	宋書	職貢圖	梁書	其 他
擔 扶						
恆 水						
新陶水						
崑崙山						
天 竺		✓	✓	✓	✓	
舍 衛						
伽 尸						
波羅奈						
闍 賓		✓				
大 宛						宋膺《異物志》
渠 搜						宋膺《異物志》
濱 專						
月 支		✓				
大月氏						宋膺《異物志》
隱 章		✓				
優 鉞		優錢				
安 息		✓				
波 斯						《魏書》
安谷城						
烏 丹						
遲 散						
烏遲散						

書名 地名	康泰書	扶南傳	南州異物志	魏略	法顯傳	竺芝 扶南記
婆 律						
瞻 波					✓	
摩竭提					✓	
王舍城					✓	
華氏城						
多摩梨帝					✓	
師 子					✓	
耶婆提					✓	
丹 丹						
盤 盤						
婆 利						
訶羅陀						
呵羅單						
干陀利						
狼牙修						
盤 越				✓		
比 高						
槃 皇						
槃 達						
閻婆婆達						
閻 婆						
蘇摩黎						
頭 和						
(崑崙舶)						
(崑崙舸)						

書名 地名	高僧傳	太清金液 神丹經	宋書	職貢圖	梁書	其 他
婆 律						《宋書》、《南史》
瞻 波						
摩竭提						
王舍城	✓					《外國事》、釋氏《西域記》
華氏城	✓					
多摩梨帝						
師 子					✓	《南史》
耶婆提						
丹 丹					✓	《陳書》、《南史》、《北史》
盤 盤					✓	《陳書》、《南史》
婆 利	✓		✓	✓	✓	《南史》(婆黎)；《北史》
訶羅陀			✓			《南史》
呵羅單			✓			《南史》；《北史》(訶羅旦)
干陀利				斤陀利	✓	《南史》(近陀利)；《陳書》
狼牙修				✓	✓	《陳書》、《南史》
盤 越					✓	《南史》
比 高		✓				《通典》
婆 皇			✓			《南史》(婆皇)
婆 達			✓			《南史》(婆達)
閭婆婆達			✓			《南史》(閭婆達)
閭 婆	✓		✓			《南史》(閭婆洲)
蘇摩黎			✓			
頭 和						《陳書》、《南史》
(崑崙舶)						《南齊書·荀伯玉傳》
(崑崙舸)						《水經注》引《林邑記》

This is a black and white line drawing of a map of East Asia, show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Japan, and surrounding seas. The map is label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labeled '高麗' (Goryeo) and '新羅' (Silla).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is labeled '日本' (Japan). The surrounding seas are labeled '渤海' (Bohai Sea), '黃海' (Yellow Sea), and '東海' (East Sea). The map also shows the '大連' (Dalian) area and the '遼東' (Liaodong) peninsula.

兩晉、南北朝南海對外交通諸國



第三章

康泰、朱應出使扶南之探究

兩漢雖有張騫鑿空與班超再通西域，以及南海向西航線之開闢，但彼時與海外諸國之外交往來頗稀，且所載國家之方位多不甚明確。《漢書·地理志》所記由南海赴黃支的航線，許多學者把終點考為印度東南岸，然迄今猶無定論，有些今地考證之差距實不可以道里計。至於與中國通交的一些南海國家，如葉調、究不事、敦忍乙等，其今地之比附亦屬撲朔迷離。當時與中國有往來的東南亞或西方國家，比較可以肯定的是位於今緬甸的撣國及天竺、大秦，唯撣國之入華未必遵由海路。

及至魏晉南北朝，情況則發生較大的變化。距今約一千七百三十年前，在三國時期，東吳孫權曾派康泰、朱應等出使扶南。這是史書所載中國首次派遣專使和南海諸國交通往來的一件大事，其意義實不亞於兩漢時期張騫、班超之通西域，而且康泰等返國後所撰的見聞錄——《扶南傳》(或《吳時外國傳》)，對研究東南亞古史和古代中國南海交通頗有價值。有鑑於此，下文擬就康泰、朱應出使扶南的二三事貢獻一己之見。

一 吳時中國與扶南的通交

“扶南”一名，始見於三國時的載籍^①。正史中之記載，則首推《三國志》。該書《吳志·呂岱傳》載，“岱既定交州……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呂岱平交州為黃武五年(226年)之事，黃龍三年(231年)他被孫權召還，改屯長沙漚口，故這裏提到的扶南等國遣使來貢，應發生在公元226-231年之間。又《吳志·孫權傳》載，“(赤烏六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此為公元243-244年之事^②。

扶南之名雖早見於中國載籍，但其今地的考定卻經歷了一段時間。起初一些學者認為它位於緬甸、泰國或馬來半島，後法國學者艾莫涅、伯希和先後發表同名文章〈扶南考〉，指出它是真臘的前身，位於今柬埔寨一帶，其結論漸獲中外學界的普遍贊同^⑨。不過有關中國與扶南的交往研究，不能僅限於正史，尚須翻檢其他載籍。據《藝文類聚》卷八四載：“《吳曆》曰：黃武四年（公元225年），扶南諸外國來獻瑠璃”，《吳曆》一書向被視為信史，故是次入貢應屬扶南最早遣使入華之記錄^⑩。

既然扶南在孫吳時屢屢遣使來貢，孫吳派使者回訪自屬順理成章之事，它以康泰、朱應出使扶南而著稱於世，並成為史書明確記載中國首次派遣專使與南海諸國交通往來的重大事件。然此事不見於《三國志》，只有唐人姚思廉的《梁書·海南傳》作了最早的也幾乎是唯一的記載，茲略引如下：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及西南大海洲上……。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

“扶南國……（范）蔓姐子旃，時為二千人將，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女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為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

“天竺……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

極遠，猶有此人！’，即呼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遣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

二 康泰、朱應出使扶南的時間

由於有關的記載或支離分散，或語焉不詳，康泰、朱應自身的記傳又早已散佚，故此次出使的全過程很不清楚。如康、朱二人具體何時出使，在外多久，長期以來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關於康泰、朱應出使時間的問題，大別而論，有兩種不同的主張：

第一種認為康泰、朱應在公元226-231年間奉派出使扶南。其主要根據是《三國志·呂岱傳》，因呂岱在黃武五年平交州後，“遣從事南宣國化”，這個“從事”顯然就是《梁書》所說的“宣化從事朱應”；又因呂岱於黃龍三年被孫權召還，故將使者始發的可能年代置於226-231年間^⑤。然而《三國志·孫權傳》明明記載扶南王范旃於赤烏六年十二月(244年)尚派使來華，《梁書》說康、朱“使於尋國”，范尋稱王又在范旃之後。如何解釋這個矛盾呢？堅持226-231年說者在肯定其前提下，又有不同的主張，或認為《三國志·孫權傳》記載有誤^⑥；或認為康、朱奉使在外有一二十年之久^⑦；或認為二人出使不止一次，而有兩次乃至三次^⑧。

第二種主張是康泰、朱應出使當在245-251年間。康、朱既“使於尋國”，其出使自應在赤烏六年范旃遣使入貢之後，但也不會遲於公元252年，因是年孫權卒^⑨。

鄙意古籍記載固然不足盡據，但倘無確實證據也不便隨意推翻。何況有關三國時期中國扶南關係的記載就那麼寥寥數段，且多出自“二十四史”這樣的基本文獻，如果只據一段就輕易地否定另一段，問題就更加難以弄清。比較可行的是將各種記載仔細排比對照，找出

問題癥結所在，盡量予以合理解釋。目前並無充分的根據可以推翻《吳志·孫權傳》上的記載。相反，如果把康泰等的出使時間置於赤烏六年之後，則各種史籍的記述並不矛盾，也不用作些不太合理的推測。茲列一表附後，並略加說明：

古籍所載康泰、朱應出使扶南時間比勘表

公元222年	(吳黃武一		
公元223年	二		
公元224年	三		
公元225年	四	扶南來獻(《吳曆》)	
公元226年	五	呂岱平交州(《三國志》)	
公元227年	六	岱遣從事	范旃
公元228年	七年)	南宣國化，	執政？
公元229年	(吳黃龍一	扶南來貢	黃龍，扶南
公元230年	二	(《三國志》)	來獻(《吳曆》)
公元231年	三年)	呂岱被召還(《三國志》)	
公元232年	(吳嘉禾一		
公元233年	二		范旃 執政？
公元234年	三		旃篡蔓位，
公元235年	四		蔓乳下兒長
公元236年	五		至二十 殺
公元237年	六年)		旃(《梁書》)
公元238年	(吳赤烏一		十餘年，蔓
公元239年	二	呂岱復任交州	少子長殺旃
公元240年	三	牧一年(《三國志》)	(《南齊書》)
公元241年	四	范旃遣蘇物至天竺？	
公元242年	五	往返六年，回國時范	
公元243年	六	尋即位(《梁書》)	

公元244年	七	十二月范旃遣 使獻(《三國志》)	范旃死？
公元245年	八		范旃遣使往天竺？
公元246年	九	孫權遣康泰、	
公元247年	十	朱應使於尋國	
公元248年	十一	(《梁書》)	
公元249年	十二		
公元250年	十三年)		范旃死？
公元251年(吳太元一年)			
公元252年(吳神鳳一年)	(吳孫亮建興一年)	孫權卒	
公元253年(吳建興一年)			
公元254年(吳五鳳一			
公元255年	二年)		
公元256年(吳太平一			
公元257年	二年)		
公元258年(吳永安一			旃大將范
公元259年	二		尋又殺
公元260年	三		長，國人
公元261年	四		立以為
公元262年	五		王，是
公元263年	六年)		吳、晉時
公元264年(吳元興一年)			也(《南齊書》)
公元265年(晉泰始一			
公元266年	二		
公元267年	三		
公元268年	四	扶南來獻(《晉書》)	
公元269年	五		
公元270年	六		
公元271年	七		

公元272年	八	
公元273年	九	
公元274年	十年)	
公元275年 (晉咸寧一		
公元276年	二	
公元277年	三	
公元278年	四	
公元279年	五年)	
公元280年 (晉太康一		晉太康中，
公元281年	二	尋始遣使貢
公元282年	三	獻 (《梁書》)
公元283年	四	
公元284年	五	
公元285年	六	扶南來獻 (《晉書》)
公元286年	七	扶南來獻 (《晉書》)
公元287年	八	扶南來獻 (《晉書》)
公元288年	九	
公元289年	十年)	

據上表來分析，康泰、朱應出使於245-251年間是比較可信的。從諸史記載看，下列問題可以肯定：(1) 扶南最早遣使入華為吳黃武四年 (225年)，並非呂岱在交州主政 (226-231年) 時遣使南宣國化的結果；(2) 范旂於赤烏六年十二月 (244年) 遣使入華；(3) 范旂執政時間約十七、八年，不到二十年¹⁰；(4) 康泰、朱應奉孫權所派出使扶南時間，值范尋執政，故其出使時間應於245-251年間求之¹¹。

由於史料的不足，無法確定康泰、朱應是在245-251年間的何年出使扶南。伯希和從“224-230年”退至“245-250年”雖有道理，但在後期的著作中，又將康泰等回國寫書的年代定為250年¹²，卻又未免失

之過實。從這變動不居的大約七個年頭，可以推導出兩種同樣變動不居的判斷，而且三者均密切相連：(1) 范旂執政的年代：由227-245年，或228-246年，……乃至232-250年，存在六七種可能性，唯不早於225年、不遲於251年；(2) 范旂遣蘇物使天竺年代：其往返約六年（由扶南到天竺江口費時一年餘，又逆水七千里至天竺都城，回程歷四年方返），因回國已是范尋即位，故必為范旂執政末年，也存在六七種可能性，由240-245，或241-246，……乃至245-250。

在確立245-251年說的同時，自須否定226-231年說。因為如欲肯定226-231年說，就必須作些不一定符合情理或無充分史料支持的猜測，否則即與許多史籍記載相牴牾。這類猜測包括康泰、朱應出使在外近二十年，或前後出使兩次或三次^⑩。為使問題迎刃而解，首先要排除康泰、朱應等為呂岱所遣之說。“226-231年”說的主要依據是《吳志·呂岱傳》，而其最大失著也在於此。因為呂岱所遣從“從事”雖然有可能是朱應，但焉知其必為朱應？不能因“遣從事南宣國化”和“宣化從事”有些相合就遽以斷言。《呂岱傳》上根本未提及具體人名，不知所遣“從事”究為何人，也未說明該“從事”是否到過扶南、林邑、堂明各處，或只去過其中某處。如無赤烏六年來貢一事，則康泰等為呂岱所遣的推測尚可考慮，但既有此記錄，就不能因文字的某些相合而推翻《吳志·孫權傳》的明確記載。相反，康泰、朱應之出使扶南，史書明載為孫權所派，“使於尋國”，綜合諸種史載而加以分析，他們顯非呂岱所派。

三 康泰、朱應孰正孰副

與康泰、朱應出使及其時間密切相關的，還有一個誰是正使、誰是副使的問題。

下面擬再就二人的官職略申拙見，為否定呂岱派遣一說添加佐證。《三國志·呂岱傳》僅載“岱……又遣從事南宣國化”，由此很難看出該從事為中央所派，如果後來史書所云派往扶南的使者只有“宣化

從事朱應”一人，或者朱應肯定為是次出訪的正使，那麼尚不能完全否定其為呂岱所遣之說。但是《梁書》明載吳孫權時所遣的使者有康泰、朱應二人，顯然具有中央專使的性質，非地方政府所遣；而且根據東漢、三國時的官制來分析，中郎康泰當高於宣化從事朱應，非為呂岱所派，否則“中郎”一官也不會為《呂岱傳》所忽略。

按，從事猶言治事、辦事，為漢代州刺史的佐吏，通稱“州從事”，其官秩僅屬“百石”^⑬。呂岱不僅在平交州後遣從事到徼外，而且在平交州士燮子士徽叛亂前，也曾任士燮弟子士匡為師友從事，時呂岱為廣州刺史或交州刺史，足見此等從事肯定均屬州之幕僚^⑭。而中郎一職，自秦、漢以降均為中央政府的高級近侍官，初時屬郎中令（漢武帝時改稱光祿勳）管，東漢時歸五官、左、右、虎賁等中郎將之下，秩比六百石^⑮。三國時的“從事中郎”為公府屬官，秩第六品，地位亦不低。因此，康泰作為正使由孫權直接派出較為合理，僅屬一州刺史的呂岱所派的只是低級的從事，《呂岱傳》所載並無訛，只是後人不應作不近情理的推測。

在考證康泰、朱應孰為正、孰為副時，尚須對《梁書·海南傳》的幾處記載加以細辨。在該傳“總敘”部分首載：“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在史載中把朱應之名置於康泰之前的，唯此一見，但卻也給康泰是正使之說帶來不利的證據。不過如綜觀其他記載，則提供更多的觀點相反之資料，如同傳“扶南國”部分云，“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同傳的“天竺國”部分竟只提康泰之名：“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看來，同一篇《海南傳》中，把康泰擺前或單署康泰之名者為多。更有進者，《太平御覽》卷七八七“蒲羅中”條著錄康泰書云：“吳時，康泰為中郎，表上《扶南土俗》，曰……”。這裏同樣單表康泰一人，而且載明由他向朝廷奉表報告出使經過及記傳，有助於分析康、朱二人在使團中的地位與作用。

四 康泰等所寫的記傳及其輯佚

康泰、朱應既為交通海南諸國最早的專使，其見聞錄自是中國記載古代南海交通的重要專著。惜其書久已散佚，使吾人無法觀其全豹，而且對他們二人著作本身之真實情況也每多存疑。

查《隋書·經籍志》和新舊唐書藝文、經籍志，均載有朱應《扶南異物志》一卷。但朱應此書一向未見他書引用。《梁書·劉杳傳》曾敘及朱建安《扶南以南記》：“杳少好學，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侯康在《補三國藝文志》中提出朱建安或即朱應，《扶南以南記》或即《扶南異物志》¹⁷。因無從查考，只好姑且存疑。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認為，《通典》、《史記正義》所引的宋膺《異物志》可能是朱應《扶南異物志》的誤寫¹⁸。伯希和對此深表贊同¹⁹。宋膺《異物志》不見隋唐經籍、藝文志著錄。無論唐人的《通典》、《史記正義》，抑或宋人的《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其所引的宋膺《異物志》殘文不出十條，記述均西域之事（如疏勒、大宛、大月氏、大秦）。雖說康、朱所記不限於扶南，而旁及南亞、西亞，然宋膺之文卻無一處涉及東南亞特別是扶南的。宋膺之為朱應，既無確證，遂亦不能苟同。

不管朱應之作下落如何，康泰的書卻被《水經注》以至唐、宋許多類書大量引錄。由於諸書引用時冠以各種各樣的書名，如康泰《扶南傳》（或康泰《扶南記》）、《吳時外國傳》、康泰《外國傳》、康泰《扶南土俗》……，致使康泰本人的著作究係一種、兩種還是三種也成為疑問。侯康《補三國藝文志》認為，“泰遍歷百數十國，必不止專記扶南一方，其大名當是《吳時外國傳》，而《扶南傳》則其中之一種，《扶南土俗》又《扶南傳》之別名也”。楊守敬所見略同²⁰。

從諸書所引的康著條文來看，有時內容雷同的文字卻被標為不同的書名，像自然白鹽如細石子一條，《北堂書鈔》卷一四六引用出處作《吳時外國傳》，《太平御覽》卷七八七作康泰《扶南土俗》，所以侯康、楊守敬之說有些道理。但其總名似以康泰《扶南傳》或《外國傳》為宜，因“吳時”二字顯係後人所加，其為衍文殆無疑義。《水經注》較早引用康泰《扶南傳》、《扶南記》，《史記索隱》、《史記正義》引用康書只標《外國傳》或康泰《外國傳》等，均可為證。

更有進者，不僅所傳康泰各種不同名稱的著作可能是同一部書，即若康泰、朱應二人之作亦似為一種。向達說：“按《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帳引有‘應志云：斯調國王作白珠交給帳，遣遣天竺之佛神。’所謂應志，豈即指朱應之《扶南異物志》而言耶？”²⁴今查同樣內容的條文，《太平御覽》卷六九九曾兩處引用，其出處均作《吳時外國傳》。又上述毗騫國長頸王事，《太平御覽》卷三六九所引《扶南傳》的記載也大同小異。設若“應志”或朱建安《扶南以南記》均非朱應的《扶南異物志》，至少有一樁事實始終令人費解：同在隋、唐之世，何以隋唐經籍志、藝文志著錄朱書，而其文卻未被它書所引；康泰之文為諸書廣徵博引，其著作卻不見隋志、唐志著錄？侯康在考證朱應《扶南異物志》時提到：“《南史》稱朱應經過傳聞百數十國，因立記傳，而《隋志》獨載此書者，意他卷盡亡，而此卷塵存也。”這種看法實無法使疑問冰釋。《梁書》、《南史》所謂的“記傳”係康、朱二人所作，而非專指朱應，如說“他卷盡亡”則康泰之書為何被大加引錄，若謂朱應“此卷塵存”卻又杳無影蹤。極有可能，康泰、朱應的“記傳”乃一人之作而冠以二人之名，一人為實際作者而另一人因如前文所云是主使官而得以名列其前。

康泰、朱應的“記傳”雖已亡佚，但僅據現存在的一些片斷，其重要性已歷歷可見。《梁書》說他們經歷和傳聞的有百數十國，從康泰《扶南傳》的殘文來看，其記述確實不限於扶南一地，而包括東南亞、南亞乃至西亞各國數十個地方。光扶南一地而言就有十來條，專記扶

南古代諸王(如混填、混盤況、范旃、范尋等)執政時的法律、征戰、物產、造船、風俗和對外交通等等情況。他們的部分記載不僅為同時代萬震的《南州異物志》和稍後的郭義恭《廣志》、《太清金液神丹經》等所襲用，而且《南齊書》、《梁書》、《南史》等歷史文獻也都據以編輯海南諸國傳。所以康泰《扶南傳》是研究古代南海交通、柬埔寨古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前面我們曾引用康泰本人的記錄來證明朱、康出使時扶南王確為范尋，僅此一端，就足見《扶南傳》輯佚的重要性。倘能將康、朱所記全部輯錄出來，當是頗有意義的一項工作。

過去，中外學者有志於《扶南傳》輯佚者不少。清季陳運溶曾在《麓山精舍叢書·古海國遺書鈔》作過輯佚，但所錄很不完全²²。王謨的《漢唐地理書鈔》總目曾包括有康、朱之作，伯希和也有類似打算，唯均未見刊佈。1929年，向達發表〈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輯佚〉，貢獻不小²³。他把《水經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法苑珠林》、《太平御覽》等書中的條文匯輯起來，所收五十來條(包括重出的)。不過其中部分條文並未能斷定即康泰之作，可能係出自竺芝的《扶南記》。1971年，許雲樵於星洲出版了《康泰吳時外國傳輯注》，凡自十七種書籍輯出佚文一百一十五則，去其複見者餘七十八則，此為目前該書輯佚規模之最大者²⁴。另日本渡部武亦作過《朱應、康泰の扶南見聞錄輯本稿》，所錄不及許著²⁵。

我們應該以前人探索的成果為基礎，進一步從事康泰《扶南傳》的輯佚工作。筆者久亦有志於此，曾自三十多種古籍中輯出該書一百多則，雖然多已見諸上引大家之作，然也不無愚者之一得。茲就自己所見，將該書被輯錄引用的情況列一簡表，以清眉目。同時，另附一《康泰、朱應有關扶南記傳名稱演變表》，以饗同好。

康泰、朱應有關扶南記傳名稱演變表

時代 書名	魏晉南北朝	隋	唐	宋
扶南傳	①《扶南傳》 (見《搜神記》、 《吳都賦》劉逵注) ②康泰《扶南傳》 (見《水經注》) ③康泰《扶南記》 (見《水經注》)	〔自《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至《太平御覽》等，單標《扶南傳》、《扶南記》者，多非康泰之書〕		
外國傳		④《外國傳》 (見《北堂書鈔》) ⑤《吳時外國傳》 (見《北堂書鈔》)	《外國傳》 (見《後漢書》李賢注引、 《史記索隱》) 《吳時外國傳》 (見《藝文類聚》、 《初學記》) ⑥《吳時外國志》 (見《藝文類聚》) ⑦《外國雜傳》 (見《初學記》) ⑧康泰《外國傳》 (見《史記正義》) ⑨康氏《外國傳》 (見《史記正義》)	〔《太平御覽》等：單標《外國傳》者，多非康泰之書〕
扶南異物志			⑩朱應《扶南異物志》 (見隋書經籍志、 新舊唐書藝文志) [a. “應志”(北堂書鈔)？ b. 朱建安《扶南以南記》 (梁書)？ c. 宋膺《異物志》 (通典、史記正義)？ d. 朱應《扶南記》 (本草綱目引蘇頌引)？]	
扶南土俗傳			⑪《扶南土俗傳》 (見《通典》) [《吳都賦》劉逵注 引有《扶南俗》， 疑為《扶南傳》之訛]	⑫康泰《扶南土俗》 (見《太平御覽》)

康泰《扶南傳》(或《外國傳》)輯錄一覽表

所標書名	出處	版本	卷數	條數	備註
《扶南傳》	《搜神記》	《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四引		1	
	《吳都賦》劉逵注	《文選》嘉靖刻本	五	2	
	《北堂書鈔》	光緒十四年孔廣陶校刊本	一四八、一五一	2	存疑
	《藝文類聚》	中華書局1965年版	二、八三	2	存疑
	《釋迦方志》	大正大藏經本	上	1	
	《法苑珠林》	道光七年常熟蔣氏刻本	三六	1	存疑
	《通典》	商務印書館1935年影印本	一九三	1	存疑
	《白孔六帖》	明嘉靖刊本	九九	1	存疑
	《北戶錄》	《叢書集成初編》本	三	2	存疑
	《太平御覽》	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	六九、三六九、 六四三、七一八	4	
			三七五、五五六、 七〇八、七一七、 七一九、八一一、 八一六、九六〇、 九七四、九八一	10	存疑
	《太平寰宇記》	乾隆五十八年紅杏山房刻本	一六四、一八三	2	一條存疑
	《通志》	商務印書館1935年影印本	一九六	1	存疑
	《文獻通考》	商務印書館1935年影印本	三三八	1	存疑
	《酒譜》	《說郛》卷六六引		1	存疑
	《說郛》	清宛委山堂刊本	七、六六	2	存疑
	《本草綱目》	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一四	1	存疑
	《讀史方輿記要》	中華書局1955年版	一二五	1	存疑
	《古海國遺書鈔》	《麓山精舍叢書》第二集		12	存疑
康泰 《扶南傳》	《水經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王國維校本	一	6	
	《古海國遺書鈔》	同前		3	
康泰 《扶南記》	《水經注》	同前	三六	1	
	《古海國遺書鈔》	同前		1	
《外國傳》	《北堂書鈔》	同前	一二一	1	
	《後漢書》李賢注引	中華書局1965年校注本	一一六	1	
	《史記索隱》	中華書局1959年校注本	一二三	1	
	《白孔六帖》	同前	九七	1	
	《太平御覽》	同前	三四一、七八六、 七八七、七九〇、 八九〇、九〇一	13	11條存疑
	《太平寰宇記》	同前	一八三	1	
	《事類賦》	宋紹興十六年刻本	六	1	
	《翻譯名義集》	光緒四年金陵刻經處刻本	三五	1	
《吳時外 國傳》	《北堂書鈔》	同前	一二五、一二九、 一三四、一三八、 一四四、一四六	8	
	《藝文類聚》	同前	八一、九一、九五	4	
	《法苑珠林》	同前	三六	3	
	《初學記》	中華書局1962年版	三〇	2	

所標書名	出處	版本	卷數	條數	備註
《吳時外國傳》	《太平御覽》	同前	目錄、三四一、三四五、三四七、六九六、六九九、七〇八、七六四、七六七、七六九、七七一、八一、八一六、八二〇、八六五、八九〇、九二四、九三八、九八一、九八二	22	
	《事類賦》	同前	一三	1	
	《政和證類本草》	《四部叢刊》本	三	1	
	《編珠》	抄本	三	1	
	《古海國遺書鈔》	同前		27	
《吳時外國志》	《藝文類聚》	同前	八七	1	
	《太平御覽》	同前	九七一、九七五	2	
《扶南記》	《藝文類聚》	同前	七六	1	存疑
	《圖經本草》	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輯復本	一六	1	存疑
	《太平廣記》	中華書局1961年版	四〇六	2	存疑
	《政和證類本草》	同前	二三	1	存疑
	《安南志略》	上海樂善堂刊本	一	1	存疑
	《閩書》	明崇禎刻本	一五〇	1	存疑
	《本草綱目》	同前	三一	1	引蘇頌所引朱應《扶南記》(存疑)
《外國雜傳》	《初學記》	同前	六	1	
康泰《外國傳》	《史記正義》	中華書局1959年校注本	一二三	1	
康氏《外國傳》	《史記正義》	同前	一二三	1	
《扶南土俗》	《吳都賦》注	同前	五	1	作《扶南俗》
	《說郛》	同前	六〇	12	
	《古今圖書集成》	上海圖書集成局光緒十年鉛印本	邊裔典一〇八	12	
《扶南土俗傳》	《通典》	同前	一八七、一八八	2	
	《太平御覽》	同前	七九一	1	
	《太平寰宇記》	同前	一七七、一七九	2	
	《通志》	同前	一九七、一九八	2	
	《文獻通考》	同前	三三〇、三三二	2	
	《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	萬曆刻本	八	1	
康泰《扶南土俗》	《太平御覽》	同前	書目、七八七、七九〇	14	
	《天下郡國利病書》	清抄本	一二〇	1	
	《古海國遺書鈔》	同前		17	
康泰《吳時外國傳》	《太平御覽》	同前	三五九	1	
《扶南日南傳》	《太平御覽》	同前	一一	1	存疑

*共231條(包括重複)，其中存疑59條

註釋

- ① 當時記述扶南史事的載籍有康泰《扶南傳》、朱應《扶南異物志》、萬震《南州異物志》等，唯均散佚失存，賴後世著作及唐、宋類書輯錄少數條文，詳見後面之考證。另晉左思所撰《三都賦·吳都賦》也提及扶南，但寫作“夫南”，謂“烏游、狼瞫、夫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同時代的劉劭為之作注，曾引《異物志》曰：“夫南特有才巧，不與眾夷同”（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載伯希和《扶南考》，引此文作“持有才巧”，誤，見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96頁）。《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引《異物志》曰：“金鄰，一名金陳，去扶南可二千餘里”。此《異物志》究係何時何人所作，向有歧見。或作後漢議郎楊孚《異物志》，或作三國吳萬震的《南州異物志》等。以此，則“扶南”一名是否出現於東漢時，尚無確證，未可定論。關於扶南的史料，可參見陳顯泗等編《中國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陸峻嶺等編《中國古籍中有關柬埔寨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
- ② 過去轉換公元年份時，都將此番來貢標成243年，其實這一年夏曆魏正始四年十二月初三已是公曆243年12月31日，而吳的紀日期間又比魏晚了一天，故除非范旆遣使來吳適值初一、初二這兩天，一般應改為公元244年，至少也得改成243-244年。參見拙文《朱應、康泰出使扶南和《吳時外國傳》考略》，載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年第4期。
- ③ 艾莫涅(E. Aymonier)的《扶南考》(Le Founan)載於《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 1903, 1-2)，另刊《國聞譯證》第一冊。伯希和(P. Pelliot)的同名論文則刊於《法國遠東學院通報》(BEFEO, 1903, III)，譯文見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關於“扶南”一名之來源，艾莫涅認為是純按漢語的意思而起名，有“扶我南邦”之義。但伯希和則舉左思《三都賦》的“夫南”，及後來唐代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的“跋南國，舊云扶南”為例，認為“此種名稱之殊異，似因譯寫方法之不同，然不幸史萊格(Schlegel)還原之P'o-nam與巴克(Parker)還原之Phnom(-penh)皆不類似耳。”不過不少學者同意扶南即高棉族古語bnam、現代語 phnom 的譯音，義為山嶽，該國王號為kuring bnam，譯為山帝或山嶽之王。今柬埔寨首都金邊(Phnom-Penh)之名亦與此有關。參見D.G.E. Hall (霍爾)：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史)，MacMillan & Co Ltd., London, Fourth Edition 1981, pp. 24-25。該書第一版印於1955年，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曾據1968年第三版譯成中文，由商務印書館於1982年出版，參見中譯本第47頁。關於扶南及其與中國的關係，尚可參見：駒井義明《孫權遣使南方考》，載《歷史と地理》25-6，1929年；H.G. Wales (僑陳如王扶南考)，姚楠譯註，《東方雜誌》39-1，1943年3月；駒井義明《扶南(カンボジア)の開國》，《京都外國語大學研究論叢》三；趙令揚《中國與扶南關係研究》，載《香港大學歷史學會年刊》，1961年3月；簡齋《扶南王國的興建》，《南洋文摘》2-9，1961年9月；許雲樵《南洋史》上卷，星洲世界書局1961年出版；陳序經《扶南的地理條件及對外貿易》，《學術研究(廣東)》1962年6月；陳序經《扶南史初探》，1963年前，載《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山本達郎《古代的南海交通と扶南の文化》，《古代史講座》13，1966年10月；陳玉龍《佛教史上的佳話——記六世紀時四位扶南高僧到我國傳經弘法業績》，《史學月刊》1980-1；余思偉《扶南王國與古代中國的關係》，《東南亞研究資料》1981-4；石澤良昭《古代カンボジア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82年2月；周中堅《扶南——古代東西方的海上橋梁》，《學術論壇》1982-3，5月；陳連慶《中國古代史研究》下冊，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 ④ 伯希和《扶南考》引：“《圖書集成·食貨典》卷三三四引《吳曆》云，‘黃武四年(二二五)，扶南諸外國來獻琉璃。’上文並見《太平御覽》卷八〇八引《吳曆》曰，‘黃龍扶南諸外國來獻琉璃。’”按，黃龍年間為公元229-231年，此兩段引文內容大同而年代有異，但《古今圖書集成》比《太平御覽》晚出。近人趙令揚《中國與扶南關係研究》一文(載《香港大學歷史學會年刊》，1961年3月)另載錄《藝文類聚》卷八四引《吳曆》之記載：“黃武四年(公元二二五年)，扶南諸外國來獻琉璃。”此當《古今圖書集成》所本，比《太平御覽》早，較為可靠。查《吳曆》一書，《隋書·經籍志》不載，而新舊《唐書》藝文、經籍志均有著錄，標為胡沖撰、六卷。胡沖乃孫權時重臣胡綜之子，天紀中(227-280)出任吳末代中書令，裴松之注《三國志》引《吳錄》說他“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吳曆》大概是沖入晉時所撰。他們父子二人在東吳均位居顯職，掌管機要，“凡自權統事，諸文詔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赤烏六年卒，子沖嗣”(《三國志》卷六二)。由裴松之注《三國志》常引《吳曆》，可見其價值，乃信史也。故《吳曆》所載黃武四年(二二五)之入貢，應屬扶南最早遣使來華之記錄。
- ⑤ 伯希和先於《扶南考》提出此說：“《梁書》所載‘其一使臣即有宣化從事之官號，又可證其使即為呂岱所遣，而遣使之年，應位置於二二五至二三〇年之間，呂岱為交廣刺史之時也’，後改為245-250年說，詳見下。L.P. Briggs 在《The Ancient Khmer Empire》一書(Philadelphia, 1951)中，把范旆赤烏六年遣使入貢當成扶南首次派使者來華，又以康泰等為呂岱所派，故認為朱應、康泰回國後扶南即遣使回訪。趙令揚上引文已指出其誤。

- ⑥ 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云：“朱應、康泰之通海南，當受岱命。岱平交州、九真，遣使外國，在黃武六年左右，康泰書之成，似在斯時。即公元二二七年左右也。《吳書·吳主傳》又稱赤烏六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旌遣使獻樂人及方物。今按《梁書·扶南傳》謂范旌為前王范蔓之子所殺。旌部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康泰、朱應使扶南，正尋在位之時。《吳書》卻云在黃武六年後十六年范旌尚遣使貢獻，不知此時旌死已二十年矣。此必《吳書》之誤也。”（原載《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六號，1930年11月；後被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67-568頁）。
- ⑦ 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云“案交州之平在黃武五年（二二六），孫權召岱還時在黃龍三年（二三一），則遣從事南宣國化之時應在此六年間。……康泰等至扶南時所見扶南王，應是范尋以前諸王，尤應是范旌；前引赤烏六年（二四三）范旌遣使入貢之文，即其一證。……然《梁書》卷五四《扶南傳》云：‘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康泰等至扶南，又似在范尋在位時，然則其奉使在外有一二十年矣。”（商務印書館1937年出版，第13-14頁）許雲樵大致同意此說，其《南洋史》上冊云：“余以為康泰等之奉使，不得遲於二三年也。此行歷國眾多，為時甚久，故於二四五年，頃得晤陳末於扶南，而問天竺土俗焉。”（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1961年出版，第76頁）後又於《康泰吳時外國傳轉注》一書的引言中指出：“尋在位時，康泰等尚在扶南，則其南宣國化之時間頗長，自二二一—二四三，至少在十五年以上，故姚思廉謂其所經及傳聞達百數十國之多。”（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71年出版）周中堅《扶南在古代中印關係中的地位》一文中贊成226-231年間之說，但未詳列理由，見《福建論壇（文哲版）》1984年5期。陳連慶在《孫吳時期朱應、康泰的扶南之行》一文中也認為“朱應、康泰的出使，在吳將呂岱平定交州土民叛亂之後”，而且確定“具體時間當在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亦未提出證據來證明此結論（原載《東北師大學報》1986年4期，後收入《中國古代史研究》下冊，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678頁）。
- ⑧ 方詩銘《朱應康泰行紀研究》云：“朱應康泰之出使，由前所引吳志呂岱傳之文觀之，當有為岱遣出之可能。……范旌在位時，應泰二人已在扶南，至范尋其間蓋已三十餘年，出使在外者當不能若是之長久（如張騫在外屢遭困厄亦僅十三年），則應泰之出使固不僅一次，明白可知矣。康泰所記有扶南土俗、扶南傳、吳時外國傳三書，則其出使或為三次，初次在孫權時，末次在孫皓時，二次則在其間。吳時外國傳之成當已在晉世，否則不得稱吳時也。”（載《東方雜誌》第四十二卷第四號，1946年2月）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冊亦認為有兩次出使之可能：“似二人出使扶南，係范尋在位時，或為第二次出使；若范旌在位時，即已出使，直至范尋時而仍奉使在外，則為使將有一二十年之久，或不可能。”（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53年出版，第223-224頁）陳正祥在《真臘風土記研究》一書中同樣認為此事“可能的解釋是……朱應和康泰的出使扶南不止一次，第一次為呂岱就近派遣”（見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版，第12頁）。
- ⑨ 伯希和在《扶南考》附錄一云：“此稿甫經付印，即須改正。比閱沙畹君近譯《宋雲行紀》之文，附註有二三二年扶南入貢中國一事。……則余前此主張康泰朱應為呂岱鎮交州時（二二五年至二三〇年）所派之說，已不能主張。應將此著名之奉使位置於二四五至二五〇年之間，同時應將蘇物之使印度時代，推至二四〇至二四五之間”。岑仲勉意見大同，謂“泰、應南行，實當尋代（見《梁書》），故下文引康泰《扶南傳》有昔范旌時之語，但尋至晉武太康中（二八〇—二八九）尚遣使貢獻（見《梁書》、《齊書》亦謂尋是吳晉時），上距黃武之末（二二八），已五十三年，御宇六十，前王所希，由是推之，泰之奉使，總在黃武五年（二二六）之後，尤以孫權末年為近是也”（《水經注卷一箋校》，原刊《聖心》第二期，1933年廣州印行；後收入《中外史地考證》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第214-215頁）。陳序經的《扶南史初探》贊同伯希和後來的主張：“朱應與康泰之出使扶南，應該是在范旌死後不久與范尋就位不久的時候。……孫權死於252年，朱應、康泰既為孫權所遣派，這事不會在252年之後，應該是在范旌遣使入貢之後不久，這就是約在245年左右。假使朱應、康泰之在扶南是245至250年間，那麼范旌在位應該是約從230至248年之間。伯希和雖然沒有把范旌在位的時期說得清楚，但他最後的主張大致是可取的。”（見上引《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上卷，第632-633頁）主張此說的學術論著尚有D.G.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Fourth Edition, 1981, p.27（另見第三版之中譯本，第50頁）；前引王廣武《南海貿易》第三章《出使扶南》，見《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第47-48頁；前引趙令揚《中國與扶南關係研究》註十三；前引拙文《朱應、康泰出使扶南和《吳時外國傳》考略》；余思偉《扶南古國初探》，載《世界歷史》1981年1期；陳顯泗、詹方瑤《扶南古史雜考》，收入《中國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92-296頁；趙和曼《吳時外國傳》考釋，收同上書第318頁；渡部武《朱應、康泰的扶南見聞錄輯本稿——三國吳の遣カニホシア使節の記録の復原》，載《東海大學紀要（文學部）》43期（1985年10月）；陳玉龍《中國和越南、柬埔寨、老撾文化交流》，載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707頁。
- ⑩ 此一結論係據《南齊書》、《梁書》記載推算，前者成書於梁，後者成書於唐，二者的敘述並不矛盾。《南齊書·東南夷傳》云：“（范師）蔓病，姊子旌篡立殺蔓子金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旌，……旌大將

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為王，是吳、晉時也。《梁書·海南諸國傳》云：“婁婁子旃，時為二千人將，因婁婁自立，遣人許金生而殺之。婁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按常識，乳下兒長至“二十”約十七至十九年之久，與“十餘年”可合。因范旃於244年遣使入貢，可斷其執政不可能早於225年。

- ⑪ 能夠證明康泰、朱應“使於尋國”的，不僅是《梁書》的記載，尚有康泰等人自身的記傳。《水經注》卷一引《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暹楊國人翔翬，嘗從其本國到天竺，輾轉流賣，至扶南，為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賁積。山川饒沃，恣其所欲，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回。翔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驗。及行，四年方返。以為天地之中也。”由“昔范旃時”之語氣，可見康泰在扶南時，范旃已不在位。而在唐、宋類書中所引康泰著作，明確提到范尋的有數條，如《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范尋以鐵為門雞假距，與諸將賭戲”（《藝文類聚》卷九一，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585頁；另見《初學記》卷三〇，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729頁），《吳時外國傳》曰：鱷魚大者長二丈三寸，有四足，似守宮，常吞食人。扶南王范尋教捕，取置溝塹中”（《太平御覽》卷九三二，見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又《搜神記》云：“《扶南傳》云：扶南王范尋常養虎五六頭，養鱷魚十數頭，若有犯罪者，與虎不噬，與鱷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四梧州條引，乾隆五十八年刻本）。上述證據，足以廓清康泰等在范尋時出使問題上的疑雲。
- ⑫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I, Paris 1959, p.512.
- ⑬ 既然康泰等“使於尋國”，如果不推翻《吳志·孫權傳》關於范旃赤烏六年來貢的記載，就只能設想他們長期在外或多次出使，否則即非呂岱所派。但如推翻《吳志》記載，堅持康泰等為呂岱所遣，則又難以解釋范尋在吳、晉時執政，及太康間(280-289年)遣使來獻等記載；因為那樣一來，范尋執政將長達五十餘載，這在歷史上比較罕見。
- ⑭ 《後漢書》卷三七《百官志》云，當時州設從事史十二人，包括都官從事、功曹從事、別駕從事、簿曹從事、兵曹從事、部郡國從事等，“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北堂書鈔》引應劭《漢官儀》云，“元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部從事秩皆百石，同諸郡從事”（見陳祚龍編《漢官七種通檢》，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1962年出版）。三國時雖另有議曹從事、諸曹從事、五業從事、祭酒從事、文學從事、勸學從事、典學從事、武猛從事、督軍從事、宣化從事諸目，例皆州分職吏名。參見清黃本驥撰《職官表》，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衛文選編《中國古代官制簡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張正烺主編《中國古代職官大辭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俞慶年編《中國官制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 ⑮ 《三國志·吳志·士燮傳》載：“呂岱被詔誅徵，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遇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徵，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士匡被署為師友從事，不見《呂岱傳》所載，看來當時部分從事之名目並無嚴格的規定，往往因使命或關係而隨時命名。
- ⑯ 中郎通常掌宿衛宮禁，或侍從皇帝左右。《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云，“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後漢書》卷三五《百官志》所列的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下轄之中郎，均“比六百石”。中郎將（秩比二千石）有時也被簡稱中郎，但通常“中郎”應指中郎將之下的屬史。不過即使秩比六百石的中郎，其地位也高過百石的從事。日本渡部武《朱應、康泰的扶南見聞錄輯本稿》也指出從事為刺史之屬僚，中郎屬中央的一種郎官，不可能同為呂岱所派，原載《東海大學紀要（文學部）》四三輯，見論說資料保存會《中國關係論說資料》27號（1985年）第三分冊上，第383頁。
- ⑰ 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卷三·地志類云：“按《南史》稱朱應經過傳聞百數十國，因立紀傳，而《隋志》獨載此書者，意他卷盡亡而此卷應存也。又《梁書·劉劭傳》稱長頭是毗羣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疑即此書，然無確證。”
- ⑱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地理云：“《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唐志》同，作朱應。《通典》邊防門注，大宛馬解人語知音舞，大月氏牛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史記·大宛傳》正義：……並稱宋鷹《異物志》，省扶南二字，朱作宋，應作鷹，未知孰是。”
- ⑲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I, Paris 1959, p.512.
- ⑳ 《水經注疏》卷一，科學出版社1955年影印出版。
- ㉑ 見上引向達《漢唐間西域及南海諸國古地理書敘錄》。不過無論是應《志》或宋鷹《異物志》、朱建安《扶南以南記》，均未有確切證明，可以等同於朱應《扶南異物志》。筆者昔翻閱李時珍《本草綱目》時，曾見卷三一載：“荔枝：（釋名）離枝（《綱目》）丹荔（頌曰：按朱應《扶南記》云，此木結實時，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必以刀斧割取其枝，故以為名。）”先覺大喜，轉念明人之作豈可盡據，後見《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二二引《圖經》此段，只作“《扶南記》云……”，故《本草綱目》所轉引未必可靠。但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的蘇頌《圖經本草》輯復本亦如《本草綱目》所載，恐亦輾轉相引故也。

- 22 陳運溶輯包括康泰《吳時外國傳》一卷(七日二十七則)、《扶南土俗傳》一卷(十七日)、《扶南傳》(五日十二則)、《交州以南外國傳》一卷(七日)，共三十六日、六十三則。但後兩種作者無法確定。另前引駒井義明《孫權遣使南方考》一文之考證，主要局限於《說郛》卷六十的十二條(輯自《太平御覽》卷七八七的《扶南土俗》)。
- 23 載《史學雜誌》一卷一期，1929年3月。筆者亦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見過盧鶴松女士的《康泰吳時外國傳輯本》(稿本)，所集未超過向氏。
- 24 許著於1971年3月由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印行，列為該所輯佚叢刊之二。其中有些條文是否康泰之作，仍值研究。
- 25 見《東海大學紀要(文學部)》43期(1985年10月)所刊之〈朱應、康泰の扶南見聞錄輯本稿——吳の遣力ンボシア使節の記録の復原〉。該文末註“1971年1月10日稿，1982年8月19日改稿”。全文共輯康泰撰《吳時外國傳》、康泰撰《扶南土俗》、康泰撰《扶南傳》、闕名撰《扶南傳》、竺枝(芝)撰《扶南記》五種的八十四條。其中許多顯非康泰之作。該文發表時，作者不僅未見過許雲樵之輯注書，似亦未見過向達之輯佚書。

第四章

法顯西行與南海交通

繼康泰、朱應出使扶南之後，魏晉南北朝南海交通的另一重大事件就是法顯西行求經，並循海路東航回國。在中西交通史上，法顯是第一個訪問印度及斯里蘭卡並留下完整行紀——《佛國記》（又作《法顯傳》）的中國人。法顯之行先循陸路西行，然後搭船東歸，其旅程恰好包含了自西漢以降中西交通陸、海兩路的主要幹線。過去中國雖有經由南海遠航西方的記載，但從未留下航行者真實姓名，更遑論有關航程的記錄了。而法顯西行最難能可貴的，乃返國後詳記其經歷，並保存至今，從而留下古代南海航行者的最早實錄。

一 法顯西行求經的大略經過

佛教自兩漢之際由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後，很快就在神州大地傳播開來，並推動了中西僧人的相互往來。到了東晉時期，乃有高僧法顯西行求經之壯舉。關於法顯西行之歷程，有他自己返國後所撰的記錄可作憑證。至於法顯本人的生平，則可見於一些佛教典籍，包括梁僧祐的《出三藏記集》、梁慧皎的《高僧傳》、隋費長房之《歷代三寶記》^①。茲據上述之書，略介法顯西遊之經過。

法顯，約生於東晉咸康八年（公元342年）^②，俗姓龔，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人^③，三歲即度為沙彌，二十受大戒。當時漢地雖有一些佛經流傳，唯戒律卻極缺乏，法顯在近花甲之齡，“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與同學數人發自長安，至天竺尋求戒律^④。他們沿著河西走廊而西遊，連同法顯先後結伴者共十一人^⑤，但後來其同伴或分途、或逝世、或留下，法顯只好單獨一人返回中土。

隆安四年（400年）秋，法顯等出陽關後就進入沙漠地帶。據《佛國

記》所載，沙漠中“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行十多日才到達鄯善。本來漢以後通過西域的有南、北數道，法顯的路線是兼取南、北兩道而行。他們由鄯善北上焉夷（即焉耆）、龜茲，然後又西南行穿越今塔克拉馬干大沙漠，折向于闐。此種行程實為前所罕見，其間“路中無居民，沙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不久，法顯等由于闐繼續西行，越過“冬夏有雪”的蔥嶺而入北天竺境之陀歷（今巴基斯坦北端的達利爾 Darel）。據法顯所記，“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嶮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⑥，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足見其途程之險峻。後來唐道宣《釋迦方志》提到中印交通有所謂“陀歷道”，即法顯等人所創闢。

法顯等進入天竺之境後，首先巡歷北、西天竺，經陀歷、烏菟（Uddiyana，在今印度河上游及斯瓦特Swat地區）、犍陀衛（Gandhavat，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Peshawar東北）、那揭（Nagarahala，在今阿富汗東北）、跋那（Varnu，今巴基斯坦北部的邦努Bannu）等國^⑦，再南下中天竺境。

在中天竺，法顯遍訪佛教遺跡，親至佛陀聖地頂禮膜拜。其中包括：佛陀故國迦維羅衛（Kapilavastu）及其誕生處論民園（Lumbini）；佛陀苦行成道處伽耶（Gaya）；佛陀初轉法輪處波羅捺（Varanasi）的仙人鹿野苑精舍；佛陀講授過經典的靈鷲山（Grdhrakuta）；佛陀的長住說法處——舍衛城（Sravasti）南的祇洹精舍（Jetavana），及王舍城（Rajagriha）附近的竹林精舍（Venuvana）；佛陀涅槃處拘夷那揭（Kusinagra）。^⑧

法顯在古代印度著名的佛教大國摩揭陀國（Magadha）停留較長的時間，於華氏城即巴連弗邑（Pataliputra）住了三年，約當義熙元年至

三年(公元405-407年)。時恰值笈多(Gupta)王朝旃陀羅笈多二世(Chandragupta II, 385-413)的黃金時代，據法顯所載，“巴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唯此國城邑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他的記錄，成了瞭解這一時期印度歷史的重要資料。故後世撰寫印度史者，如馬宗達的《古代印度》、牛津《印度史》等，無有不提及法顯之行記⁹。

法顯所以在摩揭陀國居留較長的歲月，雖然是為了參訪佛跡，但最重要的還是想訪求、苦修佛教梵典。據他自己所云，“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此時他年近七旬，因“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

大約義熙四年(公元408年)，法顯由巴連弗邑順恆水東下經瞻波國(Campa，在今印度比哈爾邦之東)，到多摩梨帝國(Tamralipti，在今印度西孟加拉的塔姆盧克 Tamuluk)¹⁰，於此住二年，寫經及畫像。這是他在天竺停留的最後一個地方。

約義熙五年(公元409年)初冬，法顯乘印度東岸自東北而南的信風與海流，載商人大舶而離開多摩梨帝，經晝夜十四日抵達師子國。法顯不僅在《佛國記》首次記載了印度洋的信風，而且首用“師子”一名來稱呼今斯里蘭卡。據後來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今斯里蘭卡被稱為僧加羅(Simhala)，此乃音譯，其義即獅子(亦即師子)。其國名之由來，乃出自古代南亞的神話傳說¹¹。而法顯就成了歷史上確載的第一個抵達斯里蘭卡的中國學者，從而保存了該國較早而又比較詳盡的記載。

法顯又在師子國住了兩年，到處訪經修法，然後又乘信風搭舶東航，經過近年的飄泊，終於在義熙八年(公元412年)七月，於東晉青州長廣郡界的牢山南岸登陸，回到闊別十餘載的故國。關於法顯東歸的航程及其意義，將於本章第三節另加詳述。

二 《法顯傳》及其研究

漢晉間，中國西遊求經者不少。朱士行早已作西行之嘗試，然僅抵于闐而返。許多僧人雖亦到達天竺，唯或死或留，只有法顯才是中國親赴佛教聖地求法、攜經返回中土並留下完整行紀的第一人。故為其行紀作跋者謂，“感歎斯人，以為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

法顯返國後，於義熙十年（公元414年）寫下了自己的行紀——《法顯傳》（或《佛國記》）。這是現存最早而又比較完整的中外交通名著。全書約萬字，以洗煉之語言敘述了自己往返印度的艱苦經歷與航程。該書記載了法顯所歷三十餘國之道路、山川、形勢、氣候、物產、宗教、寺廟、古蹟、典章、風土、人情，保留了古代西域以及印度、斯里蘭卡等國的珍貴史料，是為研究佛教、中西交通以及古代中亞、南亞各國歷史的不可多得之實錄。

自東晉以降，《法顯傳》一直不斷地被引載或鈔刻，並為諸家書目所著錄，但其書名則頗有歧異。法顯行紀的重要異名包括《佛遊天竺記》、《法顯傳》、《歷遊天竺記傳》、《佛國記》等。茲據岑仲勉、章巽等校註家之說^⑫，並益以己見，將《法顯傳》的名稱及版本整理如下：

《法顯傳》名稱及版本

（一）《佛遊天竺記》

《佛遊天竺記》一卷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

（隋法經等《眾經目錄》卷六·西域聖賢傳記：

“西域聖賢所載”）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三：“見《僧祐錄》”，

“闕本”）

(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五：“見《僧祐錄》”，“闕本”)

(清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卷五·釋家類)

《佛遊天竺記》

(唐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集》卷中《梁荊州優填王栴像緣二十八》)

(唐歐陽詢等《藝文類聚》卷七六：闕名《像記》)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六五七：闕名《像記》)

《佛遊天竺本記》

(唐徐堅等《初學記》卷二十三)

(二)《法顯傳》

《法顯傳》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一、二)

(明晁瑬《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下·佛藏)

《釋法顯行傳》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十六)

《法顯傳》一卷

(隋法經等《眾經目錄》卷六·此方諸德傳記：“法顯自述行記”)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三、十七、二十：“亦云《歷遊天竺記傳》”)

(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二十三、二十七、三十：“亦云《歷遊天竺記傳》”)

(宋王堯臣《崇文總目》卷四·釋家類)

(《宋史》卷二百五·藝文志子類下·道家類附釋氏類)

(北宋崇寧三年雕刻《福州東禪寺崇寧萬壽大藏經》本)

(南宋紹興十八年雕刻《福州開元禪寺毗盧大藏經》本)

(南宋紹興間始雕《湖州思溪圓覺禪院大藏經》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

(南宋嘉熙三年雕刻《湖洲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本)

(宋元之際雕刻《平江磧砂延聖院大藏經》本)

(日本長寬二年《石山寺一切經》古鈔本)

(日本鎌倉初期古鈔本)

(日本京都南禪寺藏應永七年古鈔本)

《法顯傳》二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史部雜傳類)

(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五·釋家)

(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十·雜傳類)

(清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卷三·釋家類)

《法顯行傳》一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史部雜傳類)

(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十·雜傳類)

(清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卷三·釋家類)

《法顯行傳》三卷

(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五·釋家)

《昔道人法顯從長安行西至天竺傳》一卷

(金皇統八年始刻《趙城廣勝寺大藏經》本)

《高僧法顯傳》一卷

(金麗高宗三十三年雕刻《高麗國大藏經》本)

(三)《歷遊天竺記傳》

《歷遊天竺記傳》一卷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七)

(唐道世《法苑珠林·傳記篇》：“右東晉平陽沙門釋法顯撰”)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三：“亦云《法顯傳》，法顯自撰，述往來天竺事，見《長房錄》)

(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五：“亦云《法顯傳》，法顯自撰，述往來天竺事，見《長房錄》)

《歷遊天竺記傳》

(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三：“一云《法顯傳》”)

(支那內學院1932年刻本)

《歷遊天竺記》一卷

(清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附錄》存疑類·史部)

《清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卷二·地理類)

《遊天竺記》

(清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地理)

(清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卷三·地志類)

(吳士鑑《補晉書經籍志》卷二·地理類)

(四)《佛國記》

《佛國記》一卷

(《隋書》卷三三經籍志·史部地理類：“沙門釋法顯撰”)

(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四·地理)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三·地里)

- (明徐燭《徐氏紅雨樓書目》卷三·釋類)
(明萬曆沈士龍輯《秘冊彙函》本)
(明毛晉輯《津逮秘書》本第十集)
(明鍾人傑等輯《唐宋叢書》本·別史)
(明陶珽校《說郛》宛委山堂本)
(明佚名輯《五朝小說》本·魏晉小說外乘家)
(清《四庫全書總目》卷七一史部·地理類四)
(清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本·載籍)
(清張海鵬輯《學津討原》本第七集)
(清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六·地理)
(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十一·地理類)
(清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附錄》存疑類·史部)
(清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卷三·地志類)
(清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卷二·地理類)
(吳士鑑《補晉書經籍志》卷二·地理類)
(鄭國勳輯《龍谿精舍叢書》本·史部)
(民國十五年《五朝小說大觀》本·魏晉小說外乘家)
(《中國叢書綜錄》史部地理類·中外雜記之屬)

(五) 其他名稱

《釋法顯遊天竺記》

(唐李賢《後漢書·西域傳》注)

《天竺國記》

(唐李賢《後漢書·西域傳》注)

《釋法明【國諱改焉】遊天竺記》

(唐杜佑《通典》卷一七四)

《法明遊天竺記》

(唐杜佑《通典》卷一九一)

《法顯記》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六五三、六五七)

(張宗祥據明鈔本輯印《說郛》卷四)

《三十國記》二類

(明萬曆黃昌齡輯《稗乘》本)

《神僧傳》一卷

(明冰華居士輯《合刻三志》本·志奇類)

(明陶珽校《說郛》宛委山堂本)

(明佚名輯《五朝小說》本·魏晉小說雜傳家)

(民國十五年《五朝小說大觀》本·魏晉小說雜傳家)

(《中國叢書綜錄》史部傳記類·釋道)

《神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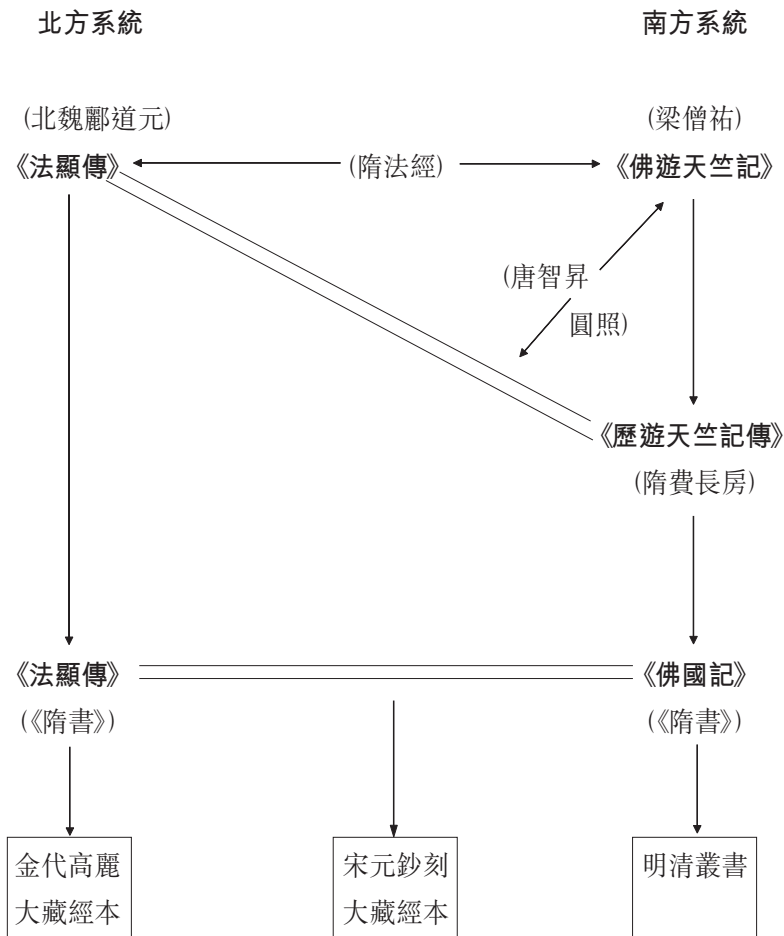
(吳曾祺輯《舊小說》本·甲集)

(《中國叢書綜錄》史部傳記類·釋道)

由上引資料可見，最早載錄法顯行紀的乃梁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名作《佛遊天竺記》¹⁸，此或該書最早之南方流行名稱，後來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乃改之為《歷遊天竺記傳》。由僧祐至費長房均僅載一名，而未及其餘。同時，北方流行的名稱是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引錄的《法顯傳》。但隋法經等的《眾經目錄》並載《佛遊天竺記》、《法顯傳》二名而未加辨別，反而一標“西域聖賢所撰”，一標“法顯自述行記”。至唐智昇、圓照等書，一方面辨明《法顯傳》即《歷遊天竺記傳》，唯對《佛遊天竺記》仍以“闕本”無法辨別而同時保留其名。於是後世對法顯行紀名稱異同之歧說遂萌生矣。

茲更列一表，略示該書名稱、版本演變之關係：

《法顯傳》名稱及版本演變示意表



由於法顯歷程之重要，近代以來《法顯傳》一向受到中外學術界的注視。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該書即先後被譯成法、英、日等多種文字，校註、研究者不乏其人。中外翻譯、校註《法顯傳》比較重要的有^⑭：

- (1) 法國人 Abel Rémusat,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hiques: Voy-*

- age dans la Tartarie, dans l' Afghanistan et dans l' Inde, exécuté, à la fin du IV Siècle. Ouvrage Postume revu, complété, augmenté d'éclaircissements nouveaux par Klaproth et Landresse. (Paris, 1836)
- (2) 英國人Samuel Beal, *Travels of Fah-hian and Sung-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400 A.D. and 518 A.D.)*, London, 1869.
- (3) 英國人Herbert A. Giles,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Shanghai, 1877. (另, *The Travels of Fa-hsien (399-414 A.D.)*,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Cambridge, 1923.)
- (4) 英國人James Legge,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 Oxford, 1886.
- (5) 丁謙：〈晉釋法顯《佛國記》地理考證〉，《地學雜誌》6-12，1915年，另載《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
- (6) 岑仲勉：《佛遊天竺記考釋》，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 (7) 日本人足立喜六：《考證法顯傳》，東京，1935年出版。(商務印書館1937年出版何健民等之譯本，另作者1940年以《法顯傳——中亞、印度、南海紀行の研究》修訂再版。
- (8) 賀昌群：《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9) 日本長澤和俊：《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本法顯傳校注》，刊《鹿兒島短期大學研究紀要》6號，1970年〔作者另有《法顯傳·宋雲行紀(譯註)》，平凡社1971年〕。
- (10) 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除此之外，歷來有關法顯及其行紀研究、考證的論著甚多，散見於各種圖書雜誌中，亦不能一一加以評論，僅於註釋中略舉其名及出處，以饗同好^⑬。

三 法顯東航對南海交通之意義

《法顯傳》對於中外交通及佛教傳播的意義，前面已略加概述。其實法顯西行求經及其行紀的一個重大的影響，乃在於保留了由印度洋經南海東航返國的真實記錄。

法顯東航對南海交通的意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當時印度洋——南海的信風、水文情況及航海船舶作了記述；二是載明了由師子國經耶婆提返中土的航程。

首先，《法顯傳》較早記載了印度洋的季候風(亦即信風)及航海者利用它行船的認識。其中有從印度東南岸至師子國及離師子國東航的兩段：

“法顯住此(指多摩梨帝)二年寫經及畫像。於是載商人大船，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

“法顯住此國(指師子)二年，……即載商人大船，上有二百餘人，後繫一小船，海行艱嶮，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

由於當時航海者已掌握了季風規律，故以搭載二百人左右的船舶即可跨越印度洋向東直航，這表明五世紀時遠洋海船的製造技術較之前期已大大提高。而且從法顯記載還可推算出所乘船舶的航行速度。如從恆河口到師子國，海程為1245浬，合2206公里，其船行十四日，平均航速為每日158公里。

其次，《法顯傳》親述了目擊的古代斯里蘭卡到中國航線行程，包括印度洋——南海的水文氣象、日月星宿導航以及途經的島嶼。茲錄

引全文如下：

法顯離開師子國，“即載商人大船，上有二百餘人。後繫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來多，即斫絙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小漏，即取龐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君罍及澡罐併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眾僧：‘我遠行求法，願威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

海中多有抄賊，遇輒無全。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為逐風去，亦無準。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鼃、鼃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

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

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賫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

一月餘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眾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為一人令我等危險。’法顯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併下我！不爾，便當殺我！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

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

于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爾今已過期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藁藿依然，知是漢地。”

上述記載雖頗生動、形象，唯因地名不夠明確，地理位置未詳，故引起了學者的諸多爭論，眾說紛紜。例如：(1) 離師子國約十五天所到的島在何處？(2) 離此島九十天所到的耶婆提在何處？(3) 由此島到耶婆提所經，為馬六甲海峽或巽他海峽？

關於離師子國十五日後所到的一島，Samuel Beal書認為缺乏足夠資料可以確定其位置，大約在蘇門答臘島的北岸外，James Legge及 H.A.Giles則未作考訂。足立喜六認為可能是今尼科巴群島(Nicobar Is.)中的一島¹⁶。

可是有關耶婆提的今地，諸家考證結論則大相逕庭，其差距不啻十萬八千里，實不可以道里計。總括而言，耶婆提的位置約有下列六種不同說法：

(一) 爪哇說：

英人Samuel Beal 譯註《法顯傳》時，在“Yo-po-ti”後括註為 (Java)，認為耶婆提是梵文 Yavadwipa 的中文譯名，指Yava 之地。而James Legge及 H.A.Giles 等在譯文中將耶婆提逕稱為Java-dwipa 或 Java。此外，格倫維爾特、伯希和、費瑯、沙畹、張星娘、馮承鈞、李長傅、賀昌群、長澤和俊等，亦主此說¹⁷。

(二) 爪哇或蘇門答臘說：

費瑯等以為古代之Yavadwipa 或兼指爪哇、蘇門答臘。岑仲勉認為耶

婆提“究為今爪哇抑蘇門答刺，一時尚難定矣”，馮承鈞也認為“昔耶婆提，今爪哇或蘇門答刺”¹⁸。

(三) 蘇門答臘說：

費瑯在《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同意耶婆提在爪哇，但其《蘇門答刺古國考》則力主為蘇門答臘島。足立喜六、湯用彤、王新民、韓振華、陳序經、蘇繼庠、章巽等亦主此說¹⁹。

(四) 馬來亞說：

荷蘭人J.L.Moens主張耶婆提應在馬來半島之吉達(Kedah)，張禮千同意其說²⁰。

(五) 婆羅洲說：

丁謙《晉釋法顯《佛國記》地理考證》即主此說。英人 R.Braddell 更對此詳加論證²¹。

(六) 美洲說：

也有的學者主張耶婆提在澳洲²²乃至美洲。美洲說原為法國學者所倡，章太炎於本世紀初以《法顯發現西半球說》加以引述，主張耶婆提即南美洲的耶科陀爾(或譯厄瓜多爾)。後達鑑三、連雲山等均有論著引申其說²³。

鑑於《法顯傳》中有關耶婆提前後航程涉及的地名完全欠缺，僅憑一孤單的譯名實難有考定的結論。不過，較多的學者傾向於以耶婆提為Yava-dvipa的省譯，主張其地不出爪哇及蘇門答臘。非議此說者則認為由斯里蘭卡至爪哇一帶實無需三個多月之久，並有美洲等說之出現。唯大海漫漫，航行無常，難以今日之科學水準來嚴格求證於古代航程之記錄。依敝人愚見，澳洲、美洲等說證據頗缺，比較脫離古代的航海水平。據《法顯傳》載，法顯在耶婆提停了五個月，又另搭一載有三百多人的商人大船“東北行，趣廣州”，商人且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以航向及當時航海水平言，耶婆提似在蘇門答臘島東部為宜。

至於法顯經由哪一海峽到達耶婆提，James Legge 及 H.A.Giles 譯著所附地圖均標於巽他海峽，足立喜六、賀昌群、章巽諸家及《中國大百科全書》“法顯”條（張廣達撰文）均同。但長澤和俊則主張經由馬六甲海峽，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亦標於馬六甲海峽^①。鄙意馬六甲海峽之航線自西漢以來，早已創闢，沿途港口較多，若法顯東航返國經此，不應似其行紀所寫如是之漂泊；故以經巽他海峽之可能較大，由此也無妨於將耶婆提比定在蘇門答臘島一帶。

總之，即使耶婆提未必遠在美洲，而處於中國古代已有記載的航線上，也不會絲毫減低《法顯傳》對於南海交通的重大意義。法顯以六十歲之高齡，闢路荒途野嶺，跋涉驚沙大漠，逾越雪山峭崖而西去；十多年後，又漂泊浩浩海水，克服鯨波巨浪，歷盡絕食迷航之險而東歸。他通過自己的行程，把陸、海兩種絲綢之路貫通起來，並載入史冊，從而為古代中西交通史與南海航運史樹立了重要的里程碑。

註釋

- ① 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梁高僧傳》卷三，《歷代三寶記》卷七。據湯用彤云，《梁高僧傳》係抄自僧祐之書：“查《僧傳》法顯傳，全抄《祐錄》之文，而間加以改竄。但其改竄之處，往往甚誤”，參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第384頁。
- ② 法顯的生卒年代，史無明載。《出三藏記集》云法顯“卒於新寺，春秋八十有二”，《高僧傳》則云“春秋八十有六”。《出三藏記集》卷三有《彌沙塞律序》，謂法顯唯《彌沙塞》一部未及譯出而亡，“到宋景平元年……請外國沙門佛駄什出之”。《高僧傳》卷三（佛駄什）傳亦載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七月以前法顯已化。若以其卒於423年，得年八十二計，則生年當在342年。
- ③ 《出三藏記集》、《高僧傳》均謂法顯為“平陽武陽人”，但《歷代三寶記》卷七僅稱其係“平陽沙門”。按《晉書·地理志》平陽郡十二縣中無武陽，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序第2頁）及《中國佛教史》第二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80頁）以武陽或平陽之誤，茲從之。
- ④ 參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關於法顯西行始發之年，《出三藏記集》、《高僧傳》、《歷代三寶記》均作晉隆安三年（399，己亥），然傳世諸本《法顯傳》則作“弘始二年，歲在己亥”。弘始為後秦姚興年號，元年當隆安三年，己亥歲，二年已屬隆安四年，庚子歲，故中國注家皆以弘始二年為元年之誤，參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六冊，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17頁；岑仲勉《佛遊天竺記考釋》，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7頁；馮承鈞《歷代求法翻經錄》，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22頁；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第381頁；章巽《法顯傳校注》第2頁。英國人Samuel Beal之譯註繫於公元400年，見Travels of Fah-hian and Sung-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400 A.D. and 518 A.D.), London, 1869.但其他外國註家也多主公元399年說，參見：James Legge,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ā-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 Oxford 1886; H.A.Giles, The Travels of Fā-hsien (399-414 A.D.),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Cambridge, 1923; 長澤和俊《法顯之入竺求法行》，載《絲綢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47頁。
- ⑤ 法顯西行的同伴有慧景、道整、慧應、慧惠、智嚴、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慧達等人。其中智嚴、寶雲二人，《出三藏記集》卷十五另有傳。

- ⑥ 新頭河即印度河，為梵文Sindhu之音譯。
- ⑦ 諸國考證可參見上引Samuel Beal書，pp.18、26、27、30、50；James Legge書，pp.24、28、29、31、41；馮承鈞原編、陸峻嶺訂《西域地名》，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3、28、68、98、102頁。
- ⑧ 參見上引《西域地名》，第29、30、41、57、87、101頁。
- ⑨ 參見R.C.Majumdar, *Ancient India, Banaras*, 1952, pp.8, 503; R.C.Majumdar etc., *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 London, 1958, pp.160, 192, 197, 201, 226;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London, Fourth Edition, 1958, pp.169-170, 188。
- ⑩ 參見上引《西域地名》，第18、93頁。
- ⑪ 參見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66-867頁。另可參見Thomas Watters etc.,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A.D.629-645)*, Delhi, 1961, pp.233-234；上引Samuel Beal書，pp.100-101。
- ⑫ 參見岑仲勉《佛遊天竺記考釋》，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岑仲勉《佛遊天竺記》名稱之討論，1945年未刊舊稿，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饒宗頤《金趙城藏本〈法顯傳〉題記》，載《選堂集林·史林》下冊，香港中華書局1982年版；章巽《〈水經注〉和〈法顯傳〉》，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三輯，另收入《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章巽《法顯傳校注》序，校注說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章巽《法顯傳》的宋刻本和金刻本，載《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另收入《章巽文集》；《中國佛教史》第二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82-585頁；耿引曾《漢文南亞史料學》佛國記部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3頁。
- ⑬ 岑仲勉、章巽等均以為《佛遊天竺記》即《歷遊天竺記傳》，亦即《法顯傳》。但日本足立喜六則據法經等的《眾經目錄》，認為《佛遊天竺記》實西域聖賢所撰，《僧祐錄》所載係《歷遊天竺記》而誤為《佛遊天竺記》，見何健民等譯《法顯傳考證》，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3頁。饒宗頤上引文亦認為《佛遊天竺記》與《法顯傳》未可隨便目為一書，見《選堂集林·史林》下冊第966-967頁。
- ⑭ 參見沙畹《中國之旅行家》，馮承鈞譯，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第16-19頁；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六冊，第214-215頁；方豪《中西交通史》（一），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53年版，第237-238頁。
- ⑮ 參見：《法顯三藏的旅行地圖》，加藤弘之，《佛教史林》1-11，1894；《法顯的行路》（上、中、下），堀謙德，《東洋學報》3-2、3、4-1、3，1912-1913；〈千五百年前之留學生〉，梁啟超，《改造》4-1，1921；《法顯、玄奘西行之比較》，諸葛麟，《史地學報》3-3、5，1924-1925；《法顯求法歸程考》，陳慎，《史地學報》4-1，1926；〈中國的第一個留學生〉，朱士嘉，《史學年報》2，1930.11；〈水經注引用的法顯傳〉，森鹿三，《東方學報（京都）》1，1931；《法顯西行年譜》，岑仲勉，《聖心》1-1，1932.11；《法顯西行年譜訂補》，岑仲勉，《聖心》1-2，1933.7；《歷代求法翻經錄》，馮承鈞，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22-24頁；《法顯傳研究序說》，田中峰三，《大正大學學報》19，1935；〈足立喜六的《考證法顯傳》〉，藤枝晃，《東洋史研究》1-5，1936；《考證法顯傳》，達多，《大公报》1936.3.19；《沙門法顯歸還的航路》，足立喜六，《支那佛教史學》2-1，1938；《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湯彤影，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第380-385頁；《沙門法顯通過蔥嶺的研究》，足立喜六，《史學》18-1，1939；《沙門法顯的西域的行路》，足立喜六，《蒙古》十八號，1940；《法顯傳中亞、印度、南海紀行的研究》，足立喜六，《法藏館刊》1940年；《法顯傳的研究序說》，田中峰三，《大正大學學報》19輯；《論自傳及法顯行傳》，朱東潤，《東方雜誌》39-17，1943；《法顯和他的佛國記》，張一純，《山西地方史研究》1；〈《佛遊天竺記》名稱之討論〉，岑仲勉，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據風向考訂法顯航程之商榷〉，許雲樵，《南洋學報》6-2，1950.12；《法顯出國及其曾到過美洲考證》，達鑑三，《中央日報》1957.12.10；〈中國到南洋的第一位文化大使——法顯〉，何福同，《人生》174期，1958.2；《法顯登墨之疑》，方規，《中央日報》1958.3.25；〈發現美洲是中國人〉，達鑑三，《中央日報》1959.10.17；〈美洲係中國法顯發現的新考證〉，達鑑三，《中華日報》1964.1.18；〈中國佛國記中法顯往返耶婆提國之經過〉，達鑑三，《憲政論壇》10-12，1965.5；《法顯通過的鄒善國》，榎一雄，《東方學》34，1967.6；〈揭開誰先發現美洲新大陸謎〉，達鑑三，《中華日報》1967.10.23；〈我國法顯發現美洲新證〉，達鑑三，《學園》3-4，1967.12；〈耶婆提國考證〉，達鑑三，《憲政論壇》13-10，1968.3；《法顯首先發現美洲考證序》，李寰，《中華日報》1970.3.2；《〈法顯傳〉釋疑》，長澤和俊，《鹿兒島短期大學研究紀要》8，1971.10；〈《佛遊天竺記》《歷遊天竺記》〉，滋野井祐，《佛教史學研究》16-2，1974.6；《法顯の入竺求法行について》，長澤和俊，《東洋學術研究》13-5，1974.9；《法顯傳備考》，村田忠兵衛，《奧田慈應先生喜壽紀念佛教思想論集》，1976.10；《法顯——最早過到印度尼西亞的中國人》，溫廣益，《華僑問題資料》1979-3；《金趙城藏本〈法顯傳〉題記》，饒宗頤，《史語所集刊》45-3，收入《選堂集林·史林》下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水經注〉和〈法顯傳〉——紀念顧頡剛先生（1893-1980）》，章巽，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三輯；《法顯及其佛國記》的幾個問題，新生禾，《山西大學學報》1980-1；〈中國古代傑出旅行家的故事：法顯〉，高事恆、王季深，《地平線》1980-14；〈中國古代傑出旅行家的故事：法

顯(續)》，高事恆、王季深，《地平線》1981-15：〈法顯及其《佛國記》拾遺〉，靳生禾，《山西師院學報》1981-1：〈法顯《佛國記》の南海航路考(上)〉，池永佳昭，《史學》51-3，1981.12：〈法顯《佛國記》の南海航路考(下)〉，池永佳昭，《史學》52-1，1982.6：〈釋法顯抑朱士行——誰是中國第一位留學生？〉，曹仕邦，《大陸雜誌》70-5，1985.5：〈《佛國記》在漢籍中的利用及中外之評述〉，靳生禾，《敦煌學輯刊》7，1985.6：〈《法顯傳》的宋刻本和金刻本〉，章巽，《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1986年版：〈法顯西行述論〉，劉進寶，《社會科學(蘭州)》1987-5、9：〈高僧法顯行跡雜考〉，郭元興，《法音》1988.12：〈誰最先到達美洲〉，連雲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法顯〉，謝方，新蕾出版社1993年版。

16 參見前引Samuel Beal 書167頁，足立喜六書220頁。

17 參見前引Saumel Beal 書，第168頁；James Legge 書，第113頁；H.A.Giles 書，第78頁；W.P. Groeneveldt,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Batavia, 1876, p.7；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90頁；費瑯《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115頁；沙畹《中國之旅行家》，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第16頁；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二冊第203頁，第六冊第216頁；馮承鈞《歷代求法翻經錄》，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24頁；李長傳《中國殖民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9頁；賀昌群《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頁；長澤和俊《法顯之入竺求法行》，載《絲綢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頁。

18 參見費瑯《蘇門答刺古國考》，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67-68、91-92頁；D.G.E.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MacMillan & Co. Ltd., London, Fourth edition, 1981, p.13；岑仲勉《佛遊天竺記考釋》，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118頁；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8頁。

19 參見上引費瑯《蘇門答刺古國考》第67-68、93頁；足立喜六《法顯傳——中亞、印度、南海紀行之研究》，東京，1940年版第222頁；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第383頁；王新民、韓振華《紀元前中國南洋交通考》，載《海疆學報》一卷一期，1946年；陳序經前引《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上卷718頁，下卷1261-1262頁；蘇繼康《島夷誌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版，敘論第3頁，另上引《南海鉤沉錄》第249-250頁；章巽前引《法顯傳校注》，第170頁。

20 J.L.Moens文載皇家亞細亞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第十七卷第二冊(1940)第49頁，轉引自吳景宏《三國兩晉時代中非關係之探討(下)》，載《大陸雜誌》第十二卷第四期，112頁(另載《中非關係史論叢》，新加坡青年書局1960年版，144頁)；另見英國V.珀塞爾《東南亞華人》，載《中外關係史譯叢》第2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頁；張禮千為《鄭和航海圖考》所作的序。

21 丁謙文見《地學雜誌》6-12，1915年，另載《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另參見上引吳景宏文。

22 參見謝方《法顯》所述，新蕾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頁。

23 參見《章太炎全集》第四卷《太炎文錄初編》。達鑑三文及連雲山專著詳見註16。

24 參見長澤和俊上引《絲綢之路史研究》，第453、469頁；《中國史稿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79年版。

結語

對於中國古代南海對外交通而言，隋代以前是這樣一個時期：由萌芽、起動而開始發展，並準備迎接未來的興盛；亦即從先秦的傳疑時代，步入秦漢的開拓時期，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初步發展，逐步過渡到隋唐的盛世。

本文前面透過不同時代南海交通史籍、事件、路線及往來國家的述評，以求揭示隋代之前中國對外航海交通的概貌，並進一步勾劃其特色。而文內的種種史料，在在表明了這一時期的上述總特點。下面擬圍繞這種由發端而轉變的總特點，按幾個方面重加條分縷析：

（一）在政治方面，來朝蕃國逐漸增多：先秦時期，《山海經》雖記有四方一百多“國”，唯均屬神話傳說，難以為憑；至於與中國之建交或朝貢，更若鳳毛麟角，即如越裳國之貢白雉，亦未可盡信。秦、漢時期，正式在邊裔設郡，故與交趾、九真、日南等相關之記載漸多，但有關同南海諸國往來之史料仍相當貧乏，可考者僅撣國、究不事、敦忍乙、葉調、黃支諸地。及至魏晉南北朝，情形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三國時徼外扶南、林邑、堂明等已紛紛入貢，晉、宋、齊、梁、陳諸朝所記來往通交之南海國家已有二十多個。現存梁《職貢圖》不僅保留了林邑、婆利、狼牙修、師子等來使之記載，而且圖畫使者之面形身貌，足見彼時外國使者來華之頻繁。

（二）在外交方面，訪外事使從無到有：先秦及秦代，尚無中國使者赴外國之記載。徐福東渡是否到了日本，迄今猶是一個千古之謎。漢代，已有張騫、班超、甘英赴西域之記錄，唯海路交通使者未之聞。《漢書·地理志》提及漢之譯使抵達黃支，然姓甚名誰難以弄清。只有到了三國吳時，才出現訪問扶南諸國的專使康泰、朱應，並寫下自身的見聞錄。此誠古代南海交通空前之盛事，亦是後來隋常駿使赤土等之先聲。

(三)在經濟方面，海外貿易趨向繁榮：西漢時，遠航印度的商船已攜帶中國著名的絲綢及黃金，交換西域國家的明珠、奇石異物，但其規模不大。到了兩晉南北朝，史書所載之中外物資交流及海外貿易範圍已呈欣欣向榮之趨勢。《齊民要術》記有不少中外農作物之交流。《南齊書·荀伯玉傳》首載後世“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著名的“崑崙舶”，提及“……絲錦與崑崙舶營貨，輒使令防送過南州津”，此亦早期司理市舶之珍貴史料。至於《太清金液神丹經》，更詳載輸入中國的眾多國家之香藥，足見彼時海外貿易之廣泛範圍。

(四)在文化方面，中外交流愈益頻繁：自西漢張騫“鑿空”以降，中西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即逐漸發展，西域的佛教亦迅速在中土傳播開來。魏晉南北朝時，佛教藝術影響及佛經翻譯事業益形昌盛，佛教高僧頻頻東來西往，而活躍於南海線上的高僧之名亦屢見經傳。由《高僧傳》之著錄，不難窺見彼時以佛教輸華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之蓬勃。在其他方面，中國與南海諸國的文化交往也逐漸頻繁，如康泰、朱應出使扶南之促使當地始用“干縵”(sarong)，即為突出一例。

(五)在科技方面，造船水平步步提高：由先秦至南北朝，造船技術的提高亦反映了古代南海對外交流的不斷進步。《易·繫辭》曾記遠古時之“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東周時已以龐大的“舟師”從事征伐。西漢後，中國的造船技術顯著地提高，彼時已設有伏波將軍、樓船將軍、戈船將軍等職，並率先進的船艦從事對交趾、九真、日南等的戰爭。三國時，康泰《扶南傳》記有“扶南舶”等，崑崙舶(見《南齊書》)、崑崙舸(見《水經注》)等名亦於南北朝時出現，均可供與當時的中國造海舶相比較。《法顯傳》之“信風”記載，從另一角度說明與風帆密切相關的航行技術之提高，是亦值得留意的重要研究課題。

(六)在地理方面，航海知識不斷增廣：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對外交往的頻繁，中國古代的地理知識亦不斷增廣。如果說，《漢書·

地理志》保存的遠洋航線只是一種片斷的不夠詳實的記錄，黃支是否印度仍值不斷考訂；那麼，到了晉代，《法顯傳》已為後人保存了專由印度西航返國的寶貴實錄。再加上三國時“漲海”一詞之涵蓋南海、西海，諸書所載航路之日趨多元化，《扶南傳》、《南州異物志》中之眾多海國，《洛陽伽藍記》所載由歌營入華的航線，無不多方說明隋代建立前夕，中國的南海地理及航行知識已相當廣泛。

（七）在圖籍方面，涉外記載日見豐富：西漢以前，中國關於海外交易之史料，大多摻雜著神話與傳說，而且數量極少。自西漢起，“正史”開始有四裔列傳，個別中外交通專著也已出現。但到了魏晉南北朝，有關南海交通之史籍，簡直呈現“百花齊放”之空前奇景，其數量及重要性比之隨後的隋、唐時期亦不遑多讓。諸如《南州異物志》、《廣志》、《水經注》等地理名篇，《太清金液神丹經》、《高僧傳》、《洛陽伽藍記》等宗教著作，《扶南傳》、《佛國記》、《職貢圖》等外交專著或旅遊行紀，均屬南海交通史上之不朽史籍，值得不斷輯佚、考證與研究。而這些中外交通圖籍的大量湧現，亦表明魏晉南北朝乃古代南海交通史上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時期。

不過，儘管中國古代關於南海交通的史籍非常豐富，然就中外相互關係而言，漢文古籍畢竟只反映中國一方面的見解和態度。由於語文及民族之差異，其間肯定有不少曲解外國情況之處。為了深入而如實地反映中外交往之歷史，必須把中國古籍與外國記載結合起來，從事比較性的研究，包括像托勒密《地理志》一類的西方古地理書，西方人與阿拉伯人的各種東方遊記，南洋諸國的古代傳說、碑銘、史詩及地志，等等。此項工作自然不是某些人短促一生所可奏效，需要世界各國學者長期的衷誠合作。但如果每個人都竭盡所能，完成某一方面的基礎工作，把成果貢獻給學界，供後人繼續下去，並取得他人的批評、指正，亦不失為值得提倡的好方法。我們應該為此而不懈努力，這也正是筆者從事本文寫作的動機。

主要參考文獻

(一) 古代載籍

山海經 (戰國) 佚名 袁珂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史記 (西漢) 司馬遷 中華書局1959年版

漢書 (東漢) 班固 中華書局1962年版

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 岑仲勉校釋 中華書局1981年版

西漢會要 (南宋) 徐天麟 中華書局1955年版

後漢書 (南朝·宋) 范曄 中華書局1965年版

東漢會要 (南宋) 徐天麟 中華書局1955年版

交州異物志 (東漢) 楊孚 曾釗輯 《嶺南遺書》第五集

三國志 (西晉) 陳壽 中華書局1959年版

康泰《吳時外國傳》輯注 (三國) 康泰 許雲樵輯注 東南亞研究所1971年版

扶南異物志 (三國) 朱應 陳運溶輯 《麓山精舍叢書》第二集

輯《南州異物志》 (三國) 萬震 陳直夫輯 陳直夫教授九秩榮慶門人祝賀委員會1987年版

晉書 (唐) 房玄齡等 中華書局1974年版

南方草木狀 (晉) 稽含 《百川學海》本

南中八郡志 (晉) 魏完 王叔武輯 雲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雲南古佚書鈔》

廣志 (晉) 郭義恭 馬國翰輯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博物志校證 (晉) 張華 范寧校證 中華書局1980年版

- 搜神記 (晉) 干寶 汪紹楹校注 中華書局1979年版
- 拾遺記 (晉) 王嘉 齊治平校注 中華書局1981年版
- 太清金液神丹經 (東晉) 葛洪(?) 道藏洞神部眾術類
- 華陽國志 (東晉) 常璩 顧廣圻校 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
- 佛遊天竺記考釋 (東晉) 釋法顯 岑仲勉考釋 商務印書館
1934年版
- 法顯傳考證 (東晉) 釋法顯 足立喜六考證 何健民、張小卿
譯 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 法顯傳校注 (東晉) 釋法顯 章巽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
- 宋書 (南朝·齊) 沈約 中華書局1974年版
- 魏書 (北齊) 魏收 中華書局1974年版
- 水經注 (北魏) 酈道元 楊守敬注疏 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
- 水經注校 (北魏) 酈道元 王國維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洛陽伽藍記 (北魏) 楊街之 范祥雍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 齊民要術 (北魏) 賈思勰 繆啟愉校釋 農業出版社1982年版
- 南齊書 (梁) 蕭子顯 中華書局1972年版
- 梁書 (唐) 姚思廉等 中華書局1973年版
- 高僧傳 (梁) 釋慧皎 大正大藏經本
- 職貢圖 (梁) 蕭繹 南京博物院藏圖
- 文選 (梁) 蕭統 嘉靖刻本
- 陳書 (唐) 姚思廉等 中華書局1972年版

- 北齊書 (唐) 李百藥 中華書局1972年版
- 周書 (唐) 令狐德棻等 中華書局1971年版
- 南史 (唐) 李延壽 中華書局1975年版
- 北史 (唐) 李延壽 中華書局1974年版
- 隋書 (唐) 魏徵等 中華書局1973年版
- 舊唐書 (後晉) 劉昫等 中華書局1975年版
- 新唐書 (北宋) 歐陽修等 中華書局1975年版
- 北堂書鈔 (唐) 虞世南 光緒十四年刊本
- 藝文類聚 (唐) 歐陽詢 中華書局1965年版
- 法苑珠林 (唐) 釋道世 道光七年刻本
- 初學記 (唐) 徐堅等 中華書局1962年版
- 通典 (唐) 杜佑 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 白孔六帖 (唐) 白居易撰、(宋) 孔傳續補 嘉靖刻本
- 翻梵語 (唐) 撰者未詳 大正大藏經本
- 太平廣記 (北宋) 李昉等 中華書局1961年版
- 太平御覽 (北宋) 李昉等 中華書局1960年版
- 太平寰宇記 (北宋) 樂史 乾隆五十八年刻本
- 事類賦 (北宋) 吳淑 紹興十六年刻本
-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北宋) 唐慎微 《四部叢刊》本
- 翻譯名義集 (南宋) 法雲 光緒四年刻本
- 通志 (南宋) 鄭樵 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 玉海 (南宋) 王應麟 至元六年刻元明遞修本
- 文獻通考 (元) 馬端臨 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 島夷誌略 (元) 汪大淵 蘇繼庾校釋 中華書局1981年版
- 永樂大典 (明) 解縉等 中華書局1959-1960年輯本
- 本草綱目 (明) 李時珍 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年版
- 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 (清) 陳夢雷、蔣廷錫 中華書局影印
版本
- 二十五史補編(六冊) 開明書店1936年編輯出版

(二) 近人論著

- 蓬萊軒地理學叢書(兩集) 丁謙 浙江圖書館1915年刊本
-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六冊) 張星烺 中華書局1976年版
-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 馮承鈞 中華書局1957年版
- 中外交通史 向達 中華書局1934年版
- 中西交通史 方豪 華崗出版有限公司1953年版
- 中外史地考證(兩冊) 岑仲勉 中華書局1962年版
- 中國南洋交通史 馮承鈞 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 古代南洋史地叢考 姚枬、許鈺 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
- 中外關係史論文集 朱傑勤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選堂集林(史林) 饒宗頤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2年版
- 中國古代史研究(上、下冊) 陳連慶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出版
- 中外交通史 陳佳榮 香港學津書店1987年版
- 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史 張維華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 中外關係史論叢(第一至三輯) 中外關係史學會編 世界知識
出版社1985年-1991年版

- 中國與亞非國家關係史論叢 北京大學歷史系、東語系編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 章巽 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
- 中國航海科技史 章巽主編 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 中國航海史(古代航海史) 楊燾等 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
- 中國古代航海史 孫光圻 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
- 七海揚帆 姚楠、丘進、陳佳榮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990年版；臺北中華書局1993年版
- 海洋交通與文明 孫光圻 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
- 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會議論文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 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續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海上絲綢之路 陳高華、吳泰、郭松義 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 西域地名 馮承鈞原編 陸峻嶺增訂 中華書局1980年版
- 古代南海地名匯釋 陳佳榮、謝方、陸峻嶺 中華書局1986年
出版
- 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 韓振華主編 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
- 中西文化交通小史 劉伯驥 正中書局1953年版
- 中外文化交流史 周一良主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中西文化交流史 沈福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中外文化因緣 沈福偉 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版
- 東南亞文化交通史 邱新民 新加坡亞洲研究會、文學書屋
1984年版
- 中國殖民史 李長傳 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 南洋史(上卷) 許雲樵 吉隆坡世界書局1961年版
- 南海鉤沉錄 蘇繼庠 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
- 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
- 南洋與中國 陳序經 嶺南大學1948年版
- 中國與南海關係論文集 香港大學歷史學會金禧紀念年刊(1961年出版)
- 東南亞古代史地叢考 邱新民 新加坡南洋學會1969年版
- 東南亞史 吳俊才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版
- 東南亞史 程光裕等 友聯出版社1959年版
- 東南亞簡史 李惠良等 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東南亞華僑通史 吳鳳斌等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南洋文獻敘錄長篇 許雲樵 載《南洋研究》一期(1959年)
- 南洋文獻敘錄續編 許雲樵 載《東南亞研究》一期(1965年)
- 東南亞古代史中文文獻提要 顧海 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 琉球及東南亞諸海島與中國 梁嘉彬 東海大學1965年版
- 中菲關係論叢 吳景宏 新加坡青年書局1960年版
- 中菲關係史 劉芝田 正中書局1967年版
- 中菲文化論集 張其昀等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60年版
- 中國古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匯編 中山大學東南亞所黃重言等編 中華書局1979年版
- 菲律賓史 金應熙主編 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 印度尼西亞史 鄭學稼 台北 1976年版

- 印度尼西亞古代史 王任叔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 印度尼西亞華僑史 溫廣益等 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
- 海上絲綢之路的新加坡 邱新民 勝友書局1991年版
- 星雲椰雨集 姚楠 新加坡新聞與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
- 中馬中星文化論集 程光裕等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1964年版
- 馬來亞華僑史綱要 姚楠 商務印書館1943年版
- 馬來亞史(上冊) 許雲樵 新加坡青年書局1961年版
- 中南半島華僑史綱要 姚楠 商務印書館1943年版
- 郡縣時代之安南 黎正甫 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
- 越史叢考 蒙文通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中越文化論集 郭廷以等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
- 中國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 陳顯泗等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中國古籍中有關柬埔寨資料匯編 陸峻嶺、周紹泉 中華書局
1986年版
- 中國古籍中有關老撾資料匯編 景振國主編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 中國與暹羅 嵇壽青 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
- 暹羅與中國 陳序經 商務印書館1941年版
- 北大年史 許雲樵 新加坡南洋編譯所1946年版
- 中泰文化論集 凌純聲等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8
年版
- 中印緬道交通史 夏光南 中華書局1948年版

- 中緬關係史綱要 王婆楞 正中書局1945年版
- 道藏源流考 陳國符 中華書局1963年版
-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湯用彤 中華書局1983年版
- 歷代求法翻經錄 馮承鈞 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版
- 陳垣史學論著選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 季羨林 三聯書店1983年版
- 中印歷代關係史略 許崇灝 獨山出版社1942年版
- 漢文南亞史料學 耿引曾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 中國載籍中南亞史料匯編(兩冊) 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 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 賀昌群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誰最先到達美洲 連雲山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
- 漢代與西域交通史 安作璋 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向達 三聯書店1957年版
- 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 閻文儒、陳玉龍編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我國歷代關於東南亞史地重要著作述評 朱傑勤 載《學術研究》(廣東) 1963年一期
- 漢唐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輯佚 佛馱耶舍 載《史學雜誌》一卷一期(1929年3月)
- 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 向達 載《北平圖書館館刊》四卷六號(1930年12月)；另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 晉宋間外國地理佚書輯略 岑仲勉 載《聖心》二期(1933年)；另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
- 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書 岑仲勉 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
- 宋明間關於亞洲南部沿海諸國地理之要籍 王庸 載《史學與地理》一期(1926年12月)
- 紀元前中國南洋交通考(漢書地理志附錄考) 王新民、韓振華 載《海疆學報》一期(1947年1月)
- 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峽與地極 許雲樵 載《南洋學報》5-2(1948年12月)
- 漢書地理志已程不國即錫蘭說 蘇繼庠 載《南洋學報》5-2(1948年12月)
- 黃支國在南洋何處？ 蘇繼庠 載《南洋學報》7-2(1951年12月)
- 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一世紀間中國與印度東南亞的海上交通——漢書地理志粵地條末段考釋 韓振華 載《廈門大學學報》1957年2期
- 西漢對南洋的海道交通 岑仲勉 載《中山大學學報》1959年4期
- 漢使航程問題——評岑韓二氏的論文 周連寬 載《中山大學學報》1964年3期
- 漢代中國與東南亞和南亞海上交通路線試探 朱傑勤 載《海交史研究》三期(1981年7月)
- 水經注卷一箋校 岑仲勉 載《聖心》二期(1933年)；另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 中華書局1962年版
-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1961年作、1969年改定) 饒宗頤 載《選堂集林·史林》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2年版

職貢圖的時代與作者 金維諾 載《文物》1960年7期

魏志倭儒國(今琉球)裸國(今台灣)黑齒國(今菲律賓)考 梁嘉彬
載《大陸雜誌特刊》二號(1962年5月)

新加坡古代名稱的檢討——蒲羅中問題商榷 饒宗頤 載1970年
元旦《南洋商報》；其文及引發的許雲樵、陳育崧等的爭論文
章均收入《東南亞研究》第六卷(1976年)

蒲羅中問題的再商榷 許雲樵 載1970年1月25日《南洋商報》

舊柔佛之研究 韓槐準 載《南洋學報》5-2(1948年12月)

朱應康泰行紀研究 方詩銘 載《東方雜誌》四十二卷四號(1946
年2月)

中國與扶南關係研究 趙令揚 載《香港大學歷史學會慶祝金禧
年刊》(1961年二期)

道明國考 黃盛璋 載《中外關係史論叢》第二輯 世界知識出
版社1987年

蜀布與 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附論：海道之
絲路與崑崙舶) 饒宗頤 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
(台灣，1974年6月)

《佛遊天竺記》名稱之討論(1945年未刊舊稿) 岑仲勉 載《中外
史地考證》上冊 中華書局1962年版

金趙城藏《法顯傳》題記 饒宗頤 載《選堂集林·史林》下冊 香
港中華書局1982年版

《水經注》和《法顯傳》 章巽 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三輯；
另載《章巽文集》 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

《法顯傳》的宋刻本和金刻本 章巽 載《向達先生紀念論文
集》，1986年版；另載《章巽文集》 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

(三) 外國著譯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一至九編) 馮承鈞譯 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1956-1962年版

中外關係史譯叢(第一至五輯) 中外關係史學會編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1991年版

中國之旅行家 沙畹著 馮承鈞譯 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

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 希勒格著 馮承鈞譯 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

交廣印度兩道考 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中華書局1955年版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費瑯著 馮承鈞譯 中華書局1957年版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藤田豐八著 何健民譯 中華書局1936年版

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 王賡武著 姚楠等編譯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年版

東南亞華人 V.珀塞爾 載《中外關係史譯叢》第二輯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

東南亞簡史 B.Harrison 新加坡聯營出版社有限公司1959年譯印

東南亞史 D.G.E.Hall 中山大學東南亞史所譯 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東南亞史導論 B.R.Pearn 張奕善譯 學生書局1975年版

東南亞歷史發展 J.F.Cady 姚楠等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

馬來西亞史 溫斯泰德著 姚楠譯 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

印度尼西亞史 薩努西·巴尼著 吳世瑄譯 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

- 蘇門答臘古國考 費瑯著 馮承鈞譯 中華書局1955年版
- 葉調斯調與爪哇 費瑯撰 馮承鈞譯 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篇》，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 秦漢象郡考 馬思伯樂撰 馮承鈞譯 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四編》，商務印書館1941年版
- 秦代初平南越考 鄂盧梭著 馮承鈞譯 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版
- 越南歷代疆域 陶維英著 戴可來譯 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
- 安南通史 岩村成允著 許雲樵譯 星洲世界書局1957年版
- 占婆史 馬司帛洛著 馮承鈞譯 中華書局1956年版
- 暹羅古代史 共丕耶達嗎鑾拉查奴帕著 王文申譯 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
- 緬甸史 哈威著 姚楠譯 陳炎校 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
- 中國伊朗編 勞費爾著 林筠因譯 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 大秦國全錄 夏德著 朱傑勤譯 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 扶南考 艾莫涅撰 載《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 1903, 1-2; 另刊於《國聞譯證》第一冊
- 扶南考 伯希和 載《法國遠東學院通報》(*BEFEO*), 1903, III; 另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 中華書局1957
- 孫權遣使南方考 駒井義明 載《歷史と地理》25-6, 1929
- 僑陳如王扶南考 H.G.Wales 姚楠譯註 載《東方雜誌》39-1 (1943年3月)
- 法顯之入竺求法行 長澤和俊撰 鍾美珠譯 載《絲綢之路史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魏略西戎傳箋註 沙畹撰 馮承鈞譯 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
叢七編》 中華書局1957年版

東南アジア研究 杉本直治郎 岩南堂1968

アジア歴史地圖 松田壽田、森鹿三 日本平凡社1966

安南史研究 山本達郎 山川出版社1950

朱康、康泰の扶南見聞錄輯本稿 渡部武 論說資料保存會《中
國關係論說資料》27號(1985)第三分冊上

Groeneveldt, W.P.,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Batavia, 1876.

Gerini, G.G., *Researches on Ptomlemy's 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 London, 1909.

Hirth, F. and Rockhill, W.W., *Chau Ju-kua*, St. Petersburg, 1911.

Yale, H. and Cordier, H.,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4 vol.,
London, 1913-1916.

Fuchs, W.,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u-tu, Fu Jen University, Peiping, 1946.

Pelliot, P., *Notes on Marco Polo*, 3 vol., Paris, 1959, 1963, 1973.

Hall, D.G.E.,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MacMillan & Co.
Ltd., London, Fourth edition, 1981.

Tarling, Nichola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Briggs, Lawrence Palmer, *The Ancient Khmer Empire*, Issued as
Volume 41, Part 1, of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
sophical Society held at Philadelphia, 1951.

Walker, George B., *Angkor Empire*, Signet Press, Calcutta, 1951.

Chatterji, Bijan Raj, *India Cultural Influence in Cambodi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64.

Chandler, David P., *A history of Cambodia*, Westview Press, 1983.

Beal, Samuel, *Travels of Fah-hian and Sung-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400 A.D. and 518 A.D.)*, London, 1869.

Legge, James,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ā-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399-414)*, Oxford, 1886.

Giles, Herbert A., *The Travels of Fā-hsien (399-414 A.D.)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Cambridge, 1923.

Watters, Thomas et al.,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A.D. 629-645)*, Dehli, 1961.

Majumdar, R.C., *Ancient India*, Banaras, 1952.

Majumdar, R.C. et al., *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 London, 1958.

Smith, The Late Vincen A.,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London, Fourth Edition, 1958.